

國際名人傳記叢書

蕭

伯

訥

石葦編譯



SHAW



第一章 自傳與他傳

本章以蕭伯訥自傳和他傳中的故事，說明一切的傳記都是謠話，而且是故意的謠話，以及怎樣纔能把這種罪惡寬恕或克服。

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大藝術家密開蘭其羅 (Buonarroti Michelangelo)有一次，替梅狄西 (Lorenzo dei Medici) 雕刻一個大像，正在工作之際，有一個旁觀者正色地反對着說這個雕像簡直不像梅狄西，而且說他認識梅狄西曾經有多年的歷史，但是他簡直不能從雕刻家的表現上認識他。

終於這位大藝術家開口了：『千年而後，誰來管它像不像呢？』

近代法國大雕刻家羅丹 (Auguste Rodin) 曾在或一時期內，應蕭伯訥的千方百

計的請求，給他雕塑了一件五十歲時的蕭伯訥的胸像。現在有一個大理石的胸像，保存在杜白林(Dublin)美術館內。據說那就是從羅丹作品仿製出來，而且是蕭伯訥自己送到那裏去展覽的。

*

這前後的兩件事，實在是故智的鈔襲和模倣。

蕭伯訥知道這是很精明的一種方法，在藝術的掩護之下，與他本人有莫大的利益。所以他雖是很忙，然而他不會吝惜他的珍貴的光陰，去請各種各樣的人，替他設法作塑像或雕像之類。在這些藝術品之中，他希望着會有一個胸像，流傳到一千年後。自然，這一定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品，或者甚至可以說，密開蘭其羅所作的梅狄西像和羅丹所作的蕭伯訥像，都比原來的對象——梅狄西或蕭伯訥本身——還更偉大。蕭伯訥公然地承認過，他之所以要用盡方法，使羅丹替他作一胸像，目的就是這個——僅僅就是這個。或許也是因為同樣的目的，和同樣的幽默，在作傳記的吧。

傳記，在各方面看來，就是一種文字上的畫像或塑像。傳記也就是假借着藝術品的美名，掩飾作者本身的狂妄。

蕭伯訥的用心是很苦的了，他一方面要考察自己的以及關於自己的畫像，是否逼肖本人；另方面却也企圖把那種畫像成爲藝術品，使之垂諸久遠，永傳不朽——千年或萬年。

他不僅讓人家來繪他的像，他連自己也動手這樣做，自傳也有，他傳也有，五色繽紛，眩然展覽在我們的眼底。他用了小說或戲曲，書序或信札之類的形式，曲曲傳出他那半易卜生式的社會哲學家和半尼采式的超人的模樣，簡直令人眩目。猶如歌德，盧騷，托爾斯泰，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加薩諾瓦（Casanova）一樣，蕭伯訥也是一個自傳的作家。不僅在他的作品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自傳的成分，而且在他的書序上面，充分地告訴了我們以一些事跡。

『我早年的小說作品裏面的序文，都包含着值得一寫的多量的自傳。』他的這句

話不會掩飾自己，也不會欺騙我們。固不必說他的序文，只要我們一翻他的作品，我們便可以頓時發現，他曾經把他在地產局中的五年生活，描寫在『鱉夫之室』(Widowers' Houses) 裏面；也曾把他電話局中的工作經驗，描寫在『不合理的結子』(The Irrational Knot) 裏面；也曾把他自己是一個『有三個父親的兒子』的事實，以『非配偶』(Misalliance) 裏面的青年主人公的身分說出；也曾把他和一個風流寡婦的一段豔史，表現在『好述者』(The Philanderer) 裏面的男子却特列斯(Charteris)的身上；也曾把他自己的性格，借『約翰白爾的他島』(John Bull's Other Island) 裏面的主人公白爾和盤托出諸如此類的例子，差不多觸目皆是。

但是，他的自我表現的慾望，似乎猶未滿足，他最近還在宣說，他要從事於自傳的寫作。因為自己寫自己，總比人家寫自己來得正確。他又說，他要把關於他自己的許多東西，預備有一天讓自己印出來。

在以前，據亨特生 (A. Henderson) 的一本傳記中說：『蕭伯訥曾經在某種限度

「內嘗試過坦白地自傳的試作。」是的，他的自傳祇在某種限度內坦白而已。

因此，蕭伯訥的觀念，不能不繫着一個矛盾的結子。他明知道，一切的傳記，都是謊話。不但是謊話，而且是故意的謊話。他又認為任何人，無論好到怎樣，或壞到怎樣，都不會在他活着的時期內，能夠說出關於他自己的真話。因此，他又說：讀傳記的時候須記取真實的事實是不能發表的。

傳記的唯一的意義，就只是說真話的一個特色；換過來說，只有說真話的傳記——無論是自傳或他傳——才有替自己或替人家作傳的意義和價值。這等於畫像的工作一樣。畫像由自己畫出，固然可以；由他人畫出，也未始不可。問題不在於畫得好不好，也不在於畫得像不像；問題只在於畫得真不真，或者甯可明顯些說，畫得忠實不忠實。

因此，如果要形成一部蕭伯訥傳記或一幀畫像時，除了蕭伯訥的本身以外，我們少不得要透視到所以有他的存在和發展的時代背景和物質環境，——即他的本身以外。

的存在。決不能很簡單地描寫他的私人生，便算了事，却必須把他的社會生活作為他的前景（Fore-ground）而表現出來。只有這樣，才不致於失真，不致於不忠實，也只有這樣，才得使這一部傳記的罪惡，為讀者所寬恕或克服。

在這點，蕭伯訥的傳記者——正和拿破侖或華盛頓的傳記者一樣——都表現得欠充分了。亨特生的那一部傳記，雖然蕭伯訥沾沾自喜地譽之為『我的紀念碑似的傳記』（monumental biography of me），實際上，只是一味的捧場和喝采；這樣一來，足以令我們返想到『資產階級的小丑』的蕭伯訥的印象來了。

在各種傳記裏面的蕭伯訥的印象，本來是不能也是不必統一的，這是作傳記者的特權，與蕭伯訥本人是不涉的。雖說他已經對人家用過干涉，強制，勸諭，警告種種手段，但以觀點不同的緣故，終於產生了不能完全實現其自己所希望着的傳記。因此替蕭伯訥作傳的人，雖似乎已經『數見不鮮』，但在他本人看來，除了亨特生所寫的那一本傳記之外，好像什麼都不是傳記一樣。

有一次，他把一些自傳的資料，交給了一個愛爾蘭種的美國教授。這人是一個愛爾蘭的警視員的兒子。他當然學他父親那樣，把蕭伯訥的文件進行察看着了。那裏知道他後來在那本傳記裏，竟把蕭伯訥的母親，描寫成一個淫婦，同時把他的父親描寫成一個『求娶富家之女』的人。蕭氏認為這根本把他的家境解釋錯了，大為震怒，終於禁止了該書的出版。而那傳記者竟因此而死於失望。

英國批評家，『狄更斯論』的著者却斯透頓（G·K·Chesterton）也曾替蕭伯訥寫過一本傳記。却斯透頓說，大多數的人不是說他們不理解蕭伯訥，便是說不能同意於蕭伯訥；可是他說，他固然是理解蕭伯訥，而也不能同意於蕭伯訥。

至於哈麗士（Frank Harris）給他寫傳，顯然是站在反對的立場上說話的了，在有些地方，簡直是把蕭伯訥開玩笑，自然這中間的錯誤的解釋和矛盾的言詞，頗多令人非議的地方。在他作傳之前，曾徵求蕭伯訥的意見，蕭伯訥當即寫信去告訴他，請他無論如何，不要替他作傳，原因是：『你會把我寫成什麼東西，這簡直是連上帝都不知道的。』

而且，他鄭重地聲明着：『這不是我的幽默，（你這傻瓜）這倒是固體似的，散文似的真話。』同時，因為怕他弄錯事實，蕭伯訥供給了他以部分的資料，聊應哈麗士的要求。等到該書的出版消息預告的時候，蕭氏看到上面說是一部特許的傳記，而且有一萬五千字的蕭氏的手筆。於是蕭氏去函通知書局，略稱除亨特生的那本傳記是特許的外，其他都未經本人許可；哈麗士的這一本，尤其非所贊成。此外，他還提出要求：如果印出本人的一個字，他就要毫不客氣訴諸法律等語。同時，蕭伯訥又寫信給哈麗士，說傳記中雖寫的是蕭氏本人的故事，但不得用其本人的文字，而須完全用哈麗士自己的文字。該書出版的時候，我們看到書前有蕭氏本人的印信，書後又有蕭氏本人的跋語。裏封面上，則印着：『基於本人報告的一本未許可的傳記。』

哈麗士所作『蕭伯訥評傳』，在量上不及亨特生所作的一半；前者不滿四百面，而後者却多至八百多面。怪不得蕭伯訥對於亨特生此作，譽為『我的紀念碑似的傳記』。意思是說：這部傳記纔是一部巨大而值得垂之久遠的作品。

其實，亨特生是沒有主見的，是蕭伯訥的崇拜者，他除了把蕭伯訥的幽默、機警、諧謔的生活故事詳為紀錄外，別無可取。哈麗士却完全不同，他有他自己的見解，獨特的觀點，褒少貶多，毀譽參半，無怪乎蕭伯訥把亨特生的一本傳記，定為『特許本』，而把哈麗士的一本，不予承認，並且譏笑他說：『哈麗士的大破是本來就滿載着一個十分舊式的威爾斯家庭，和若干愛爾蘭的加特立教的奴僕。』

却斯透頓、哈麗士和亨特生他們，都是蕭伯訥的朋友，但是友情自友情，戰鬪自戰鬪，對於蕭伯訥，雖然無忌憚地勇於說話，甚至恣意攻擊，可惜都太偏於主觀了些。

蕭訥伯無論如何是一個人，是一個作家。我願意開始寫出蕭伯訥這個人，把我所考察到的，觀感到的關於蕭伯訥的眞面目，忠實實地把事實一一地展開來，而且盡可能地採取他自己的說話。因為他曾經這樣地寫着：

『我有許多的活動，是在彼此不相知的部門之中，他們所作的關於我的一切，純然

是部分的而又是不精確的敘述，所以祇有從我自己的供白中去把我湊合起來，才能完全地理解我。』

對於蕭伯訥，我們就這樣地能夠理解或鑑賞他了嗎？不，絕對不是，他更有他的作品在那裏。蕭伯訥，關於他自己的作品，曾經要求人們直接從他的作品本身中去理解或鑑賞，似乎不高興人們作對於他的作品的解釋。他說：

『因為當我的作品目前還在那裏，而人們可以自去直接獲得作者本人對它的解釋時，如果還去找求那些出自他人之手的解釋，這樣的人一定是白癡。』

我們固然不難發現蕭伯訥的萬種矛盾，但他的矛盾的存在，實質上是證明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之存在。如果要將這個矛盾給以根本的解決或徹底的消滅時，那麼，說一句蕭伯訥式的警語，便是——

『你一定先要從消滅這個矛盾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手。』

第二章 故國與故鄉

本章說明怎樣的時代和社會產生怎樣的人物，同時描寫着愛爾蘭不僅是蕭伯訥的故鄉，而是一切被壓迫者的故鄉。

蕭伯訥是愛爾蘭人，在我們講他的故事之際，必然要回顧到他所出生的年代，並概述在那年代中的他的故國和故鄉。

七十多年前的愛爾蘭，是一個守舊得可笑，被壓迫到極度的愛爾蘭。從深處出來的大抵是一些很機智或者很進步的人，這可以說是任何時代常見的歷史事實吧。這裏出生了一打或一打以上的人物，蕭伯訥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個。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間，名人如——高頓斯(St. Gaudens)，奧本(W. Orpen)，喬琪摩亞(G. Moore)，王爾德(O. Wilde)，萊特孟(F. Redmond)，蒲西考爾特(Dion

Boucicault，凱斯曼 (R. Casement)，格蘭高萊夫人 (Lady Gregory)，夏戎 (W. B. Yeats)，奧康諾 (T. P. O'Connor)，羅伯池 (Roberts)，普倫凱特 (H. Plunkett)，諾斯克里孚 (Northcliffe)，卡爾孫 (E. Carson)，克慶訥 (Kitchener)，及其他諸家，都是在那個被征服，被壓迫的愛爾蘭，過度着他們的童年生活的。

還有些小歌者——法朗西斯費 (Francis Fahy)，派訥爾 (F. Parnell)，王爾德的母親王爾德夫人 (筆名 Speranza)。

在小說家之中，有『如果我是王』的作者麥卡賽 (J. H. McCarthy)，他的父親而是『當代史』的作者裘斯丁·麥卡賽 (J. McCarthy)，稍後便產生了偵探小說的天才作家科南道爾 (Conan Doyle)，此後便產生了亞倫 (G. Allen) 和蕭伯訥。

自然，在上述諸名家中，尤其是高頓斯的雕刻，奧本的繪畫，凱慶訥和羅伯池的軍事才幹，蒲西考爾特的表演能力，諾斯克里孚的新聞學識，羅塞爾的圓形天才，都是近代史上不易排除的人物。至於摩亞的小說，王爾德的劇本和散文，夏芝的詩歌，一直到蕭伯訥

的戲劇，也都佔着新文藝史上的重要地位，這是已無疑義的了。

這樣，軒然地匯成了愛爾蘭的『文藝復興』的巨潮！

雖然他們有些人是早年就離開了故鄉，到了別的地方而得以發展了他們的天才；但這些天才，至少可以說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吧。

六十年代的這個愛爾蘭，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形態呢？

遠在四十年代，愛爾蘭遭着了大饑饉，直到六十年代，當蕭伯訥還在童年的時代，一切都還是受着壓迫的。他們常說：『說話不值錢，麵包要錢買。』土地沒有收成出來，生活便成了嚴重的問題。

大部分愛爾蘭的農民，自己却又不能離開愛爾蘭的土地，即使離開了那裏，也沒有什麼其他活路，真是陷入了升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困境；不得已，忍心地把自己的目不識丁的兒子，送到紐約去謀生計。

大多數的農民之家，便都早已等候着郵船從美國駛來。船到愛爾蘭岸，便有一行列的農民擠到郵局裏去，接取他們的兒子從紐約寄來的信件，或是黃紙包裹裏的郵局匯票。如果匯款到了，那麼就有吃醬汁的煮青魚和番薯的運命；否則便只得空嚼番薯，或者甚至畫餅充饑！

在荒年的時代，確是連番薯都沒有吃；因為所有的番薯，都被寄生菌蛀壞了。

像這樣深刻的貧窮的一般狀態，要想獲得地主階級的救濟和援助，是絕對不可能的，猶如求眼不可見的騙人的上帝一樣。我們知道，愛爾蘭農民之所以貧窮，決不僅僅是天災，更不是上帝因為他們的愚不可及而對他們的譴罰，實際上却就是由於英國大地主的無情的殘酷的剝削關係。

我們試睜眼看看事實上的例證吧！

在一個佃戶——自然大多數是貧農——自己把土地改良了，或則把土地上的房屋改良了的時候，一切的那些改良，也都要無條件地被認作遊手好閒而不事生產的地

主的產業。一個農民，用了多少心血，多少精力，多少代價來加以改善了的土地和房屋，白白地給地主奪取了去，這不是剝削關係是什麼呢！

愛爾蘭的一個地主，就是英國的一個貴族，他自己什麼都不辦，只管交托給一個地產經理人。由是，經理人便是地主的全權代表。他時時刻刻地想出許多殘暴的計謀，加重了貧苦農民的負不勝負的擔子。他常是以這種的改善條件爲藉口，任意向佃戶加租；如果不承認，便立刻用腳把佃戶踢出，不准繼續租用。蠻橫的暴行，硬逼得愛爾蘭農民處於暗無天日的地獄一般的生活裏。明明是農民用自己的力量所得的改善，反被經理人藉口加租，而且濫施淫威，這不是剝削關係又是什麼！

一聲春雷，農民的沉夢立被喚醒。在當時的黑暗勢力下，只要登高一呼，便不愁沒有羣衆來響應。於是費尼亞兄弟會會員(Fenians)起來了，地方自治論者(Home Rulers)也接踵而至了，他們的根本目的，在使愛爾蘭脫離英國而實行獨立。

費尼亞會是在一八五七年成立於紐約，係一祕密組織，他們的會員同志，雖有一部

分散居國外（美國，奧大利亞和倫敦），雖又有一部分已被禁錮或處刑，但羣衆對當局的反抗的熱力，却是繼續不斷的在躍進。

他們採用着文字的宣傳，以與當局對峙。他們辦了兩個雜誌，一個是『自由人雜誌』（Freeman's Journal），一個是『國民』（The Nation），以作他們的抗議工具。『國民』的主編者是杜飛（C. G. Duffy），後為當局所檢舉，以重罪犯而被驅逐出境。

在另一方面，地方自治運動的發起者，首先是布特（T. Butt），繼之者為派訥爾。派訥爾死後，運動的火焰仍未稍殺，反愈趨於熾烈。實在的，農民運動是起因於經濟的壓迫和困厄，只有到它全部解決時，運動才會停息下來。

到了荒年過後，糟糕的還是沒有肥料。愛爾蘭農民所能供給的唯一肥料，不是別的，却只是身上的汗水吧。他們從外國購來了海鳥糞，直到土地能夠供給充分的家畜動物，解決得了問題的時候才止。

愛爾蘭當時的交通工具，通常是以驢車和兩輪馬車（橢圓形的）為主。後者是愛爾

蘭特有的一種車子。御者坐在車前的高座上，行李則安插在旅客與旅客之間的空處。

主要的城市都貫通着原始的火車。支路上則有又大又黑的兩輪馬車，每輛都有馬四匹，可通到次要的城市。但就大體而論，祇有兩輪馬車和驢車，才是用以運載愛爾蘭人從一貧苦的居留地到另一居留地的唯一工具。

在這些艱苦辛酸的年代，凡是能找到工作的人們的唯一實業，便只是打獵——在大地產上的不合法的打獵和網魚。貴族階級，認為這種打獵是偷盜行為，應加以刑罰。其實他們自己從愛爾蘭農民那裏偷盜了土地，才真是偷盜行為，應加以刑罰纔對呢！美國人只把偷牛羊的事纔認為偷盜行為；支加哥人也只把綁票纔認為偷盜行為，打獵只可以算是兒童的游戲而已。可是在歐洲——愛爾蘭便是一例——竟把打獵的事目為可恥到無能形容，真是咄咄怪事！

關於這點，有一個當日的典型的幽默故事。據說，有一個地主，在某日朝晨散步之際，

突然撞見了一個獵者。地主便說明他自己原是因為吃了早餐出來開胃的；同時問那個獵者出來幹什麼。獵者回答着說：

『我倒是因為開胃纔出來吃早餐的哩。』

像這一類嚴重的事理，出之以苦笑似的笑話，弄得哭笑皆非，這無非是企圖逃避現實，忘却現實罷了。但是，愛爾蘭人雖然想離開無情的現實，然而無情的現實却不肯離開愛爾蘭人，這是事實。因此，荒年，凍餒，血腥，淚水，普遍於全國，洒滿在愛爾蘭的土地上。自然，另一方面，「不在地主」的制度，剝削關係的束縛，還都是緊緊地攫住了愛爾蘭農民的喉嚨。總之，整個的愛爾蘭苦受着英國貴族地主的壓迫和侵略。向敵人說『笑話』，反使敵人寬寬心，舒舒氣，這正是作用吧，除此以外還有什麼作用可說呢？

這種喜劇的，擅作輕快舞的愛爾蘭人，據蕭伯訥說，是一種舞台上的虛構。他並且說：

『在愛爾蘭國民向才智遲鈍的英國人玩弄的惡作劇中最怪悖的，便是把傳奇的空想的愛爾蘭人騙賣給牠。』他又說：

『最惡劣的惡作劇便是當偽造的式樣侵入文學中的時候，它打動了少年少女的空想。他們玩弄惡作劇，成了習慣，因此，這年代小說家和音樂廳裏的作歌者的空虛的幻想，適足以造成下一年代的不快意的、惡意的種種現實。』

蕭伯訥是愛爾蘭人，但也不是愛爾蘭人，他自有他的解釋。他是生在愛爾蘭，他的土語是斯威孚特 (F. Swift) 式的英語。這種語言據說是和教堂音樂差不多，可決不是牛津或倫敦報紙上所用的那種莫可名言的混雜語。

要懂得蕭伯訥是怎樣的一個愛爾蘭人，以及他的故國是怎樣的愛爾蘭，最好的圖畫是刻繪在他的『約翰白爾的他島』裏面。這篇作品，可以算是他的著作中的最好的創作之一。在那裏，蕭伯訥借着書中的主人公的影子表現着他自身的性格，雖不曾表現得完全，但確是一段很好的印象描寫，一個恰當的輪廓：

『他從幻想中獲得了自由，有逼近事實的能力，有雄勁的勤力，有銳敏的智力，更有

充分的想像力，從貧困和厄難中打出了「一條活路。」

同時，這個劇本又深刻地表現着愛爾蘭的精神：

『哦，夢想！夢想！苦痛的心焰，永不滿足的夢想，夢想，夢想……一個愛爾蘭人的想像，從不放鬆他，從不滿足他，從不使他心折；可是它使他不能面向現實，也不能與現實周旋，不能把握現實，也不能征服現實。他祇能報他們以冷笑，他祇能像街頭的賣淫婦那樣去取悅於不相識者……一切只是夢想，一切只是幻想……這種幻想，簡直是你如果沒有威士忌酒，就決不能忍受的一種苦楚。』

第三章 他的父系

本章展開一個典型的愛爾蘭人蕭伯訥的祖先：他的祖父，祖母等，尤其是他的父親——一個酒徒和磨坊主人。

一提到威士忌酒，我們便立刻會得聯想到蕭伯訥的父親——蕭卡爾 (G. Carr Shaw)。

他是一個有名的酒徒，但是他並不祇是一個酒徒而已。他對於家庭方面，固然不算是一個怎樣負責的父親或能幹的傢伙，但是他終究不會因他的失意的生活，而把他孩子活活餓死；相反的，他給蕭伯訥的本身和他的作品留下了一個顯著的遺產。在性格上，在劇本中，在書信中，在任何形式中，都有他的影子，完成了作為一個嘲笑者的蕭伯訥的描寫藝術。

這個酒徒，在蕭伯訥的回憶裏，投射了一道陰鬱的光。當蕭伯訥還幼小得像他父親的靴子那樣高大的時期，據他自己說，有一次，他的父親和平時一樣帶着他出去散步，蕭伯訥心中忽被一種恐怖的懷疑震懾住了。待他回到家來，便對他母親低語似地說：

『媽媽，我看爸爸是醉了呢。』

他母親帶着一種厭恨的神氣回答他：

『他又有什麼時候不醉呢？』

自此以後，蕭伯訥說：『我從不相信什麼，而嘲笑者的經歷便從此開始了。』

蕭卡爾是一個有名的酒鬼，一個商場的失敗者，尤其是一個被認為墮落家風者。

蕭的一族，本是紳士之家。凡是蕭族中人都自稱是古奇之家，是從 Shaigh 一直傳下來的，是沙士比亞戲劇中所敍着的馬克培斯 (Macbeth) 的兇手馬克獨夫 (Macduff) —— 法也夫伯爵 (Earl of Fife) —— 的第三個兒子。

因此，蕭族不是愛爾蘭人，而是移民到愛爾蘭的盎格羅蘇格蘭人。他們取道哈姆普夏(Hampshire)來此，始於十七世紀末葉，迄今已有三百年的歷史。

克倫威爾(Cromwell)的孫女，曾嫁給蕭族中的一人——一個鄉間的縉紳。在一八〇二年，出了一個善於經商的蕭老白(Robert Shaw)，他來到杜白林，開設了皇家銀行(Royal Bank)，曾以『蕭氏銀行』的名字聞世。這人就是蕭伯訥的祖父的從兄弟。

關於這一世系，蕭伯訥並且作過如次的說明：

『我的血統，是大多數英吉利人的血統；這就是說，我沒有那種「名義上是土著的愛爾蘭人而實質上是通商入境的北部西班牙人」的血統。我是丹麥侵入，諾曼侵入，克倫威爾侵入，以及（當然）蘇格蘭侵入後的一個正式的、典型的愛爾蘭人。』

蕭伯訥的祖父，是一個杜白林城中的股票掮客，娶了一個副牧師的女兒為妻。他生產兒子，比生產銀子更多。在一八一七年的除夕，又有一個兒子呱呱墮地了。這就是蕭卡爾。

蕭伯訥的祖母——蕭卡爾的母親——自從她丈夫死後，在杜白林市外的台蘭奴（Terrene）村莊上弄了一個村舍。這是一座戈特式（Gothic）的村舍，至今還巍然存在着。她的生活非常清貧，因為自爲寡母以後，遺下的孤子孤女共有十四人之多，別的不必說，即僅以衣食而論，也是常虞不足的。她永遠懷念着往日的高華的門閥，甚至不忘她丈夫的優越的身分，所以在客廳中，高懸着他的銅盞與寶劍。

她的兒子中的一個——即蕭伯訥的伯父——決定要改良而上進，革除了煙酒的嗜好，代之以吹大喇叭的習慣。但他還沒有從中得到安慰，於是結了婚。結果，他也不滿意。他後來購置一副雙眼鏡（Opera-glasses）和一部「聖經」。聖經讀倦了，他便帶上了那副雙眼鏡到沙灘邊去窺看海濱的女子游泳。這個『改良』的人，終於自殺。

他們家中的人相信，一聲雷擊，不會在同一處打死兩人，便把那副雙眼鏡和那部聖經傳送給蕭卡爾。這是理由之一。其次，是因爲蕭卡爾除了看報以外，別的是從不窺視的。此外，一個大兒子——即蕭伯訥的最年長的伯父——是一個大學校出身的人。有

幾個是賺了些錢的。甚至還有一個起初發了一點財，後因開採礦山，損失殆盡。有兩個僑居國外，在新西蘭和澳洲很順利。總之，所有的蕭族中人，全把他們的目光注視着蕭老白，以他為唯一的標準。

這位蕭卡爾在他四十歲成婚之前，一向飲酒度日。自從他在一家鐵廠離職以後，便尸位政界，坐領了一點乾俸。但是這個腐敗的官署，不久却根本取消了。自此以後，他只得靠着每年六十鎊的養老金來過活。後來，他又把這項養老金的特權轉讓給人家，得了一筆款子，開始進行他在商界中的活動。到了四十歲那年，貿然地討了老婆。除了酒癮以外，他似乎並沒有其他的什麼惡習慣，並且他這時也已經不常喝醉了。他有一雙斜白眼，因此孩子們見他便笑，便覺得有趣。王爾德的父親——一個著名的眼科醫生——曾想竭力把他的斜白眼醫好，但是結果反而是愈醫而愈壞。

蕭伯訥的父親，雖以他出身官家的環境的優越，他的社會地位却全然沒有，錢也沒有，依然是兩袖清風。他也處之泰然，安之若素，因為他是沒有什麼大志和野心。他從不哭

泣。蕭伯訥說他是蘭勃（C. Lamb）的一種氣質。然而蕭卡爾有抑鬱和痛悔。有一次，把他一隻獵狗追捕一隻貓，結果貓被殘害在狗的毒齒之下了。從此他認為自己的一切不幸的運命，純然是對於這種暴舉的一個公正的處罰。反之，他認為仁善的人，決不幹這勾當的。

蕭卡爾對於音樂，嗜好很深，尤其善吹大喇叭。蕭族對於音樂的擅長，可說是一門家風。他們幾無人不會玩奏小梵華林，豎琴，大喇叭等樂器，而大部分，尤其是婦人們，善彈鋼琴。

最初，蕭卡爾以他的一筆款子，投資在一個麵粉行裏。後來從這一個麵粉行，提出了這款項，和人合股在鄉間設立了一所磨房。這磨房的殘跡，至今尚斑斑可考。

在磨房那裏，蕭伯訥常和他的父親，大約每星期總有一次，在朝餐前去作一回散步。同時，在父親玩着商務之際，兒子便也在磨房小池之旁玩着孩子的遊戲。當他把磨房收買下來的時候，營業狀況頗稱旺盛，但在他的努力經營之下，為顧客所累，幾至瀕於倒閉。

在這種嚴重的危機之中，蕭卡爾因生性樂觀，亦從不寒心。一個合股的股東，只是哭喪着臉，他却獨自背着他，發着笑聲。

他是慷慨豪爽的，甚至他的妻女，因生計關係遠走倫敦時，他還是盡其力之所能，從老磨房中提出每星期一鎊的款子去匯給她們。自然在實際上，一切的門都已與他自己嚴閉着，拒之於千里之外了。

蕭伯訥說及關於他父親的時候，會有這樣的幾句話：

『如果你約我父親去吃飯或赴宴，當他入席的時候，他是並不老是清醒的，但當他離席的時候，他却總是酩酊大醉了。是的一個愛熱鬧的酒徒或許在他的愛熱鬧的酒侶看來，是助興的吧。甚至一個好爭論或者好誇口的酒徒，或許在一般不講究喝酒的人看來，也是可以取悅的吧。然而一個可憐的酒徒——我的父親就是一個，他在理論上是一個絕對戒酒者，但他却苦受着酒杯中的羞恥和悔恨——却是不可容忍的。我的母親，便靠着她的音樂的才幹，從這種困境之中把她自身解救了出來。我的父親，終於因一陣痙

擊的發作，當某星期日的午後，在我們的門階上昏蹶倒地，從此以後，我父親才把絕對戒酒主義，從理論方面進於實行方面來了。因為這次的猝病，使他相信，非真的戒酒，即不免於死亡。』

這樣，酒是停飲了；但是不幸，在一八八五年，死的運命也降落在他的身上了。同時，老磨房的運命也一併告終了。

本章講蕭伯訥的母親是怎樣的在紳士父親和舊式姑母的鐵蹄之下的一個被壓迫者的人格，和她對於蕭伯訥的影響。

一個是糊塗的，隨便的，沒有辦事才幹的男人，一個却是絕對相反的，很自然地前進的婦人，——蕭伯訥便是他們倆的混血的結晶。

蕭伯訥的母親，名字叫呂新達·伊利沙白 (Lucinda Elizabeth)，小名叫做培賽 (Bessie) 出生在一個姓歌萊 (Gurley) 的家裏。

原來，蕭伯訥的外祖父歌萊·培葛那 (W. Bagnal Gurley) 是一個鄉下紳士，同時在地主世家的傳統儀式上却很有些貴族氣味。譬如對於金錢的事，就茫無所知，除承繼外，他又不知錢是從何而來的；除抵押外，他又不知如何彌補。

歌萊頸間，長着富有元氣的短鬚。他像牧童和十字軍兵士一樣善於騎馬。無論是人家騎不慣的野馬，他也能駕御，因此有許多人以二百鎊買進的馬，往往願意只要原價的十分之一賣給他。照理，如果他這樣去從事於『羅賤販貴』的事業，他定能彌補於萬一，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他不但不能這樣做，却還負了一些債。他每逢需要錢用的時候，便把自己的產業抵押出去，隨手揮霍，視黃金如糞土一樣。逢到人家受經濟壓迫時，他也樂於資助，毫無吝色，至於對方有無償還可能，他全然置之不問，因此他的產業繼續不斷地從他的手指縫間漏落出去了。

他雖是這樣一個游手好閒的人，但也並不是全無好勝心的。除了騎馬以外，尚能勝任其他的形形式式的貴族式的事情。他是一個百發百中的鎗手，是一個不倦怠的漁人，而且自己還能造船。

他有恃無恐的，優遊了八十五年的歲月。他娶妻兩次。前妻——即培養的生身之母

——早已先死。自從她死後，培賽——蕭伯訥的母親——便在她的姑母的教管之下撫養成人。這一個姑母，是一個表面溫和而內心殘暴的悍婦。她具有着像俾士麥那樣的一種意志。她是一個嚴酷不過的清教徒。她的背是駝得很難看的。

根據這位駝背的姑母的主張，美麗的培賽，將承繼她的財產，唯其如此，應該訓練她成為一個婦女界的尤物，而使她許配到一門高貴的親事。因此，培賽的坐法必須挺直，不許她高聲談話，不使她學習任何有用的事，並且不使她知道自己揮霍的錢是從那裏來的。

在這種嚴厲的教養之中，她學會了鋼琴的彈奏，領略了『和聲學』的理論基礎。

這位秀美的少女，走在杜白林街道上的時候，從不窺視路人一眼。甚至當她走過以時髦女裝爲窗飾的店門口，她也是一步不肯停駐的。她愛花，愛狗，而且愛花強於愛人。她對人雖也是十分仁篤，待她的朋友們也很誠摯；可是一經破裂，便永無轉圜餘地。她的嫉妒和羨慕之心，看來是兩樣都沒有的，甚至於情慾也是沒有的吧。真的，她是一個無性的。

婦人在她的兒子蕭伯訥的目中看來，也幾疑她不會生育過他們姊弟三人的哩。

培賽的父親在日，曾從這一位富裕的駝背的姑母手中，告貸了不少的款項，過度他的鰥居生活，有二十年之久。然後他又企圖設法續絃了，這件事令人驚異非常。他的女兒培賽當即把這消息寫信告訴了她的舅舅約翰。約翰原是歌萊的債權人，歌萊欠他的錢很多，於是約翰聽到他有續絃的消息，頓時心火上騰，怒不可遏。正當準備行結婚禮的早晨，歌萊買了一雙手套，走出店門口的時候，就被約翰捉住，終於約翰向他提出了償清舊債的嚴峻的要求。

這項要求，自然是對歌萊的一大威脅。睚眦必報，惱羞成怒的他，便向自己的女兒出氣，認為她有意破壞他。於是從此以後，永遠禁止女兒進門，不但這樣，他還決定把他的財產，故意不支配給她。總之，他宣告了父女脫離關係。

他的律師出來向他調解，請他收回成命，不必爲了一時的衝動，徒傷父女骨肉之情，而且懇求他，使他的女兒長大成人時，讓她分得五千金鎊。但是這款項，在培賽的一生中，

倒也似乎並不需要。

從此，培賽便不得不完全引渡到她那鐵蹄一般的姑母亞倫的手裏。她在這裏當然也是無法忍受下去。因為當她父親還沒有建立他的新家庭以前，她早就開始表示着反抗她姑母的意思。後來，對這令人可畏的亞倫姑母，她掀起了徹底的反抗。她反抗她姑母的宗教和偏見，同時更反抗她姑母把這種宗教和偏見灌輸在她自己的身心上。

到培賽出嫁之後，結果是怎樣呢？

培賽受了這種嚴峻的高壓教育，增加了她的反感之餘，對於她自己的孤子蕭伯訥，却給他以自由自在的發展——這自是被壓迫者的人格上和心理上招致的一種反動，這毫無疑義的是必然的結果。

據蕭伯訥自己說，她讓他一味的放任自由，不加絲毫的訓育。但他與他的母親始終是保持着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和諧狀態。同時，因為她富有音樂的天才，更養成了他對於

音樂的深沉的興味，因而增進了她們母子間的精神上的協調，並且美化了他們母子間的感情關係。

這異乎尋常的一對母子，雖然是在完全和諧的狀態中生活着，而是彼此從不接觸一下，從不在一起聚餐，也從不互相討論任何事情；事實上，她們母子之間雖是絕對沒有什麼隔膜，然而可以說是彼此差不多沒有交談過。她們彼此並不保護，並不照料，也並不顧問彼此的行動。

這樣看來，這母親和這兒子，確是各自過度着各自的生活，各自走着各自的路，也各自做着各自的夢，毫無片刻的傾軋或衝突。怪不得有人問過蕭伯訥關於他的母親的事，他只是這樣地回答着：

『我們的關係是絕對地美好的。』

在蕭伯訥的母親陷於幻滅的時代，在一切的憂患和苦悶交相侵襲她的一身的時代，這種『各過各的生活，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夢』的現象，確是不能責備她的。她的醜

酒的丈夫，她的貧窮的重壓，她的鐵面無情的父親，他的嚴厲苛刻的姑母，自己對兒子的負擔等等——這一切都似乎是造成了她的生活的雜碎之一部分。因此她把他們一概交給冥冥的天意，聽天由命，甚至對於她的兒女們，也不能不淡漠視之了。

蕭伯訥在七十年後，把他的母親下了一個總的估價說：

『如果稱她不是一個良妻賢母，那是錯誤的，因為她不是一個壞的母親，而且不能虐待任何人物，無論對方面是怎樣深切地傷害她或怎樣沉痛地沮喪她。她祇不過不是一個妻或母罷了。猶如我的父親一樣，她也是一個無望地不知壓制為何物的人；因而我們在兒童時就得在那「無愛無恨，無畏無敬，只有人格」的家屋之內，自己摸索自己的路。』

從後來的許多事實上，我們的確可以看到蕭伯訥的母親，對於蕭伯訥的前途上，完成着一個開路者的任務。她不僅是性情溫雅，才能超卓；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她那獨立的精神和深明的思想。

自從蕭伯訥的父親死後，她就以其全部的心力，爲了自己，並爲了兒女們，努力向前奮鬥。她知道自己的特長是在音樂方面，便不顧一切地掙扎着，終於在杜白林城中謀得了一個位置，藉此給養一家。後來，又毅然遠去倫敦，賣歌喉，當教師，努力把自己全家的人口，解除了麵包和白搭的苦厄，直到蕭伯訥能夠自立成人。

她的音樂天才，頗爲她的兒子所推崇，所敬愛。她的曼妙的嗓子，甚至在她七八十歲的時候，也還清脆動聽，不減昔日！她活到八十高齡，而她的清歌，她的喉音，才不復在人間曳聲。這是一九一三年。

第五章 他的誕生

本章講述蕭伯訥父母結婚的經過，蕭伯訥的「三個父親」——蕭伯訥母親的「無邪的三角關係」及蕭的誕生。

爲一個無情的父親所驅逐而又爲嚴酷的姑母的鐵蹄所踐踏了的培賽，此時已經到了成年了。在她的男友之中，有一個就是蕭卡爾。那時他比她自己的年紀大一倍。她雖然看見蕭卡爾不但不知如何賺錢，而且不知如何生息；不過在她的目光中，他總是一個蕭氏，一個望族，因此總是值得重視。終於蕭卡爾和她兩人之間，情感日益濃厚了。

有一天，他在她的面頰上吻了她，向她求婚。此時此際，正當她的生機已陷於甚形嚴重的問題，她怎得不樂於接受他的愛情呢？如果當時他吻了她的嘴唇，她或許會由於他的氣息而實行拒絕；但是她那時對於生活之無知，簡直是令人膽寒的。

的確，她對於生活是無知的，但是她的朋友們並不是這樣，曾經對她說不要嫁給他，嫁了怕要沒有幸福。

『爲什麼？』她急須知道。

『那人是喝酒的，』他們告訴她。

『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培賽，怪你自己不先問問我們啊。』

她頓時離開了他們，直向蕭卡爾的地方奔去，問他：

『這是不是真的？』

『什麼真不真？』

『說你是喝酒的。』

『喝酒嗎？不，我是一個終生不變的戒酒者哩！』他憤憤地說。她相信着他，真的，他也相信着自己。於是結婚了。

麵粉行或磨房的生產力，不能供她的往日未嫁時那樣闊綽的生活費，但是在她體驗到這一件事情以前，她却先發現了一些更可悲的事實。他們的蜜月旅行，是在利物浦（Liverpool）。他的行動已經使她生了懷疑。有一天，事情終於「水落石出」了。她打開碗櫃一看，裏面都是些空酒瓶，纔察出他是千真萬確的酒徒。

一念之間，她決定離開這房子，同時拋棄這丈夫。她負氣來到了埠頭上，彷徨着猶如一個幽魂。她的心上，只自想要脫離這個可怕的處境，就是做一個船上的女茶房，她也無不願意。然而，在事實上，她發現了那邊埠頭上的男子，比她剛才離棄了的丈夫更粗暴，更酗酒。於是，她只得悵悵然回到丈夫那裏去，繼續忍受她的運命。

此後數年之間，她與這個低能的丈夫一共生下了兩女一男。

這男孩子是在她出嫁後四年纔生於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杜白林。他們就給他襲用了父親的名字喬琪（George），同時給他襲用了這喇叭手的伯父的名字伯

訥 (Bernard) 於是，他的名字便叫做蕭伯訥·喬琪。

蕭伯訥追敍他自己的誕生的地點說：

『我生於杜白林邊地一條不時式的街上的一個小屋裏面。任何身分的職業家，誰都不能在這樣的一個地點招收什麼時髦的學生或病人。這座屋子：在地底層，有一間廚房，一間僕人的臥房，和一間食品房。在樓下層，有一間客廳，一間育兒房，一間作父親的換衣室之用，後來又作我出了育兒房後的臥房之用的小房。在樓上，有一間休息室，和最好的臥房。這就是這小屋的全部。』

這條不時式的街，名叫上新街 (Upper Singe Street)。在蕭伯訥早年的印象中，他還記得後來這條上新街與中新下新兩條街合而為一，他家的門牌則由二號改為三十一號。

從這裏出生起，蕭伯訥又用過很簡短的文字說明他的一生所走的路。他說：

『我生在愛爾蘭的一條街上，在那裏過度着十七世紀式的生活，所不同的，只是已

經有了煤氣燈和戴高帽的警察罷了。就在兒童的時代，文學和音樂，把我引進了十八世紀。自後，因為發現了一種不用翦燭芯的蠟燭，買了一架鐵製的鋼琴，並開始從事於霍亂的預防，從此我的生命也就更進了一步。最後，我渡過了聖喬琪海峽（Saint George's Channel），投身於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小說家特羅勒普（Anthony Trollope）的英吉利的霧裏，靜靜地直向時代的前方——易卜生，尼采，費邊社和我自己的著作時代的前方進行。』

後來，蕭伯訥說，他們搬到了黑區街（Hatch St.）一號。這地位是比較地時式一些了，房租也比較高昂了。這裏共有房間八間，地底層和食品儲藏所在外，但也沒有花園。在這裏，蕭伯訥的母親突然遭到了一個意外的奇遇。

從任何觀點上看去，蕭伯訥的父親，作為培賽的丈夫，是一個顯著的失敗者。蕭伯訥的母親痛感於人世的蒼茫，靈魂的孤獨，便投到音樂裏面，那是當然的。又因為她不相信

宗教，於是音樂就成爲了她的宗教。（直到多年以後，她纔信奉精神主義）——在這中間，據說她獲得了少許的慰藉和喜悅。

發現蕭伯訥的母親是一個音調特殊純粹的中間最高音部的歌者的，是音樂教師萬達老李（G. J. Van Daleur Lee）。

他在生理上猶如培賽的駝背的姑母一樣，也有殘疾。萬達老李跛着腳，走路頗感不便。他在他的兒童時代，從樓梯上跌了一交，所以兩脚已跛，一隻大腿比另一隻短得多。他是一個獨身主義者，他以爲音樂應高出一切之上。

當萬達老李的少年時代，他家中聘有家庭教師，爲之教導。結果，因事不能如其願，萬達老李便憤然提起釣竿，把那教師打走了。及長，他就以教歌爲業，贍養他自己及其弟弟的生活。弟死，萬達老李心痛欲狂。

此後，他發現了蕭伯訥的母親的歌喉和音樂天才，他感到非常的滿意，非常的興味。他需要她幫助他共同完成音樂的事業。

他又是一個生理學家。他研究而且解析了喉部的構造。他因此發現了唱歌的技巧——所謂『祕訣』。當他忠於『祕訣』的日子，就是她忠於他的日子。

萬達老李來到蕭氏家庭中的時候，是在他的弟弟死後。他因為需要一個合式的地址，找了一個住宅，在他覺得太大，而在蕭氏則又覺得太貴。經雙方商量的結果，決意合力建立一個聯合家庭。這住宅就在黑區街。從此，這異樣的三角——蕭伯訥說過，這不是基於姦淫，而是基於『祕訣』上面的三角關係——便達於全盛時代了。

音樂傑作的歌聲響徹了這個屋子。蕭伯訥便在這種雲圍氣裏一天天生長着。

無論如何，蕭伯訥說過，他不像是一個結過婚的人。他的上唇和下頷是修薙着的。他的臉龐是長滿着海盜式的黑鬚。他對於服裝方面，非常講究而且整潔。他賦有一種個人的風格，生理上的靈敏，以及在一切嘗試以後似乎必能成功的技巧。總之，他是一個漂亮的唱歌教師；是他的歌劇團裏的領袖人物。

萬達老李和蕭氏一家，相住了數年之後，他決定要離開杜白林，到倫敦去。這件事，使

他們一家都感到寂寞難受。呂茜（Lucy）——蕭伯訥的大姊——主張自己和母親還是與萬達老李同行，藉以維持生活。

同時，舅父華爾透（Walter）又在航行大西洋的海船上做外科醫生，不能常照顧得到蕭氏家庭。蕭伯訥的父親呢，窮得無以自給，勢已不能維持家計。於是經母女共同籌商之下，還是以『到倫敦去』為上策。

她們跟着萬達老李來到倫敦後，蕭伯訥的母親不得不放棄她那愛美者的身分，而再度開始她的音樂的職業了。

萬達老李的教歌的祕訣，到倫敦後竟是無人領教。因為這種教法，往往非將一個學習者受上三年的訓練，決不能養成一個唱歌的人才。那時在倫敦的一般教歌者，只用一二課目的速成法。蕭伯訥告訴人家說：

『他們不需要我的母親那樣的唱法。他們需要的，却是像賣淫婦那樣的唱法；就是那樣地唱着罷了。』

萬達老李眼看着自己不合時宜，便也因風順勢隨波逐流地改用他們的教法，每課僅收學費一個基阿那。他把名字稍稍改去了一兩個字，又把黑鬚剃去，留蓄了一簇口髯。這樣一來，萬達老李用功的日子是過去了，他成爲了一個江湖術士。蕭伯訥的母親，對他是完全抱着幻滅的情緒了。

最後，他的教歌生活落潮了，錢財的源流也停息了。他的住所，變成了夜總會。在某晚，當他上床的時候，他忽然一命嗚呼了。

在本章的結論上，最好還是讓蕭伯訥自己來說明這一種天真的，純潔的，無邪的三角關係。他用文字承認着說：

『在我的劇本「非配偶」(Misalliance)裏面，青年主人公是一個「有三個父親的人。」如果我自己不曾有過三個父親，我當然不至於想到那麼一回事：我的正式的父親，音樂家，和我的舅父。』

他又繼續地寫着：

『萬達老李，他想和我的母親完全把我父親撇在一邊；可是怎麼也不會成爲代庖，反而在結局上，她還是對於她的丈夫好感些，比對於這位英雄。現在我與我父親的面貌上的相似點是很明顯的。而且絕對不與萬達老李有一絲一毫的相似點。——這事實還用得着聲明麼？』

第六章 幼年時代

本章講蕭伯訥的幼年時代的憂鬱面；他的學校生活和家庭生活。並講他對於過去教育與生活上的觀感。

這位七十七歲的老人，如果回顧到他過去的時代，尤其是他的幼年時代，他是一定猶有餘痛的。因為他的幼年生活，完全是屬於悲慘憂鬱的一面。在文學中，在作品中，他常常這樣提起些沉痛的往事。

關於她的母親，他說：

『她忍受了兒女們的父親，貧困，飲酒，以及其他一切，讓他們交給僕人們，（唉！我的上帝！這是什麼僕人，僅僅是老保姆威廉士（Williams）罷了）又把他們交給天意，六年之間，她自己對他們竟全不關心。』這自然是貧困的不幸，這絕對不是為母親者的

罪惡。

蕭伯訥的第一篇文藝作品是一篇祈禱文。但這純粹是他的創作，並沒有參考過祈禱文的程式。這篇祈禱文，共三節，結束的部分是『主禱文』(Lord's prayer)。

他並不是祈求什麼上帝，他倒是贊成靡非斯安非爾斯(Mephistopheles)〔即德國歌德名劇浮士德中的大惡魔〕。甚至在他的幼年時代的寢室裏面，把這位大惡魔的像片釘在牆上。

在他十歲以前，他的父親對宗教也嘗淡漠過一時。蕭伯訥自然也不會例外，甚至把『聖經』常加以譏嘲，想藉此娛樂他的父親。最初，父親見其如此，雖曾大驚失色，但往後也就聽其如此，不加可否了。

有一次，他跟着他的父親出去，到吉利南海灣(Killiney Bay)去遊泳。遊泳這玩意兒，至今還是他愛好的游藝。他父親為要教育他以游泳的重要，便說他自己曾在十四歲時在水中救起過他的一個兄弟。這句話給蕭伯訥聽了，吃了大驚，父親便臨機應變地

接着告訴他說：『可是真的，我此後一生中，從沒有像那一回那樣難受過！』

蕭伯訥聽了他的父親的反遞進法（Anti-climax）申明之後，便笑逐顏開，一跳就跳進海水，學習游泳。這一次是最有趣味的嘗試。

蕭伯訥進的故鄉的學校，叫做威斯萊聯合學校（Wesleyan Connexional School），現已改為威斯萊專門學校。在這以前，他曾在他的親戚長輩加樂爾教士（Rev. W. G. Carroll）的教誨之下，讀過一些拉丁文法。威斯萊學校校長克羅克（R. Crook）是一位神學博士，在他看來，教育的唯一科目便是古典文學，換句話說，也就是拉丁文和希臘文。對於這種迷信的，守舊的教育，蕭伯訥是受不慣，於是為要逃避宗教科，便時常遲到半點鐘。一來他是通學生（即走讀生），二來他的居處又離校較遠，所以寄宿生所受到的一切宗教氣氛，在他是從不曾接觸到的。

這種紳士教育，對於蕭伯訥徒然燃起了許多反抗的熱情。他不但沒有吸收進什麼學問，反而把從前加樂爾已經教給他的智識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不願而且不能讀

學校的課本，然而他手頭所能得到的一些課外書籍，却是孜孜兀兀地無所不讀。

關於這點，最近有一位女新聞記者，曾與之作過一番談話。她問：『假如你現在有能使你重新過你的幼時的學校生活時，你願意再進學校去過同樣的學校生活嗎？』

蕭伯訥毫不躊躇地反問她：『你想想看，如果一個人被法官判處了做苦工的罪，當他做了之後還肯重做一下嗎？』這一問，把新聞記者弄得無辭可答。蕭伯訥從從容容地告訴給她聽，凡是愛學校的兒童，都是那些怕父母比怕教師還要厲害的兒童；學校祇好像是一座可厭恨的監獄；父母們故意把兒女們送去關半天功夫。

當那位女新聞記者，繼續提出了『近世學校教育對於兒童方面的自由，是否比從前那樣的訓練要好一些？』的時候，蕭伯訥就回答說：『這個我還不知道。不過在我當日所進的學校裏，既無所謂自由，也無所謂訓練。他們只叫你讀他們所教的書，只叫你靜坐，倘若你不照他們的話做，他們就打你幾下，強迫你那樣做！』

蕭伯訥在當時的學校生活中，自然不肯死記那些只預備考試的無聊的學問，他不

願硬記一些歷史上的年代和毫沒用處的人名和地名。到了校長訓斥他的時候，他便侃侃而談，對答如流，對於『死記式』的教育，提出各種反對的意見。不過，他也有一些偏見，就是反對數學。

他在消極地反對學校教育之餘，便竭力地找自救的一條路。怎樣的一條路呢？他當時就用『堅決的怠工』來救他自己的腦子，吸收文藝上的素養。例如他在上地理科的時候，就祇是在翻開了的地理的課本下面偷看他手頭所有的小說。

在家教上，教育上，他是失望到了不可言喻。這裏我來介紹他日後所得的結論：

『人類決不能由學校教師或其他教師，從外面救出來；它僅僅地足以被他們弄壞或奴化罷了。』

這句話，可以暴露出學校教育的墮落，暗示着社會改造的必要。

在別處，蕭氏也曾說過，學校教育與他自己是完全不發生任何深切的關係和健全的影響的。他甚至說過，他的學校生活，實在他生命史上最乏味而且徒耗光陰的一頁。

蕭伯訥在幼年時代，是最不懂得交際的。有一次，他和一個鐵器商人的兒子同在一起玩，他父親終於禁止他，不許與之往來。

蕭伯訥在一部作品裏頭，寫過一篇序，其中有這樣的幾句話：

『在我較早的兒童時代以後，我記得我沒有到一個親戚家去訪問過什麼人。倘使我的父親和母親出去到人家去聚餐或赴宴，他們的兒女們便要發呆得比自己的房子被火燒掉還更厲害罷。我的父親要改良社交，真是太遲了；本來社交的訓練，可以使人在私人社會中易於應付，但是我終於被拋在社交之外。結果呢，以我整個的一生而論，我祇是這個行星上的一個僑民，決不能算是一個本地人。』

在十歲以前的蕭伯訥，往往自安於他的『創造』的世界，完全浸淫於浪漫主義的情趣之中。

他愛音樂，猶如鴨子愛水一樣。他在小孩的年代，就常被帶去聽歌劇。當時他雖然懂

得怎樣去用口嚙 (whistle) 吹出歌劇的曲譜，但他却不明白歌劇是一種什麼東西。在他母親的照相簿上，夾着許多大歌劇家的照片，他們都是穿着夜禮服的。後來，在劇場中，他有一次雜坐在樓廳內，看見那裏也有許多穿着夜禮服的人，蕭伯訥便以為他們就是些歌劇家，正在疑奇之際，幕開了，才知道誰是歌者，誰是觀眾。自此以後，出入歌場，習以為常，所以他在十二歲以前，對於一切歌劇中的傑作，已能從序曲到終曲，作完美的口嚙。

繪畫也是早就吸引着蕭伯訥。十五歲時，他不必看目錄，已能在杜白林美術館內認取了許多意大利畫家和法蘭特斯畫家 (Flemish painters)。他自信，除了館內的職員以外，他是唯一的愛爾蘭人。法國大雕刻家羅丹曾為五十歲時的蕭伯訥，作過一個胸像，現此項藝術品，已經翻成大理石，由蕭伯訥交到杜白林市立美術館中保存，只要到過愛爾蘭的人，都還可以看見。

音樂上的技術的教養，他是沒有受到多少。然而他在很幼小的年紀，就已能用獨隻手指彈一種跳舞的曲子。嗣後在他母親來到倫敦之後，他便從新接近樂器，而且能夠在

公園巷（Park Lane）的音樂會上，擔任合奏者的一份子。雖則如此，但他自己始終沒有想到要做一個職業音樂家，甚至他的家長等也不會作如是想。

這一切的藝術和詩歌，給與蕭伯訥的影響，自然是很大的。他後來所發表的許多關於兒童訓練問題，都與工作和遊戲互有關係，而且不消說得，是完全基於他在杜白林的幼年時代所得的經驗。

他在兒童時代，大約是常被大人們干涉，不許喧譁的吧？要不然，他決不至於發許多關於這項論題的議論的。試看下例，便可證實：

『在遊戲時的小孩子是喧譁的，也是應該喧譁的；牛頓（Issac Newton）是肅靜的，也是應該肅靜的。小孩子應該把他大部分的時間放在遊戲方面，至於成人，則應該把他大部分的時間放在工作上面。因此，牛頓和小孩子，彼此不可作伴。』

然則我們的蕭伯訥自己是怎樣過來的呢？一言以蔽之，他的遊戲的時間既極短暫地過去了，而他的工作的時間却很早很快地追來了。於是，他就開始了他的工作！

第七章 工作開始了

本章講蕭伯訥心目中的兩個都市倫敦與杜白林，兩封信的處女作，和他在地產局中的職員生活的嘗試，以及在文學、音樂和語學工作上的準備。

『爲生活而鬥爭！』

『爲麵包而鬥爭！』

這是現代人的悲劇的運命。可憐一個乳臭未脫，羽翼未健的孩子蕭伯訥，不得不爲了自己的生活，去找一些工作。

他自己也嘗說過：

『人生好像戰爭，爲要射殺一個人，不得不放一千顆子彈。』

要尋生路，要吃麵包，原是一件正當合理的事；可是在爲生活的鬥爭中，這無情的社

會，對於窮困的孩子所施的壓迫，却特別深刻地殘酷而滑稽。蕭伯納雖然在那時候還只十五歲，一副羞人答答的神氣，如何找得到人，找得到事呢？但是說到他的資格，却已出人頭地。他能唱漢岱爾（Hadel），海藤（Haydn），莫札特（Mozart），悲多芬（Beethoven），孟岱爾桑（Mendelssohn），羅西尼（Rossini），杜尼冉蒂（Donizetti），培里尼（Bellini），維爾提（Verdi），剛諾特（Gounod），梅葉皮爾（Meyerbeer）的名曲；即使他對於某些不能唱的曲子，也能用口嘯吹出來。但是唉，名家的這種曲子，他的這種歌喉，竟不能換一口青菜淡飯，有什麼辦法呢？

仗着人家的介紹，蕭伯納走進了一家布店裏去謀事。店主人中間，有一個名叫斯高特（Scott），倒想錄用他；可是另一個主人名叫羅南（Rooney）却別具一副『慈善』心腸，說這樣的一個小傢伙是不忍讓他擔任這樣的一個工作。蕭伯納一看沒有希望，便拔腳逃跑了出來，大約當時他對於這位主張緩刑的慈善家，心中很是感激的，但是他片粒無勝的空肚子裏，却是一定在懷恨無窮！

感謝他的有勢力的叔父的提拔，他終於找到了一個職位。在一千八百七十年，蕭伯訥被薦到本市湯馨（Uniacke Townshend）所經營的一個地產經理局，在那裏，他足足守了五個年頭。最初的時候，充當一個小職員，月薪僅四元五角。和現在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如今，他是百萬富翁了。這個小職員，其實就是會計員，老是在每星期二搭車到鐵命奴去收租錢，此外就別無重要業務。這種生活經驗，後來曾經表現在他的最初的傑作『鰥天之室』裏面，讀者可以參讀。

一年之後，局中的一位會計員突然因事辭職，於是蕭伯訥便擢升上去，替代了他的位置。他辦事頗好，薪水也就增至年俸四十八金鎊，購置了一件燕尾服。事情看來非常順利。同時，他父親已經完全戒酒，覺得自己頗有厚望。

然而，蕭伯訥的希望，却並不在此。他已厭憎這項業務，這個公司，甚至這個『哄笑之城』（他自己曾這樣說），所以他一心想逃出杜白林，到倫敦去。他認為到了那裏，一定就有成就藝術家的事業之可能。

當時，蕭伯訥的一個舊時的同學，後來是成爲愛爾蘭小說家，名叫麥克訥蒂（Edward McNulty），正在愛爾蘭銀行的紐萊分行（Newry）裏做事。據說他們兩人之間，魚雁往來，差不多每天不斷，後來一致主張焚去信稿，亦是一段妙事。大約這些信稿久已不在人間，否則，其中所說爲何事，亦大可研究吧。

寫信的本領，蕭伯訥非常擅長，有一次，他聽了一番說教之後，便寫了一封給『公論』（Public Opinion）雜誌的信。這是充滿了反宗教反教會的感情的第一封信。

一個無神論者蕭伯訥的書信，雖然還沒有轟動世界，却已震驚了蕭的家族。蕭伯訥的伯父他們都聚而商議，要對付蕭伯訥。但結果，蕭伯訥並沒有受到被他們擊死及類似刑罰。

還有一次，蕭伯訥投寄了一封信，給『伏提味爾雜誌』（Vaudeville Magazine）。這封信寫得很長，因爲過了一定的分量，所以照郵局章程，該雜誌社在接信之日，被罰去了二

辨士。這一次，他的信稿也發表了。

許多作家，或投稿者，在第一次看見他的稿件發表的時候，真是有不可想像的快樂和鼓舞。據說英國文豪『賊史』的作者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翻開他的刊本『波士的速寫』（Sketches by Boz）的時候，不覺手舞足蹈；但是蕭伯納却並無這種榮耀的感覺。因為文學對於他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無意識地成功了的。

關於這個有趣味的問題，蕭伯納自己曾經報告過我們說：

『這種興奮，無異於水在我口內的味道一樣。』

是的，如果那時候，有什麼雜誌登載了他的那一張繪畫，或者，如果他有機會在管絃樂隊的交奏之中，站到舞台上面唱幾聲：“Vieni, la mia vendetta”，那纔是興奮的事情；但是，目前呢，他却只覺得是寫了一些文章而已，是誰都會寫的文章而已！

記得曾經有人問過他：

『你從什麼時候起，想寫文章的呢？』

他很巧妙地笑傲地說：

『我不會想寫過什麼東西，猶如我不會想呼吸一樣。』

這裏表現着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說他是天生的奇才；另一層意思是說他本來無意於文章事業。

蕭伯訥自從他的第一封信，在『公論』雜誌上發表以來，文章是不知寫過多少字，數怕也已經有數千百萬了——雜誌，報紙，書籍，政治論文，小冊子，商業文件，在數量上實可驚人。他說過：

『我工作，正像我父親喝酒一樣神經質似的。』

文學和藝術是他的第二生命。他一方面浸淫於狄更斯，後來又耽讀莫里哀(Molière)，另一方面他就潛力研究莫札特。蕭伯訥之所以能在藝術作品上達到勁健，精練，秀美，嚴正的最高度，而無呆重或齷惡，純由莫札特那裏學習而來。雪萊(P. B. Shelley)給

他的印象也非常深。蕭伯訥讀雪萊的作品——詩與散文——都從頭到尾，他重視雪萊爲他私淑的作家中之最神聖的一個。此外，悲多芬和初期的華格訥（Wagner）也是他的研究對象。假如說蕭伯訥不算是純粹的華格訥派，至少也得是一個初期的華格訥派。除了法文以外，那時他不曾——此刻他也不曾——能不借重字典而很便利地讀通任何外國語言。他曾和意大利人交游得很早，所以他對於意大利報紙倒很有理解。德文，他就覺得難懂。他曾爲了某種特殊原因，讀過一時的西班牙文，但是不曾繼續下來。真的，他對於外國文學的駕御，不會展開到廣大的會話的能力。蕭伯訥自己也承認着說：

『你們所說的通一種語言——就是不單問問路徑——就證明使我不能成爲語言學家了。』

法國某婦人前曾在一封給羅丹的信中，問及蕭伯訥是否能說流利的法國語，羅丹的答覆是：

“Monsieur Shaw ne parle pas bien； mais il s'exprime avec une telle

violence gu'il s'impose."

(大意是：『蕭先生說得不怎麼好，他祇能勉強說說罷了。』)

在蕭伯訥的青年時代，愛爾蘭尚無文化可言，既沒有蘇格蘭高地人同盟 (Gaelic League)，又沒有愛爾蘭國民劇場 (Irish National Theatre) 更無絲毫有組織的信仰。因此，一般有志氣，有希望的青年，第一件工作便是以越早脫出愛爾蘭為越妙。以蕭這樣一個有作為的青年，自然不會例外。也就因為這個原故，很多落後的人譏諷他缺乏愛國思想。

蕭伯訥的答覆却也很可玩味的，他說他在職業的立場上，本來不是什麼愛爾蘭人，却是一個古典家 (Classic) [指精讀古希臘拉丁文學的人] 他又說：

『我隸屬於歐洲藝術，它概括着英國文學，德國音樂，意大利與荷蘭繪畫。在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愛爾蘭尚未在內。如果它早已在內，倒也好丁。』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三月，他向地產經理局預作聲明，說將自下月起辭職。公司當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只是他父親倒覺得詫異，本來他的妻女兩人都早已到倫敦去，此刻他的兒子又要拋棄這樣好的位置。但是事實上是因為蕭伯訥，如果長此在地產經理局中過他一生，他的天才將無由發展；而他的商業的才能，在他看來，只是一根束縛他在官司案頭的鎖鍊而已。

在那年四月中，蕭伯訥提了他的毡製的行囊，到杜白林的北部，搭上了開往英格蘭去的輪船。從此揮手一別，與故鄉不見面者凡三十年。

當時有人笑他，離開了杜白林的好位置，來到了無事可做的倫敦，是一番完全的失敗。可是矢志奮鬥，勇往直前的蕭伯訥却不但不相信他們，反而答覆他們以如下的一句妙語：

『誰甯願喜愛那「征服他的」城，而不喜愛「他所征服的」城呢！』

第八章 初到倫敦

本章繼續講蕭伯納到倫敦後的準備工作，和他在電話公司和黃蜂報館中的生活，以及對於社會先進份子和費邊社社員的憧憬。

蕭伯訥是二十歲了。他的少年時代早已落在後面了。

當他還是一個兒童的時代，他早已讀過他一切手頭所能看見的書籍。最初讀的是『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進一步又讀了沙士比亞的斷片，『神仙女王』(Faerie Queene)、『吉爾濱』(John Gilpin)，再讀了些李特(M. Reid)、柯堡(F. Cooper)、斯高特(W. Scott)、狄更斯、拜倫(Byron)、華爾特(Ward)、馬克吐溫(M. Twain)的作品以及『俗語集』(Household Words)和『終年』(All the Year Round)，此外

尙讀了許多傳奇的作品。

他很早就有分析的能力，這就是使他能成爲批評家的一種潛藏的祕密。他對於科學頗有研究興趣。又讀了些關於聲、光、熱以及水的形態等方面的富有研究性的文章。同時他鑽研達爾文和宗教與科學之論戰等文字。

在這裏，蕭伯訥對於美術圖畫的工作，是下了一番苦工，倫敦所有的美術館，無一不有他的足跡。有一次，一個爬亞爾卑斯山專家(Alpinist)見其鞋底特厚，因而問他是不是也常常爬山的。蕭伯訥說道：

『我那裏曾經去越山過嶺呢！倫敦各美術館裏的地板真硬得可怕，倘使我沒有這樣的雙料鞋，就決不能應付的啊。』

這種在美術館內的研究精神，是何等堅毅持久！這一種工作，彷彿是他特地爲此後擔任『世界』週刊畫圖版的記者生活時準備着的。

他讀伊里奧特的小說中的宗教思想，又讀密爾(G. S. MILL)的自傳。密爾的『自

由論』(Liberty) 和『代議政體論』(Representive Government) 這兩篇傑作對他也不無影響。他自習了一些柯培特 (Cobbett) 編的法文語法。

他雖然不能從事於遊戲和繪畫，他却決心委身於著作。在他會晤了他那已經先在倫敦生活着的母姊之後（其時他的小姊姊早已在淮特島 (Wight) 逝世），他允許自己再到商界中去活動。位置就在愛迪生 (Adison) 電話公司的稅務部裏面，不久他竟升任為該部主任。後來，公司突然宣佈停業，全部賣給了培爾 (Bell) 電話公司。蕭伯訥趁此機會，脫離了公司的職務，專心一志地開始寫作。

其時，音樂家萬達老李竭力推薦他在一張報紙『黃蜂』(The Hornet) 擔任撰述關於音樂批評的文章。蕭伯訥的文章，終於又因報紙的停辦而無從發表了。到此，黃蜂失掉了牠的刺，而刺也失掉了黃蜂了。

多年前，英國文壇巨子伊墨生 (Emerson) 曾經說：

『英國人的運命總算是世界上最好的了。』

可是從杜白林漂流到倫敦來的蕭伯訥，他的所見所聞的事實，恰恰與伊墨生所說所信的理論完全相反。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的倫敦，正是毀滅與恐慌達到了一種最可怕的程度。經濟的危機，產業的低落，形成了大批的失業。失業者好像秋收時的稻麥，一堆堆的不計其數。農民過度着最苦難的世紀。商界也快全部崩潰，破產的破產，關店的關店，小商人等，大都關起了店門，取下了窗飾，眼見着冷落的市面，空禿的玻窗，不禁目瞪而口呆！

情形之糟，真是『罄筆難書』。富豪之家，都害怕貧民奮起戰鬥，爲緩和他們計，有些省下了跳舞歡宴等費，給他們充作救濟費。但杯水車薪，究屬無濟於事。食物，煤炭，木柴，洋燭，頓時大漲其價。工廠都陸續停業。倫敦鐵路上辭退了五千工人。利物浦六萬碼頭夫也舉行大罷工。格拉斯哥西方銀行也倒閉了。總之一切都已近乎『陸沉』了！

同年十一月，倫敦發生大霧，直到次年的二月始散。蕭伯訥最初的一部小說，正在大

霧未散以前完成的。從這部作品中看來，蕭伯訥對於政治意識還是很欠缺的。

時代在震盪之中，一切的先進份子都積極地抓住了這種機會，開始進行他們的社會活動了。蕭伯訥得一友人之介紹，參加了一個名叫考求社 (Zetetical) 的辯論社。這種辯論會，在當時是風靡一時的一種羣衆組織。

當他的朋友萊該 (James Lecky) 招蕭伯訥同赴辯論社去的時候，蕭伯訥還噤若寒蟬，不能發言，立起身來，只是一味的兩腿發抖。這是他第一次參加集會。當他坐下席來的時候，他便感到自己是做了一個十足的傻瓜，並且覺得他這樣的羞辱，是必須贖回的。自此以後，他發誓要每星期赴會一次，練習在羣衆面前的談話和辯論。他堅決地相信，若不是駕御了說話的藝術，便將在大庭廣衆之前死於心跳病。

他是誓死不放棄他的誓言的。他參加了辯證社 (Dialectical)，白羅克 (Brooke) 辯論社等團體。

由於萊該的介紹，蕭伯訥又認識了一個歌劇家，名叫岱克 (Richard Deek)。他是

法國人，是普羅東（Proudhon）【著有「財產是什麼」「盜賊論」等書】的信徒。蕭伯訥每晚必與之對談，聽他的法國語。

從岱克那裏，蕭伯訥學得了三件事：第一，蓄起一般諷刺家式的頭髮；第二，糾正法文中母音的發音法；第三，學會公衆演講時的子音的分節法和強勢法。從此，蕭伯訥即使到任何最大的講堂裏面，恐怕他的語音也不會使人聽不清了吧。

有一次，熱中於演說場中的蕭伯訥，到了法林頓大講堂（Farringdon Hall）。在那裏，亨利·喬琪（Henry George）正是主講者。這位喬琪先生，是一個聞名世界的美國經濟學專家，曾著有『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等書。

這確是蕭伯訥一生中的最初的真實的轉機。喬琪的一番議論，把蕭伯訥打出了維多里亞時代的不可知論（Victorian Agnosticism），走向經濟的共產主義論。從此，他在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會場上，也發表了他的『土地

公有論』(Land Nationalization)的主張。社會民主主義者都笑他，叫他去讀馬克思的著作。

真的，他遂示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The Capital)的譯本。同時他發現了那些叫他讀馬克思的人，倒反使沒有讀過馬克思，他氣得要罵他們那些淺薄無聊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位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徹底地暴露了資產階級的文明，指示了蕭伯訥理論上實踐上的許多科學的基礎。

此時的蕭伯訥，上演說壇是有點資格了。那時有一個蘇格蘭的社會主義者彭訥爾(Robert Banner)，正領導着胡爾維區急進俱樂部(Woolwich Radical Club)。他們即以俱樂部的名義，請蕭伯訥去作一次演說。蕭伯訥接受了。他的演講題目是『強盜』(Thieves)。大意是說強盜就是地主和資本家，而被釘死在他們中間的，便是普羅階級。這一晚上，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最初的一晚！

在此後的十二年中，蕭伯訥宣傳社會主義的足跡，可以說是遍及於講座、廣場、市廳、

街頭，公園，埠頭以及大廳與地窖之類。這種工作的繼續不斷的執行，使他消除了他當日的那種目瞪口呆和羞人答答的窘態；同時使他認識了各階層的人物，上至教士和閣員，下至工人和小販。每個星期日，或早晨，或晚上，他必講演一次。據他自己的估計，除取談話的方式外，他至少每兩星期演說三次。可知他在這十二年內，答覆了聽衆的疑難，解決了世界的問題，總的次數，必定近一千次了吧。你想，僅此演講一事，豈不是儘夠使一般的所謂『學者』們發抖了嗎？

他並沒有參加上述的社會民主同盟。正在苦於沒有團體可以參加的時候，他忽然不知從那裏，接讀了一本小冊子，題目是『多數人為什麼貧窮？』(Why are the many poor?) 這原來是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的第一種出版物。無疑地，這個社團的名字像靈感一樣地打動了他。

蕭伯訥與費邊社的關係，因為不是本章範圍以內的事，就留在後面再敍罷。

第九章 早年的創作時代

本章講蕭伯訥從小職員生活轉入到職業著作家生活的開始，同時講他的最初的五部小說的運命。

『倫敦這個都市，正像倫敦的英國人一樣，是雄偉的，它的力量是廣大無邊的；也是健全的，氣候雖然是惱人；並且是排水的，清潔的，從沒有掀起風暴的。東市梢是低賤而粗俗的，祇有狹窄的街道和零亂的草棚。在西市梢，你就發現有相反的情形了，有的很安舒，有的很矯飾，其間還有草坪的花圃，開曠的空地，異國風的橋梁。可是那裏沒有計劃或概念去引領這種不倦怠的活動。倫敦的建設者祇是海狸，並不是人；雖然到處都是產業，可是在建設中間也沒有什麼鉅大的智力。這往往使我們沮喪。煙灰，塵穢，大霧，一切都似乎成爲了中心思想的一部分；他們祇管吃得好，睡得溫軟。但是那裏沒有不必要的聲音；倫

敦依然是最靜的都市；轉運的方法也很便利而精良。……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的倫敦，就在上述的一段文字中間描寫着。這是蕭伯訥的老朋友哈麗士告訴我們的。據他的目光看來，『這個倫敦，對於傾向於藝術方面的人，不是一個艱難的城市。』

蕭伯訥對倫敦是陌生的，尤其對倫敦人，一個都不認識，就未免感到困難了。

當蕭伯訥來倫敦之初，在上面說過，常在電話公司裏面做事，一面替店中記記賬簿，寫寫賬單，一面却對於做文章，寫小說的幻想也時時不能忘懷。因此，蕭伯訥後來回顧到這樣的生活的時候，每每用了他那幽默的口調說：

『我的早年的作品，是在賬簿和賬單裏面。』這話雖屬幽默，其實倒是真情實理。

在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之間，他一共寫過五部長篇小說。他顯然是志在成為小說家。

在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他寫他的第一部小說，題名『未成熟』(Immaturity)。創作

之際，他是富有從前的藝術家所說的『藝術良心』的，十分認真，而且孜孜矻矻，絕不貪懶好閒。他自己說過：

『我每天，不論是晴天或是雨天，總是用很端正的字體，在『四折大』的稿紙上，寫滿五張。』

這就是說，他每天要寫滿二十面（Page）。他就是利用這種方法，使他在五年之中完成了五部長篇創作；同時他深信，他必須這樣寫，否則便要遭到滅亡。他又把他撰好了的稿子，用他母親的剪刀去剪剪貼貼。但是這部煞費了苦心的稿子，却終見拒於出版界。我們的蕭伯訥並不怎樣灰心，正如他看見自己的作品出版時一樣泰然處之。他在那原稿的背面，寫了他的第二部創作。這篇題名爲『無理性的結子』（The Irrational knot），結果和第一部一樣，仍然賣不出去。這部小說的內容，在意識上是運用了他的有教養的普羅階級的口調，批判傳統宗教和傳統的紳士態度，向地主階級挑戰。

除上述的『未成熟』、『無理性的結子』兩篇外，其餘的三篇便是『藝術家的戀愛』

(Love Among the Artists),『加夏拜倫的職業』(Cashel Byron's Profession)和『一個非社會的社會主義者』(An Unsocial Socialist)。這最後的一部小說，却是以馬克思主義昭示當時的世界了，祇可惜那時沒有它的出版機會而已。

據蕭伯訥自述道：

『那些作品是非常生硬的東西，却是寫得非常經心的。』

這自然是使出版家退回他的稿子的理由之一。因為那時候，蕭伯訥確有一種作風——所謂教師的作風；這就是說，那時他所寫的一切作品，即使給外國人看，只要借重一部字典，便能一目瞭然。而且在他的作品裏面，他祇採取他周圍的人物，以及自己的初出茅廬的經驗。這些內容，給英國人讀，自然不喜歡的，除非作者是經歷過一番壯游或冒險生活的人。那些小說裏面，祇要你去一讀，便可以知道都是些自傳性質的詳細的歷史。舉例來說，『無理性的結子』便是他在電話公司中的經驗的記錄。但是蕭伯訥對於這篇小說，却有一段按語如下：

「無理性的結子」，可以說是出於一個廿四歲的未成熟的作家之手，以英文寫出「傀儡家庭」的一種生命力方面之初期的嘗試。』

廿四歲時的蕭伯訥，已經蓄着鬍子，這件事，使他高興得非言語所可形容。他自以為是靡非斯特菲爾斯式的惡魔——童年的志願和夢想是現實了。

他的小說的碰壁，使他難受，每次寄出去，總逃不出被退回來的命運。無論是倫敦的或美國的出版家，都拒絕收買它。

關於這五部稿子，蕭伯訥自述過：

『我如今一念到這五部小說，便使我回想到那幾包很重的黃色紙包，那紙包，陸陸續續地由出版家退回給我，每包每次，寄去寄來，送進送出，總要六個辨士。我還回想到當時為要把寄回來的稿件再向另一出版家寄出試售，這六辨士的寄費却也很費一番籌措。』

可是他是很有點自信，並且很有點自傲的。他對於他的小說之惡運，說過這樣的話：

『他們說，在人未發達爲一個人以前，原始的人祇是繼續不斷的一條魚，一隻鳥，一個哺乳動物，以及其他等等。不錯，普遍的小說創作也就是斯威孚特的魚之階段啊。』

『藝術家的戀愛』一篇，多至四百八十頁原稿。書法很端正，修改處塗得很濃，使原字一個也認不出來。這篇小說，脫稿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修改於一八八二年，再修改於一八八三年。雖然是改了又改，但是運命註定是『不能出版』或『原件奉還！』

在這五年之間，他靠着自己的筆桿去掙來的錢，總共不過五鎊十五先令六便士。其中的十五先令，是用『喬琪』這個筆名寫的一筆稿費；其餘的一篇是代某藥店寫的應用文件。鉅大的稿費是沒有得到過，因爲一部小說都沒有人要收買。最初的一部小說，離撰稿的日子已有五十年之久，剛才出版。關於這部書，蕭伯訥後來說得很有趣味：

『這部傑作，費了我許多的紙張，書名恰巧題作『未成熟』，現在這稿子已被耗子吃去了一部分，可是即使耗子也未能把它吃得精光。』

其他的四部，雖然比這部書出版得稍早些，但是也已經在蕭伯訥三十歲以後了。蕭

伯訥的這些小說，嚴格地說來，正如他的書名所示，是尚『未成熟』的。他不得不被描寫為一個無望的小說家，同時他的自知之明指示了一條『批評』的路。

在他的生命史上，從此展開了新的一章。

第十章 批評家時代

本章講蕭伯訥作小說家的失敗原因，和批評家生活成功概況，以及他的批評的任務與發展方向。

前兩章所述的蕭伯訥在倫敦的一段生活，有批評家和傳記家稱之爲『寒酸的年頭。』這一共展開了八個年頭——從一八七六至一八八三年。

他的小說之失敗，原因自然很多，綜合起來，不外乎如下數點：

一・他的進步的思想與他的落後的作風太不相稱。他自己的說明是這樣的：『我的奧古斯特大帝時代的作風與當時是落後了一百五十年，而我的思想却與當時是前進了一百五十年。』【按：奧古斯特(Augustus)是羅馬的一個大帝。奧古斯特時代就是羅馬文學史上的

二・他的小說題材，大都是一些身邊瑣事而沒有奇遇式的內容。我在前面已說過，這在當時是不能取悅於英國讀者的。

三・他過於含羞，既不善訪問編輯者，又不知奉承出版者，更不會自吹自捧。這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小說的路走不通，轉而另找生路，自是當務之急。他雖不但欲找工作做，而且能夠應付工作，但是終究找不到工作。這樣，他便陷入了極端的困境，大有非立刻找到工作，就不得不在二十四小時內餓死之概了。於是不得不『再爲馮婦』爲工作而找尋，而請求，而衝撞，而奮鬥。蕭伯訥談到他的奮鬥的歷史，只是說：

『我從不奮鬥，我僅賴吸引力而發展。』

其實，這那裏是事實呢？除了早年的奮鬥外，這無疑地是第二次了。他在等候着準備衝撞的機會，一有工作，他就跟着衝撞過去。

其時，蕭已認識了威廉·亞丘（William Archer），而亞丘也很知道他的這種窘況。

經亞丘向『包爾毛爾新聞』(Pall Mall Gazette)介紹說是蕭伯訥爲了生活和工作的壓迫，不得不來投些稿子。蕭伯訥的評論文章，做得很好，稿費則以每千字兩個基阿那計算。【按：基阿那(Guinea)是當時英國的一種金幣，每個約值二十一先令，今已廢去】

不久亞丘又給了他一個衝撞的機會。亞丘自己是著名的『世界』週刊的劇壇版記者。很湊巧的，該週刊的圖畫版記者死了。此項工作，在總主筆葉芝(Ed. Yates)之意，欲請亞丘兼任下去。可是亞丘對於圖畫是門外漢，於是重施故技，把蕭伯訥舉薦進去。這時，蕭伯訥身手小試，竟也大告成功。『世界』週刊圖畫版由蕭伯訥擔任時，其稿費則以每行五辨士計算。

一八八八年，有一個人，名叫奧康諾創辦了一種晚報，定名『明星』(The Star)。他的副主筆麥辛漢(H. W. Massingham)，便舉薦蕭伯訥去，說這是思想進步而有希望的青年新聞記者。蕭伯訥進了這個報館後，提議以兩個基阿那的酬資由他撰音樂版的稿子，每週一次。主筆奧康諾答應了。成績也很好。此時，蕭伯訥的文章已有鬥爭性，但奧

康諾畏之如怕見鬼一樣。

過了兩年，『世界』週刊音樂版主筆因發生爭執，辭職離英。亞丘馬上和『世界』總主筆葉芝接洽，提議由蕭伯訥繼任該報音樂版主筆為最合宜。這提議果然成為決議了。蕭伯訥執筆以後，便開始用他的縮寫的筆名 Q.B.S. 三字，本來是每週兩個基阿那的酬資，後來則增至五個金鎊。更可誇耀的，此時的蕭伯訥竟一躍而為『輝煌的』(Brilliant) 蕭伯訥；而且從此以後，這一個光榮的形容詞，彷彿永遠不再和蕭伯訥三字分離了。

葉芝逝世的時候，蕭伯訥接着離開了『世界』週刊。他要重找一個主筆，但再不希望有像奧康諾那樣『怕見鬼』的主筆。他說：

『我不願任何人為了我而葬身火窟，同時我也不願冒我自己的危險。然而我所要求的主筆，是一個喜歡走近火線，彷彿他已置身於危險地帶而搖旗吶喊的主筆。不敢走近礮聲的人，對我是不中用的。我的主筆必須是識貨而無所害怕的人。』

這時，蕭伯訥的朋友，接辦了『星期六評論』，這位友人便是哈麗士。他知道蕭伯訥

已倦於音樂評論的工作。於是約他撰稿，同時要他每星期寫一部腳本。

蕭伯訥在接受此項要求之前，提出了下述的兩個條件：

第一・報上不得襲用傳統的，陳舊的『我們』字樣，他的作品一律用他的縮寫筆名 G.B.S. 三字照准。

第二・酬資每週六金鎊。照准。

這一次的工作成績，自然還是很好。這是新聞記者時代偉大成就之最高峯，抑且是從事於此項職業以來的最後一次的正則的工作。蕭伯訥到倫敦後的八九年間的舊債，立刻全部償清。

蕭伯訥的姊姊呂茜的生活，在這裏可作一插曲。呂茜較蕭伯訥大三歲，自從跟她母親來到倫敦以來，生活上很清貧。後來她投身舞台。最初是參加吉伯特蘇利文 (Gilbert & Sullivan) 歌劇團，其後是出演於『陶綠賽』歌劇中。她的歌喉博得很大的成功，可惜的是

她終於患了肺病，不得不從事休養。婚後不久，便與她的丈夫分居。後來因發現丈夫已與另一婦人有染，便宣佈了離婚。丈夫隨即死去。她並無子息。在一九二〇年死於她的胞弟蕭伯訥的懷中。

蕭伯訥的新居，是靠近大英博物院（British Museum）的。每天——每年都如此——把許多的時間，用在那裏的閱書室中，讀他一切要讀的書，尤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華格訥的樂曲等。

蕭伯訥的父親在故鄉杜白林逝世的一年，是一八八五年。噩耗傳來，母子兩人自己的生活又起了一度恐慌。在這裏應感謝亞丘的提拔，蕭伯訥充當新聞記者批評家的第一年，已有二百十二金鎊的薪水了，同時蕭伯訥的母親也找到了音樂教師的位置。財政問題，總算是解決了。

在蕭伯訥的最有口才的朋友中，有一個奧國宣傳家鼓動家，名做斯丘（Andreas Scheu），曾在社會主義講壇上做過宣傳工作。那時因其言論不容於己國，便逃亡在倫敦。

市上就職於倫敦的一家傑裘 (Jaeger) 公司，後來該公司開辦了西市縫衣店。蕭伯訥便稍稍積蓄了幾個錢，想做一套新服裝穿穿。

蕭伯訥在這裏定製了一套怪樣的衣服。製好後，他便把來穿在身上，到大街上去兜了一圈，頗為自得。此後僅穿過一兩次。

他的第一部劇本『鰥夫之室』，於一八九一年在版稅劇場 (Royalty Theatre) 上演，當幕落的時候，羣衆高呼了幾聲：『作家來了！』『蕭伯訥來了！』之後，這位穿着耀眼的銀灰色服裝的蕭伯訥，便踏上了舞台，在幕前向觀眾談了些他的話，在熱狂的喝采聲中退了場。

在這個時期內，作為批評家的蕭伯訥，是有了三方面的發展：一是圖畫；二是音樂；三是戲劇。——這些，他都成功了。不過在音樂批評方面，他認為將陷於對他最危險的枯燥嚴肅的作風裏，這層意見，他曾經表現在他自己的論調中，他說：

『我覺得這抽水筒很使我困疲，同時井底裏的水却又很深。』

就中，他的最成功的批評工作，便是戲劇批評。蕭伯訥深信，批評家的任務，是在於推動人，使人思索，使人忍受。而他在一切的批評之下，更潛藏着一種信心，就是現代劇對於我們的時代，正像教會對於中世紀一樣佔着重要的位置。

他不像一般的批評家那樣，把性的問題認為是重大的內容，他却把它目為『紙上的無聊題材』。但是它的成功，却也超越乎其他批評家以上。在蕭伯訥同時代直到目前的批評家中間，他是無疑地顯現了他的最偉大的力量。不久，他的力量，逐漸伸展到了舞台，成為一個著名的劇作家——愛爾蘭的易卜生。

現在，且讓我們來替他拉幕罷！

第十一章 劇作家時代

本章講蕭伯訥怎樣成爲個戲劇作家，怎樣寫作他的劇本，以及怎樣努力於他的劇場生活。

『我的意思是說，』蕭伯訥對哈麗士說：『用同樣的時間來寫喜劇，可以比目前當新聞記者多獲得一二十倍的酬勞。我做一點鐘新聞記者，便是多損失一點金鎊呢。』

『那麼，你是不得不停止供給我稿子了。我可是就要把這報館出頂了，好罷，祇要你再繼續幫兩個月的忙，等到九月份，我就很感激你了。』

『用不着說了；我決定等到你下台罷。』

『很好，很好；可是我却接受不了你這樣大的犧牲。』

『這不是什麼犧牲。我看來也是公平的吧。我在你的『星期六評論』上面做劇評，在

各方面都對我很有點好處。你不僅僅使我名聞劇壇，而且使我逼着解決了許多問題，因此也就幫助了我的成功。若要公平一點，我倒很應該把你幫助我賺來的錢，留下一部分給你呢。』

『如果你要那樣，我也並不反對。總之，你是靠你的劇本賺了很多的錢了吧？』

『賺的不在英國，却在美國。從那裏賺來的錢，多到使我用不完了。真的，我在銀行裏已經開了一個儲戶；銀行裏的人看見了我，便笑起來，而且永遠驚異着，因為像一個個的奇蹟繼續不斷一樣，我這個著作家，不但是在賺錢，並且還在存銀行啊。』

*

我們知道蕭伯訥講這番話的時候，哈麗士是『星期六評論』雜誌的主筆，蕭伯訥爲其撰稿人之一。

這一段對話，十足地表現了蕭伯訥的劇作，使他發了橫財，誰也料不到的，竟是多到使他『用不完』而『存銀行』。

以一個批評家出身，轉而委身於劇作，實際上並不是怎樣容易的吧，其所以獲得一般的盛大的歡迎，也不是偶然的。看罷蕭伯訥的事跡，便是一個例證。

和從前一樣，蕭伯訥的走入劇作界，是由亞丘推動起來的。當初亞丘供給他以某種劇情，叫蕭伯訥去創造對話。蕭伯訥遵示而作，把兩幕脫稿之後，亞丘一看不對，因為裏面完全沒有他的情節，只是許多的對話。從此以後，亞丘再不和他合作，認為蕭伯訥只是一個無望的劇作家罷了。蕭伯訥也相當地承認了亞丘的意見，終於把那未完成的劇本擱置了多年，一動也不動。

此後，經英國獨立劇場(British Independent Theatre)的創辦人格萊茵(Jack Grein)的慇懃，纔把未完成的劇本的兩幕，續寫了第三幕。這回在格萊茵看來，蕭伯訥是有成為劇作家的可能的，而且力說亞丘的意見是錯誤的，蕭伯訥也很信服。此後蕭伯訥的劇本，還是繼續不斷由人家慇懃之後才寫出來的。其出於自動寫作的，恐怕祇有這三部作品：(一)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二)心碎之屋(Heart-break House)，

(11)『回到麥安賽拉』(Back to Methuselah)。至於『好述者』(The Philanderer)是爲格萊茵寫的。『華倫夫人的職業』(Mrs. Warren's Profession)是應魏白夫人(魏白夫人)的要求而寫的，因爲她討厭『好述者』中的迷於戀愛的婦人們，而喜歡讀一點真正現代非浪漫諦克的勤勞婦人。這劇禁演過。『武器與人』(Arm and the Man)是他的急就章，爲資助愛文尼劇場不致倒閉而寫的。『康狄達』(Candida)是爲了亞丘區(Janet Achurch)寫的。『運命的人』(The Man of Destiny)是爲曼斯菲爾(Richard Mansfield)和亞倫特萊而寫的，但他倆都沒有親自演這齣戲。『你永遠說不出』(You Never Can Tell)的劇名，是魏白代定的。『惡魔的信徒』(The Devil's Disciple)是爲特列斯(Terriss)和曼斯菲爾寫的，他們演了這齣戲，在美國獲得了大大的成功。『該撒和克利奧巴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是爲福白羅伯孫(Forbes-Robertson)寫的，由福白羅伯孫演得大有成就。『勃拉斯蓬的轉變』(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也是爲亞倫特萊寫的。此後的一串名劇，例如從『約翰白爾的他島』一直

到『安特羅克里與獅』(Androcles and the Lion) 差不多都是爲劇場排的戲。『大加德林』(Great Catherine) 是爲金斯東(Gertrude Kinston) 寫的。『蘋果車』(The Apple Cart) 是爲賈克孫(Barry Jackson) 寫的。每個劇本都不是自發的創作，故易於獲得演員，女伶以及劇場經營。一切的劇本，多少都像『武器與人』一樣是急就章。

無數的戲劇，或則一時成功，或則一時失敗，隨卽像秋天的枯葉一樣飄落無踪。而蕭伯訥的戲劇，至今還證明着『存在』。大體上，他的上演地點是舞臺社，戲目劇場，同人劇場，小劇場，愛美者俱樂部等等。

蕭伯訥爲了新戲劇運動拚命吸收英國現代文壇上的名人。最初，他試了試吉百林(Kipling)，可是吉百林不是革命家，且向來不與蕭伯訥的氣氛接近。許萊特(Maurice Hewlett)也來試過；可是他向蕭伯訥說明，對於劇場沒有像他對於小說那樣的嚴肅，於

是沒有堅持下去。却斯透頓雖曾以他的唯一的試作『魔術』(Magic) 在舞臺上出演後一鳴驚人，但他終究不能因此而放棄他的新聞事業和一般文學的工作。威爾士 (H.G. Wells) 不但拒絕作劇，反而根本嘲笑戲劇運動，他說：『舞臺上是攬不出什麼東西的。』詩人大衛生 (John Davidson) 那時正窮得不堪，蕭伯訥便要他寫劇本；可是他說他不能這樣做，因為他的全家會因此挨餓六個月。於是蕭伯訥問他：

『你在六個月內究能賺得多少錢呢？』

『一百五十鎊。』詩人這樣回答他。

蕭伯訥立刻設法先把這筆款子交給他，並且告訴他說可以隨便他怎樣動筆，祇要能滿足作者自己的心意。不料這却造成了一個悲劇的結果。

大衛生在領謝之餘，一心想給蕭伯訥發財，以報答他。他創作了一篇最普遍的，浪漫的，似屬歷史的準樂劇，滿以為可以吸收至少全年的『客滿』。等到他後來認為浪費了蕭伯訥的數百金鎊同時認為耽誤了他自己的優越機會的時候，他終於在失望之中實

行了自殺！

此後，蕭伯訥又試了試別人的運命。這裏最主要的一人便是最近逝世的『正義』(Justice)『銀匣』(Silver Box)『鬥爭』(Strike)等名劇的作者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蕭伯訥被人們尊視為英國最重要的喜劇作家。蕭伯訥的崇拜者，甚至稱他為沙士比亞以來最偉大的人。他總算是自視如常。

賈克孫這個人，蕭伯訥曾經為他寫過『蘋菓車』，這在前面已經說過。現在要回來說一說蕭伯訥和賈克孫的友誼關係了。彼此本是互不相識的。當維特林訥(Vedrenne)和巴爾克(Barker)經營着西市梢一帶諸大劇場而陷於困境時，他是率先活動的份子。終於巴爾克賣掉了他的一切所有，同時蕭伯訥也退還了他的大部分版稅，想挽救經濟上的危機。債權人把帳款收清，巴爾克他們的劇場從此不得不關門大吉。這位賈克孫

便乘機而起，在一般熱心同志的資助之下，創設了白明漢（Birmingham）劇場。在那裏他演了『心碎之屋』，竟告成功。此次自薦之後，他便向蕭伯訥提議上演『麥妥賽拉』。蕭伯訥對他大為驚異，問賈克孫是不是準備把自己的妻子和家庭送入救貧院去死於那兒的稻草上面。

賈克孫鎮靜地奉覆了他，說自己是既無妻室，也無家庭，却準備負此責任，因為他對於演劇生活，只是本其所好而已。蕭伯訥聽了他的談吐，便成莫逆。此後交情益篤，二人一同工作。賈克孫的名譽，在倫敦也高揚起來了。

同時在美國，劇場基爾特（Theatre Guild）也上演了他的上述的兩大劇本——即『心碎之屋』與『麥妥賽拉』——竟獲得了同樣的成功。此外，英國有一個旅行劇團，叫做麥克東那劇團，上演了蕭伯訥的『人與超人』，賣座也有『客滿』的時候。在這時期，蕭伯訥的糊口著作（Potboilers），却始終沒有上演。

他早年的三個劇本是：（一）華倫夫人的職業；（二）鯨夫之室；（三）好逑者；以上三篇，總名爲『不快意的戲劇』（Plays Unpleasant）。以其動作的有效，對白的幽默，也有相當的成功。自然，失敗的戲劇也是不少，但是因爲蕭伯訥在他的戲劇上演後，他每每傾聽着公衆的熱烈的討論，所以他學習到的編劇的教訓，確是非常豐饒的。

『失敗爲成功之母』這是真話。蕭伯訥曾經本其自身的經驗告訴過我們以類似的一句真話：

『我的名譽，因每次的失敗而成長。』

有一件事，須在這裏提起的，就是『華倫夫人的職業』，曾經被英政府一度禁演，直到一九二四年，才由張伯倫（Chamberlain）把這個禁令取消。

爲此，蕭伯訥曾經用了他無數次的努力，對所謂『監察權』（Censorship）猛烈進攻。英國劇場的監察官的建立，始於英王亨利第八世時代。那時他任命了一個官吏，專

司這種事情。議會並無參預權和干涉權，其結果到了近今，這種監察官職，便握在張伯倫手裏。他是英王的侍從之一，他的俸祿也是皇室費 (civil list) 的一部分。因此蕭伯訥認為監察權必須撤銷，它如果存在着一天，戲劇運動也就被束縛着一天。

有一次觀劇者俱樂部 (Playgoers' Club) 賁問他要怎樣消滅監察權。他就誹謗他們說：

『你們首先必須消滅這個帝國。』

第十二章 集團生活

本章講蕭伯訥身心上最早出現的兩個奇蹟，和他在參加費邊社前後永遠獻身着的政治工作。

蕭伯訥是成爲社會主義者了。在這以前，他是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可知論者，到了這個時期，他是轉變爲經濟的共產主義者了。但是這種奇蹟，究竟是怎樣地出現在蕭伯訥身心上的呢？

記得蕭伯訥所有的第一個奇蹟，最初的轉機，是由於亨利·喬琪的演講。遠在一八八二年的九月五日之夜，他聽到喬琪的一場演說之後，熱情的青年蕭伯訥便受了極大的感動。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喬琪關於社會思想的啓示。他自己也說過，他的實生活的第一頁，是在這時纔開始的，以前的廿六年間的生活，只是它的序文而已。以前的問題，例

如宗教與科學的衝突，聖經之打倒，婦女教育，自由，達爾文，丁鐸爾(W. Tyndale)，赫胥黎，斯賓塞等人所引起的問題，終究只是一些簡單的中間階級的問題，由這些問題或許可以產生一百個亞諾爾特(M. Arnold)和一千個伊里奧特(G. Eliot)。蕭伯訥還加上了按語說：『我纔像知道天明一樣，知道了經濟基礎的重要。』

第二個奇蹟所加於蕭伯訥身心上的，可以說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這部偉大的傑作，一般人都已公認爲共產主義的聖經。而這部聖經之所以能被蕭伯訥發覺，是得有人家的指示的，原來自從他聽了亨利·喬琪的演講，又讀了他的巨著『進化與貧窮』後，他便常常參加社會民主同盟的集會。因受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譏笑，他便被指示着去讀『資本論』。果如其言，蕭伯訥到大英博物館裏，找到了田維萊(Deville)的法譯本，一讀之後，他才發現了自己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第一人。如果說，亨利·喬琪給他的是對於社會主義的熱情；那麼，馬克思給他的，却是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在這裏，蕭伯訥知道了社會主義的科學的基礎，如何去暴露資產階級文明之劣跡，以及如何去反抗。

它等等。從此，蕭伯訥發狂似的在各處努力宣傳着社會主義，演講着社會主義，結識了許多當時的思想家和演說家。

蕭伯訥熱心於參加社會活動的組織，自然是不容懷疑的。他起初想加入社會民主同盟，未果。正在這時，一本小冊子『多數人爲什麼貧窮？』落到他的手中來了。這分明是費邊社的最初的一種刊物。這社的名稱，給了蕭伯訥以一種教育，文化，與無利慾心的激動，猶如靈感一樣。

他說過：

『正當我想去加入社會民主同盟之際，我突然改變我的態度，參加到費邊社去了。這並不是由於他們兩者之間的議程或原則上的差別之發現，却只是由於一種本能的感情，我感覺到費邊社——不是社會民主同盟——能夠吸引像我這樣傾向和智的習慣的人，而他們在那時候，已經足夠勝任當前的我們的工作了。』

然則費邊社是什麼團體呢？

費邊社的前身，是新生同志會 (The Fellowship of the New Life)。在一八八三年，開始組織的時候，僅十六人，什麼形式也沒有，僅僅每兩星期召集一次，而以一切社會問題作為他們研究的對象。這時候，蕭伯訥還不曾在內。

費邊社的命名，是從羅馬歷史中引用而來的。古時有羅馬名將，名叫費布斯 (Quintus Fabius)，他曾以不直接決戰，不正面衝突的政策和戰略，戰勝了漢尼巴爾 (Hannibal)，費邊社也就是想用這種方法來施行其社會改造的政策。從這一點可以知道，他們是溫暾主義者，是改良主義者，是等待主義者，是機會主義者。

直到一八八四年一月四日，費邊社才正式成立了。蕭伯訥第一次赴會，是那年的五月十六日。地點是奧斯南勃夫街 (Osnaburgh St.) 上的一間房子裏。他們都是些有職業者，商人，有獨立進款的理想家之流，有一個却是年長的，十分靜默的無產者。會長是一個股票掮客。他們的會議地點是活動的，時而在一個會員的家裏，時而又輪流到另一個會員的應接室中。他們的會費，也是不固定的。

蕭伯訥不能算是費邊社的創辦人。在事實上，他的被認為正式會員，是在那年的五月九日。他的社會工作問題，到此已得了一個解決。他努力完成了費邊社第二第三兩種小冊子。可是他嫌得自己的能力，究竟有限，於是介紹了魏白（S. Webb）。魏白又介紹了他在殖民局裏面的同事奧里維（S. Olivier）。奧里維不久便被選為社長。此後不久，又來了瓦萊斯（G. Wallas）。白蘭特（H. Bland）却是早已入社了的。總之，社中人才濟濟，開了倫敦社會運動史上的新記錄。由於團體工作，他們才正式建立了費邊社，而使它不斷地進行，終於在下議院裏成立了工黨，並在德意志形成了修正主義（Revisionism）。

蕭伯訥坐在它的執行委員會的席上，已近卅年了。但是他得之於魏白的影響與幫助，是十分鉅大的。魏白可以說是費邊社政策的設計者吧。魏白在性格上，氣質上，思想上，雖和蕭伯訥站在相反的局面，然而這兩個領袖却很友誼地進行着他們的工作。

蕭伯訥說：

『我們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我們彼此補足了各自的思想，而那對於我們兩人是彼此都有利的。』

蕭伯訥在費邊社裏面的重要活動，不在於執行委員的工作，却在於演說方面。他們的演說明星之一街坊上也去，公園中也去。不過因為他的和平的社會主義對他的束縛，他是無意於殉難者的生活。他以為既無訓練的，又無武器的人，決不能與軍警抗衡。生平僅有二次，幾遭逮捕和禁錮；但都脫了險。

當時，除費邊社外，還有幾個所謂的社會集團，興特曼 (H.M.Hyman) 他們的社會民主同盟，摩里斯 (W.Morris) 他們的社會主義聯盟，白萊特拉夫 (C.Bradlaugh) 他們的國民反宗教協社 (National Secular Society)。然而都沒有什麼生氣，陷於沒落了。摩里斯，雖是當時社會運動中的『大人物』，終於因為他的理想的不能實現便中途灰心了。至於白萊特拉夫，也因為失去他的唯一的女同志皮桑特 (A.Besant) 而一

蹶不振了。自她脫離了反宗教協社，便也參加了費邊社。

這一切的集團，在蕭伯訥目中，也早已被認為無用的組織。因為他相信着，凡是健全的社會主義集團，總不是單人匹馬的工作，也不是對警察的戰鬥。同時，他知道他自己的教育上的缺陷，理論上的弱點必須彌補或克服，因此他不得不接觸或接受那些與自己賦有同樣的機智而受過不同教育的，以及受過更好的訓練的人。

同時，蕭伯訥更採取着列甯的意見，認為一切的革命，無論是和平的，或是戰鬥的，總是少數特殊份子的工作。這一認識，蕭伯訥應用來表現在集團方面的，便是費邊社的社員，從沒有超出過二千人，而以一百個以內的社員，表現了最好的工作。

蕭伯訥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意義和它的任務之下，自然是反對國家主義。可是我們知道，蕭伯訥的愛爾蘭國家主義的幻想，完全是被馬克思的理論所打破的。那時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間，地方自治運動，避債運動，地租廢除運動等等，都已甚囂塵上，弄得

政府麻痺不堪，無能爲力。但是蕭伯訥由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顯然不屑爲單純的國家主義去枉費心血，或徒勞奔走。

在『國民自由俱樂部』(National Liberal Club)中的一次自由主義者的會場上，蕭伯訥兀自從座椅上站立起來，向主席提出問題，說「開會程序單」上，除了愛爾蘭問題以外，是否尚有其他問題。主席又驚又憤地答覆他說：『沒有。』當時蕭伯訥又驚又憤的神氣，定然是比主席的益增百倍吧，他頓卽拿起他的帽子，神氣活現地走出了會場。因爲他要表示他瞧不起愛爾蘭的國家主義。他說過：

『不列顛的無產階級，自有比愛爾蘭人更可怕的憂愁，絕對不會顧到什麼地方自治不自治的問題。』他又說過：

『愛爾蘭人必須自己救自己。』

他是怎麼也不願對着英國的國旗，起立或是脫帽，他也不願在公衆的宴會上舉行飲祝國王健康的儀事。此志不渝，真是可喜；甚至到了愛爾蘭自由州成立的時候，他雖減

輕了他的—些憂愁，但他始終是忠於『此志』呢！

蕭伯訥非常重視他自己的政治工作和社會生活。他曾經說過：

『自從一八八四那年【即費邊社成立時】起，直到南非洲戰爭以前社會主義的大失敗時期，這中間的年頭，是我的生涯中最可尊重而且最可享受的部分。』

無論怎樣，作為費邊社社員的他的這些政治工作，對於他的文章事業是具有着不可抹殺的幫助的；至少，對於他的公開演說的能力上，增加了不少有價值的經驗。試看他自己是在怎樣地表白吧：

『我堅執地到處遊行着，只要發現有討論會或近郊的小討論會和演講會，我便加入講座：朋友們都以為我在發瘋了。有時，在費邊社裏，擬取國會的形式，把自己充當地方局總管，提出社的內閣方案問題來討論。每逢星期日，我便把自己所研究着的問題先演講一遍，這樣，關於地租、利息、利潤、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勞動組合主義（trade-unionism）民主政體諸問題，逐漸地不必借重草稿就能演講，也就開始理解了。

社會民主主義，並且能向任何樣的聽眾從對象方面出發宣傳了。』

同時，他的豐富的演說經驗，對於他的演說似的文章的寫作亦有深切的影響。時至今日，他的作品依然充滿着雄健的辯才，大聲疾呼的演說，以及一切由此而產生的煽動和鼓動的力量。

第十三章 結婚生活

本章講蕭伯訥和潘棠馨女士怎樣戀愛，和怎樣結婚的種種過程，並講到婚期中鬧了些怎樣的笑話，婚後幹了些怎樣的事情。

蕭伯訥的夫人，名字叫做夏綠蒂·法蘭西斯，姓氏是潘棠馨 (Charlotte F. Payne Townshend)。她是中等身裁，不短也不胖，一副小小的臉龐，一雙碧綠的眼睛，一頭向後直梳，燙髮的，很精緻的，暗黃色的頭髮，看起來，總似乎要比她的實在年紀輕十歲。服裝頗入時，喜穿短裙。據說在某一時間，她身長五尺七寸，體重一百四十五磅。

蕭伯訥認識潘棠馨女士的時候，他看見她還是個愛爾蘭的一個小姑娘。他早已對她很動情。直到九十年代，在英國潘棠馨的村舍隔鄰，他忽從自己騎着的腳踏車上跌落下來，使他的腳踝骨受了重傷時，他被人搬到她的屋內，她就給了他第一次的援助。蕭伯

訥在那裏連住了幾個星期。

對於這樣的一個仁慈的，溫柔的，善良的看護婦似的女子，蕭伯訥自然是由衷地感激。這情境逐漸地使他非常難受，因為她有這樣助人的力量。蕭伯訥對之，因憐生愛，因愛生懼，到了十分嚴重的情境。

蕭伯訥後來對人說過這回的戀愛事情：

『很突然的事情在我看來是頗為顯明的了。如果我再逗留下去，我勢必追求她的愛，要求她和我結婚，然而我又不願幹這樣的勾當。因此，我在某一天的晚上，我決定要離開那裏。次日早晨，我很早就起身。我正在黎明時分動身逃走。那裏料得到那裏的地板，是橡樹做的，漆得很是光滑，又要經過很長的一節樓梯。差不多正在走下樓梯的第一步，我的跛了的大腿，使我仆蹠了一下，一滾便滾了下去。當時她奔跑過來，趨到我所躺着的地點，替我看護我的腳。』

腳病由於她的盡力的看護，一天天的大有起色，蕭伯訥的感謝之忱，自然是非言可

宣的了。

潘馨棠女士，家境素封，常隨其父母，置身名流社會，認識她的人很多。她又是一個革命者，後來信仰過社會主義。對於社會運動，十分努力。

有一次，魏白夫婦，想舉辦倫敦經濟學院，她曾竭盡了她的全部之力促其實現，輸財助屋，無不抱着犧牲的精神。

友情建立了後，魏白夫婦，常在秋假期間，邀其遠赴蘇福克 (Suffolk) 地方的教區長住宅內。她接受了他們的邀約。其時蕭伯訥也在那裏，於是蕭伯訥與潘棠馨女士，交接便日益親密。

在這以前，蕭伯訥本有一個戀人，名叫亞倫特萊，是一個名女伶。蕭伯訥給她寫過許多——至少數百封——情書，亞倫特萊也有同樣多的書信給他。自然，其中不盡是情書，但情深意密的書信却也很多。總之，蕭伯訥愛她，她也愛蕭伯訥。

但是現在，蕭伯訥已到了和潘棠馨陷於戀愛的時候，却不能不給亞倫特萊以一個

聲明。於是她立即寫信給亞倫特萊，把他和潘棠馨女士的前前後後的事實告訴了她。這時蕭伯訥已是四十歲了。在倦於單純的戀愛生活，而且和婦女已有相當的友誼之後的蕭伯訥，已經知道一般婦女的心理情態，並且已經懂得使自己博得她們的喜悅的種種方法。至於潘棠馨女士，也是一個很有理解力的敏慧的婦人，早已見過世面，懂得人情，認識人，而且還有錢。

蕭伯訥知道，他如果和她結婚，前途一定很有希望，而且一定有利於自己。這層意思，曾在在他自己的說話裏洩漏過。他說，她是她生平最知己的愛友；他又說，他所以要娶她來做妻子，就是因為她是一個投資家。

蕭伯訥在蘇福克寫成了『你永遠說不出』一劇的時候，便回到倫敦。晚上多暇，便開始消磨在潘棠馨女士的樓頭。根據他給亞倫特萊的書信中看來，潘棠馨還替蕭伯訥充任義務女書記之職。如果說他尚未訂婚，那麼很顯然的已經是同伴了。

但是這裏尚有一個難題，橫在蕭伯訥的胸中。蕭伯訥深知道他不是一個娶女人的男子。在他的想像生活中，他從來不是丈夫，也不是父親，甚至於不是兒子，也不是兄弟。他只是一個棄兒，只是一個自由的槍手。誰都不能認他是結了婚的，或是有結婚可能的。即使他自己也從來不想像到自己會成為一個結婚的人。他是這世界上自然的鰥夫裏面之一份子。他常常喜歡引用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名言，說結婚的哲學家是可笑的。蕭伯訥的『人與超人』中的男主人公掙扎於女子愛痕(Ann)的纏綿的愛情，很顯然的是受了尼采的思想的遺訓。作者當然是因為有所感，才有所寫的，這個『超人』大抵是『夫子自道。』

在另一方面，潘棠馨女士倒是一個『女健者。』她信奉着強烈的『費米尼斯姆』(Feminism)。她反抗家庭的觀念，準備與一切的傳統思想挑戰。蕭伯訥見其如此，便深以得人為無上的安慰和幸福。在這樣的一對新人之間，他倆的結合自然是誰也不會侵犯誰。

然而情形不能很順利地進行下去了。正當消度了第二次的秋假之後，魏白夫婦出去作周遊世界的壯舉的時候，蕭伯訥的健康忽然失常了。他的著作生活，過於勞頓。他在晚上，不是進劇場，便是到音樂會，否則便是參加政治集會；或者呢，撰些費邊社的宣傳文章，做些賺麵包吃的評論稿子；又寫劇本，又要通信，忙得不能開交，他的身體便懨懨成病了。後經多方療治，始行復原。

在他久病的期間，潘棠馨女士曾到蕭伯訥的居處去作第一次的探病。她見了蕭伯訥，也見了蕭伯訥的母親。她覺得他的母親，似乎對蕭伯訥漠不關心的樣子，這在她看來是一件大可驚怖的事情，實在看不慣。同時蕭伯訥的房子裏面也亂七八糟，污穢而不整潔，這對於蕭伯訥的病體，只會發生危險。總之，潘棠馨女士在這次訪問病中的蕭伯訥之際，兩個最大的悲觀的現象，便是漠視和汚亂。由於漠視和汚亂，唯一的續篇，便不得不是病人之速死。

在此情形之下，潘棠馨女士怎忍坐視可憐的蕭伯訥而不加援手呢？她決定要使蕭

伯訥轉地療養，讓自己服侍他。這意見，蕭伯訥的母親頓即應允，既不問她將帶他到那裏去，也不問她是不是一個未婚的女子，總之，這些都不關她的事。只要是比倫敦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地方，大有任何人把他帶去都好的氣概。

但是蕭伯訥老是不願意連累潘棠馨女士。他更不願意損害婦人的尊嚴。自然，潘棠馨女士對於蕭伯訥的無理取鬧，給了一番必要的說明。她認為他必須到別地方去療養，並與以適宜的看護、調理和滋養。這真是不可抵抗的力碰到了不可動搖的阻力了；正因為不可動搖的阻力是一個女人，而不可抵抗的力祇是一個男子，於是不得不求一條解決的路。他確是不得不和她結婚了。

這是時候了，蕭伯訥對潘棠馨說：

「你去買一個指環和一張結婚證書來罷。」

一星期之內，潘棠馨已經成爲結了婚的女人，同時蕭伯訥也已成爲結了婚的男子。

了。當魏白夫婦旅行歸來，他們忽發現蕭伯訥和潘棠馨同居着了，便也覺得疑奇異常。一般人的結婚，不是爲的金錢，便是爲的愛情。蕭伯訥說，兩者都不是他結婚的目的。他倒是說：

『我們的所以結婚，是因爲彼此都已經有了需要。』這話似乎是真話。

當他們在一處註冊局裏舉行婚禮的時候，蕭伯訥還是抱病在身，還是撐着拐杖，還是穿着那件腋下被拐杖擦成破布了的短大衣。因此，據蕭伯訥自述，這回鬧出了一件意外的怪劇。

那天的證婚人，是蕭伯訥的兩個朋友：一是瓦拉斯（Graham Wallas），一是沙爾特（Henry Salt）。

蕭伯訥還繼續報告我們說：

『他們兩位證婚人爲了尊重這種千載一時的良辰，都穿了他們的最好的衣裳。因此，註冊局的人從不想到我是新郎；他竟把我當作了完成婚禮的乞丐。瓦拉斯，身長六尺

有餘，在註冊局的人看來，以爲就是新郎，而且正要鎮靜地把我的新人嫁給他去了，在這時候，瓦拉斯一看事情不對，最後猶豫了一番，終於嫁給了我。』

這一幕喜劇，總算在此告終。

這裏留一部分的篇幅，再回頭來把蕭伯訥夫人介紹一番。

蕭伯訥夫人，是不大露面的，雖有許多人想來訪問她，和她談話，她却一一拒絕了。她不願意被人攝影，正和她不願意被人訪問一樣。她大部分的時期，一向留在背景中。蕭伯訥在前年到蘇聯去的時候，她只自讓她的知友亞斯透夫人（Lady Astor）作蕭伯訥旅途上的陪客，自己却還是留守在家裏。

蕭伯訥夫人，對於蕭伯訥的同情的助力，無往而不竭其所能，好像她的一切，便是蕭伯訥的一切。她爲了他，給以同情的協作，親熱的鼓勵，沉摯的慰藉。她簡直是蕭伯訥的最好的伴侶。

據一部分人說，蕭伯納夫人處處表現着類乎一個日本婦人的風味。舉一個例，就可相信。蕭伯納的家庭佈置，都出於她的手。她把它佈置得異常簡潔，富於藝術意味。蕭伯納在這明靜諧和的家庭氛圍之中，其成功的速度得以促進了不少的吧。難怪蕭伯納夫人曾經自誇着說：

『我一手造就了一個世界的大天才。』

其實，蕭伯納夫人自己倒也並不是什麼庸人。差不多二十年前，她會把法國名劇家白里歐（Briex）的劇本『母道』（Maternity）譯成英文，另外加譯了他的兩個劇本，合成一個單行本。（這二篇之中，有一篇題名『壞貨』（Le Avaries），是卜洛克譯的。）當初無論在英國，或在美國，都沒有人給它出版。蕭伯納夫人曾說：

『在這些情形之下，那三個劇本便一直束之高閣。可是過了四個年頭，白里歐先生成為法蘭西學院（French Academy）的會員了。這就使情形改變過來；因為泥土雖可以摔到一個奮鬥的改造家和宣傳家身上，但總不會沾污一個不朽的人豪身上的長袍，

尤其在『誠意同盟』(Entente Cordiale) 的聯合旗幟之下。因此，我丈夫的紐約白蘭鐵諾斯書局(Brentanos)決定把這部書在美國印行；同時我很高興的又和菲菲爾特(Fifield)接洽好，在英國也出版。

同時，舞台協社答應她自己的請求，上演了這齣『母道』。後來，她又譯出自里歐的另一劇本叫做『獨立的婦人』(La Femme Seule)他的譯本都很成功。她還編了一部『蕭伯訥作品選萃』(Selected Passages from the Works of Bernard Shaw)

蕭伯訥夫人，對蕭伯訥不無占有的神氣。——例如『我的丈夫』、『這個天才』之類的語調，不絕地從她的口中流露出來，就充分表現着這種神氣。

我們且舉一個實例來說明一下。

有一天的下午，正是蕭伯訥的新劇本『十四行詩中的黑女子』(The Dark Lady of the Sonnets)第一次上演的日子。哈麗士夫婦和蕭伯訥在劇場門口碰面了。蕭伯訥興沖沖地走到哈麗士面前叫喊着說：

『老兄，我正在到處打電話給你；現在，就馬上讓我把我的妻先介紹一番罷，然後請你坐到作者的包廂內，鑒定「你的劇本」罷。』

哈麗士夫婦承蕭伯訥殷勤招待之後，終於到了蕭伯訥的包廂內。蕭夫人請他們就座，而且很體貼地使他們舒服。但是哈麗士一看，那邊只有三個座位，便說：

『可是蕭夫人，叫他坐在什麼地方呢？』

蕭夫人純真地回答着說：

『哦，就讓這位天才站在那兒好了。』

哈麗士夫婦就謙讓了一番，她却又告訴他們說：

『這位天才是喜歡站在那裏的。』

至於蕭伯訥夫人自己呢，却不是很喜歡在大庭廣衆之間出風頭，似乎很悅意於他們兩人的倫敦寓所的悄靜的一角。

第十四章 戀愛生活

本章講關於蕭伯訥的戀愛時代的插曲；他的戀愛生活及其戀愛觀，並講到一部分的女伶和無性的女人。

蕭伯訥在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日給一個朋友的信裏說：

『我沒有什麼戀愛事情。有時，女人們對我發生了興趣，我便以舊式的愛爾蘭人的方式懲懃對待，認為當然的事一樣表示崇拜她的意思；但是在我這方面，却完全不算什麼一回事。』

在同一封信裏，他又接着說：

『事實上，我是個天生的好逑者，這是你所不理解的一種類型。我是屬於真正的沙士比亞型的。我理解萬物（everything），也理解萬人（everybody），同時，我是「無人」

(nobody)，又是「無物」(nothing)。』

好逑者！這是蕭伯訥在戀愛的舞台上所表現的一幕。

還有一次，威根孫(Louis Wilkinson)與蕭伯訥作長篇的問答。威根孫問他：

『你以為婦女解放之最大的阻礙是什麼？』

蕭伯訥回答着說：

『性慾。』

蕭伯訥的談話，常用這種方式。遇到簡單的問題，他往往答覆了一長篇；但遇到一切問題中的問題，倒反轉短短促促地給以片言隻字的解答。弄得與他對談者，每每不得不要領。這個短促的答語，便是使人不能滿意的一個例證。

要明確地理解蕭伯訥對於戀愛的認識，我請介紹他的劇本『好逑者』，關於那裏的兩個劇中人物，曾有一段佳話。女主人公，名叫瞿里亞，本是影射一個寡婦，蕭伯訥母親的女弟子之一，曾經很勝利地打動了蕭伯訥的好奇心。所以，她可以說是蕭伯訥的純粹

的戀人。蕭伯訥自身，以「好逑者」自居，投影在那個戲劇中的，便是一個名叫却特列斯的男子。他們兩人的戀愛模樣，在那裏面全都表現着。

不過，從蕭伯訥過往的生活經驗中，我們看到蕭伯訥對於戀愛，並不像他的信中所說『完全不算什麼一回事』，相反的，他曾很急切不過地想獲得女人們的愛，然而他在事後，却又怕把女人們弄到手。他自己也曾經這樣承認過。

蕭伯訥與當時劇壇上的女伶——所謂明星——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雖然據他自己說，是『異樣地無邪的』(strangely innocent)。

當時，女禁尚未大開。演說壇，政治講壇，軍隊等，還不曾有讓她們上台的機會，唯一的門，只在劇壇那邊開放着，從此有學識而有毅力的婦女，大都投身到那邊。女伶便成了劇壇的重鎮，比男性的伶人要握有更大的實力。還有一層，因為那時喜劇盛行，同時在一切喜劇裏，女主角比男主角要佔重要的優勢；不像在悲劇裏面，大半需要男子以爲主角。這

簡直是婦女的一個時代！

當易卜生的劇本輸入英國的時候，蕭伯訥提議，用訪問一個女伶的方式公開運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她却回答蕭伯訥說，如果他把關於她的事情寫出一個字，她便要開鎗打死他。記得她給蕭伯訥的答話是這樣的：

『你或許不相信這些事情在這裏英國有什麼可能，但在美國，我們的想頭便不同了，我一定要這麼辦。我自己備有手鎗呢。』

蕭伯訥趕急地問：

『是該伯勒將軍(Gabler)的手鎗嗎？』

這一次，蕭伯訥終於不敢寫一篇『訪問記』。

蕭伯訥認識的女伶很多。他曾說過：

『我所知道的一切偉大的女伶，即使約翰生博士(Dr. Johnson)說起來，寫起來，

也要頭痛手痠的。有幾個女伶，在舞台外，比在舞台上更偉大；可是我不能公開地說出關於她們的事。』

蕭伯訥與名女伶亞倫特萊的戀愛，更是『有口皆碑』的一段艷史。現在且讓他自己表白罷：

『道德和情感並不是腳光（Foot-light）兩旁同樣的事物。亞倫特萊和我在九十年代，大約曾互通過二百五十多封信。在一個舊式的女教師眼中看來，一定要說那裏面有許多信件是野性的情書。我們彼此所住的地方，雖然相隔甚近，只要一先令的馬車費，便可自由往來，但是我們從來不曾祕密見面。唯一的一次，是在『白拉斯蓬』那劇本上演的第一夜，我纔接觸了她——我纔在外表上吻了她的手。』

戰前不多時，蕭伯訥還有一個過從甚密的女伶——康普培爾夫人（Mrs. Camp-

bell) 據蕭伯訥說，他們是一向保持着『異樣地無邪的關係』他並且聲明過：

『我可以說，從亞倫特萊一直到伊文斯(Edith Evans)，凡是我和她們有過任何私人交接的一切著名女伶，都曾把她们的毫無顧忌的友情放在我的身上。』

對於康普培爾夫人，他確是一個『好逑者』但是最後，嚴重的事實忽在中途發生了。康普培爾夫人終於和他們兩人之間互相認識的一個朋友宣佈了訂婚，不久也就結了婚。同樣的，蕭伯訥正在與亞倫特萊互通情書的當兒，也突然傳出了和另一女子——即潘棠馨——結婚的消息。像這樣子的蕭伯訥，的確可以說是一個驚異的情人吧。在這種『安全第一』的條件之下，那些女人安得不待之以『偉人』之禮，視之為她們的情人呢？

蕭伯訥也曾經這樣提醒人家說：

『凡是有任何真實事業在世界上活動的人，對於一種事物的追求，決不浪費如此長的時間，如此貴的費用，像追求一個女人那樣。』

這個警句，從清教徒的觀點上看來，尤其是含有若干真理的。

寫信是不化錢，而且也不很浪費時間的一種追求方式。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蕭伯訥給女人寫信，便成爲習慣，正和他吃素菜一樣。尤其是給亞倫特萊的信，差不多總是『一日一信』，或甚至一天連寫幾次，像他的長篇大論一樣。

他的實踐，正與他的理論相同。他這樣寫書信，是抱着戀愛不忘事業，事業不忘戀愛的宗旨的。現在我們來把他寫給亞倫特萊的信中的幾句話，載在這裏：

『我愛女人，同時我也真心地喜歡別種東西。大部分女人把男子及其一生認爲就是整個的世界；但是我對於古今內外，都有需要。爲要使我的著作機器加速進行，戀愛只是我的娛樂和休息……』

在這裏，我們再讀一讀下面的一封信。這是蕭伯訥寫給康普培爾夫人的書信之一。

日期是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信中說：

『信內附上吾姊呂茜給你的信，或許可以給你一點喜悅吧。我的這顆大理石一般

的心，對於你那一次的過訪，實在是熱烈地感激不盡。你是我的友人，也是我的愛人，我原諒你今天沒有到我這裏來。鄉間真是令人失望。野兔和田鼠正在小巷中守候着你；但當牠們看見只是我在吐氣發笑的時光，牠們便立刻呈出厭惡的神氣，倉皇地逃走了。天在震怒：雷霆在響，大雨在下，傾注着我不消五分鐘，小巷便成澤國了。』

這封信帶着些寂寞悲愁的調子。戀愛時代的蕭伯訥，或恐正是這副模樣吧？

有人以爲蕭伯訥是在生理上健全而在心理上變態的人。又有人以爲蕭伯訥雖然愛坐汽車，愛游泳，愛散步，使他們的身體很康健而精壯；但是他的生理上的缺點是很顯然的。蕭伯訥對於這種懷疑他的人，給了一個聲辯：

『……我是一個人。如果你懷疑我是否爲正當的男性，那麼，請把這念頭一古腦兒丟開罷。我既不是陽萎者；也不是無育者；更不是同性相交者；我却是極端地多情善感的，但這也並不是無所選擇的。』

他又說：

『性的經驗，似乎是人的生長所必要完成的一件事；我受這事的吸引，比受童貞女的吸引更強烈。我歡喜那些解事的女人。……』

他又說：

『我說過，我的奇遇開始在廿九歲的那年。但如果以爲那就是我的性生活之開始，却也是太冤枉了我。這一點請不要誤會：除了很難得地不自覺地情不自禁於夢幻境界外，我是完全節慾的。但據王爾德（Oscar Wilde）說，他十歲就開始他的性的生活。盧騷（J. Rousseau）則說，他從出生就是在他的血裏沸騰着肉慾。在他們兩人的說話之間，我的經驗確認盧騷之言爲有理，而驚異於王爾德的怪事。正像我現在記不得什麼時候是我曾不能讀寫一樣，我也記不得什麼時候我曾不會練習想像關於女人的故事。』

蕭伯訥在一九二八年，和他的老友哈麗士最後一次會面時，曾爭論過關於女人的事。現在根據哈麗士的『蕭伯訥評傳』的第一章『蕭——過去和現在』中所敘述的

話來重說一回，這是很有趣味的。

蕭伯訥很覺得奇怪，不知道爲什麼比他自己大半歲的哈麗士的面色竟是這樣地年青。

『好肉，好酒，好的威士忌，而且很多很多。而你老兄——看來是很蒼白，近於禿頂，瘦得像欄杆一樣呢。』哈麗士這樣說。

『我的面色，正是全歐洲所驚羨的一種。現在我的頭上，還沒有禿頂的地方；我的纖瘦正是我的一種特質，並不是一種過失。然而你竟然妬氣十足，反轉到處去告訴人家，說我是性的低能兒。』蕭伯訥的答覆。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哈麗士的聲音。

『不錯的，你是說過的——去年冬天在柏林的一次演講中說過的。』蕭伯訥的回

『哦，如果我果真是說過，那麼一定是實在的。你確是性的低能兒。』哈麗士這樣說。

說。

『那一定是不實在的。如果要那樣說，還不如說我是性慾過度者。』蕭伯訥却這樣說。

『你是性慾過度者嗎？你不是曾經告訴過我，你十九歲那年到倫敦，廿九歲那年纔開始與女人發生性的行為嗎？那是足足有十年的光陰！如果是沙土比亞，一個月就行了，如果是我哈麗士，或其他任何小夥子，恐怕只要十一天，或者甚至十一小時，也就行了呢。』哈麗士的嘲笑聲。

『啊！可是在那時候，無論是你，或是他，總還不曾像我這樣受過漢岱爾，莫札特，密開蘭其羅，拉飛爾和希臘雕刻的教育。如果你的美的意識，早就適當地營養過，你也決不會在那樣的年代，去接觸任何像現實的女人那樣散文似的東西。』這是蕭伯訥的最後的解答。

同樣的，他在別一個時期內早就說過：

『像一切少年人一樣應該的，我是「愛之女神」的崇拜者。我從我的兒童時代起，就

沉浸在浪漫諦克音樂裏面。我領略過愛爾蘭國民美術館（很好的一所美術館）裏面的一切繪畫和雕刻。我讀過我手頭所能拿到的一切作品。大仲馬的歷史書，梅葉皮爾的歌劇，我同樣歡喜。我立在大爾基（Dalkey Hill）小山之上，草舍之中，我暝想着一個永恆的詩人雪萊派的夢——海的夢，天的夢，和山的夢。現實生活只是好像把一片穢物加進一個想像的天堂裏面一樣。我是飽嘗了甘露。「愛之女神」是美的。

在這樣的生趣之中，他是一個童男——直到他二十九歲。在那時，要是有女人丟一條手帕給他，他就會立刻逃跑的。

自後他常發現女人們戀愛他。他自己也說：

『我不會需要追求過女人們；我却會被女人們追求過。……一切的追求者，不會需要發生性的關係。她們只需要伴侶和友情。……我發現了，如要把性視為永久關係的一種基礎，是沒有希望的，我也從不藉此夢想結婚。我把其他一切都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從不爲了要消受一夜春風，便拒絕或破壞社會主義的演說的約會。我之所以喜歡性的

行爲，是因它具有一種驚人的力量，能產生感情的聖潮，能使人生的目的向上提高，這性的行爲雖然爲時短暫，然而這給了我一張圖樣——使我認識了將來人類求知熱的常態是怎樣的一張圖樣。我常常滔滔不絕的把這點意思大放厥詞，一半就是因爲我覺到女人有知道我在她懷抱中的感覺之必要，一半却是因爲我願意她來共同享受它。』

最後他又說：

『而現在呢，我沒有『傳奇文學』(romance)，尤其是沒有猥褻文學。』

在蕭伯訥的作品中的女性，簡直都是一些中性的女人——也就是些無性的女人 (sexless women)。試看蕭伯訥作品吧。其中的主女人公，如果與易卜生劇中的富於人性的女主人公對照比較的時候，倒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所以這裏特地附帶說一說他作品中的女性。

娜拉 (Nora) 在易卜生的名劇『傀儡家庭』中是一個『新』的女性，至少在易卜生

的時代是一個『新』的女性。娜拉之所以被認為『新』的女性，很顯然的是因為她的果決的精神，和堅韌的頭腦，在她一認識真理的當兒，便立刻決定，立刻實行，但同時她是非常女性的。她不甘受人指使，為人傀儡。她感到她自己是一個人類，一個人格。她要人家把她當作一個成年婦人看待，並且需要對於戀愛與熱情的理解。

在蕭伯訥的戲劇中，有這樣的女性嗎？沒有，絕對沒有！有的，只是蕭伯訥自己的中性的女人——中性的傀儡！

蕭伯訥和女人的關係，向來是懶散的，甚至是戰戰兢兢的。他肉體上對女人屈伏的，簡直是很少很少，大抵這些童貞女，就與他在他作品中所描寫着的是相彷的吧。果真這樣，那麼，其原因即在乎蕭伯訥的女人們中有這種大缺憾——就是缺乏神祕溫雅，神聖，吸力和媚力。一切他所能注在她們身上的，只是一味的『生命力』。

蕭伯訥認為他的作品中最壯麗的女性創造，乃是『人與超人』裏面的女子愛痕

(Ann Whitefield)

『每個女人並不是愛痕；然而安痕倒是每個女人。』蕭伯訥這樣說。

有人對他這句話回答說：

『每個女人嗎？可不是我的女人哩！』

當一個女人戀愛的時候，蕭伯訥以為她追逐她的男子，直到弄到她的手裏才罷。可是却斯透頓辯正他說：

『籠子或許會捉老鼠，但不見得就有籠子追逐老鼠這回事。』

有一次，有許多人討論到人們因無酬的戀愛而死的問題，蕭伯訥看見他們大家都懷疑派，這問題似有使某種人早死的可能，他便插口說，他有一個友人愛了一個女子，但那女子却嫌她自己太窮，所以拒絕和這男子結婚。

『那麼他死了嗎？』座上的人擊桌而問。蕭伯訥很幽默地答覆了這個問題：

『他死了，死在五十年之後。』

總之，蕭伯訥認為智慧就是一種熱情，理智也就是一種熱情。現代一般的見解以為

熱情只是性，這就和鄉下人的觀念中以爲藝術僅是淫猥，同樣地粗淺而且野蠻的。確，蕭伯訥是把理知當作了一種熱情。他竭力地表示着，當性完全禁制的時候，便是藝術發旺的時候。他並且列舉例證，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即產生狄更斯的）時代，意大利的繪畫，希臘的經典，它們之所以能夠達到他們的最高點，都是些限於一種宗教和一種傳統而對猥亵文學施以嚴重禁壓的結果。

蕭伯訥是一個清教徒，他關於女人，關於戀愛，關於性，自然不能不發出這樣的理論。這樣，我不妨再說一遍蕭伯訥的警句吧：

『而現在呢，我沒有傳奇文學，尤其是沒有猥亵文學。』

據他看來，像哈麗士的一部創作『我的生活與戀愛』（*My Life and Loves*），便是猥亵文學。怪不得他讀過之後，隨手付之一炬，使該書不致落在他的女僕眼中，而做出些什麼不穩當的勾當來。

好了，這一場趣劇，正可以算是本章的尾聲。

第十五章 日常生活

本章描寫蕭伯訥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從衣，食，住，行，風貌，性格，一直描寫到極瑣碎的著作情形，及其他日常生活。

誠如標題所示，這一章所要描寫的，是關於他的日常生活，而且是極瑣碎的一切。有人也許以為這是不屑記載而忽視它吧；尤其是在這樣的一部文藝傳記中間，似乎算不得是『正史』吧？

如果不是正史，那麼我以為這算是插話好了。

一個『大人物』如蕭伯訥其人者，正不妨插入一些『小事情』而在小事情上面，或者正可襯托出大人物的原形來，優點是優點，劣跡是劣跡，偉大的還他偉大，渺小的還他渺小。自然部分不能概括全體，這裏也並不存着因小見大的意思。

不過無論如何，小到衣食住行等事情，總究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然與生活有關，自然不會不是傳記中的資料。這樣看來，你不知道這些小事情，或許就不能知道大人物吧。——於是乎決定寫這個大人物的小事情。

誰如果瞥見過蕭伯訥一面，誰就會在他的腦中留下一個『長臉老人』的印象。在許多的漫畫家所作的『蕭伯訥畫像』上，也都表現了這個特點。

這位臉長身細的蕭伯訥，却是一向十分康健的，而且是愈老而愈活潑，愈強健了。這一次，他為要償其飛游長城的宿願，竟不忌狂風的肆虐，不怕高空的嚴寒，搭了一駕飛機，飛過積雪的山頭，遙瞰蜿蜒的長城，繼續飛去，高臨圓明園和明陵之上，所有的奇景壯觀，全都一覽無餘。據說當時曾飛到八千呎的高度，寒暑表已降至零度下三十五度，且飛機駛在急風裏，震盪得也極猛烈，雖嫻於駕駛者，也有疲勞之感，而老當益壯的蕭伯訥，竟毫不覺苦。游罷出機時，他甚至不利用足踏，便一躍而下，宛如一個年富力強的學童模樣。這

還是本年二月二十四日路透社訪員的報告。可見其身體的強健，確是事實。

他直立的姿態，表現了他的堅強和結實。他的健全的，筋骨柔軟的兩臂，都沒有呈出衰老的氣象。

從他成名以來，他有的是錢，有的是良好的滋養料，有的是『返老還童』的藥品，所以身體的堅實健康，實在是不足驚異的。

他的日常的生活資料，都是些對於他的健康有利的條件。雖說常吃素食，但都是特別預備的精饌。衣着也舒服，有合於衛生的衣衫，也有優等的羊毛襯衣。脚下穿的是手製的平底鞋。住的方面，市中有一棟富麗的宅邸，在近郊有一所長滿着樹的別墅。出門的時候，他有一輛心愛的小汽車，可以代步到遠處去，則坐頭等列車，或住高尚旅館。

見過蕭伯訥的壯年時代的人，在他們的印象中，無不說他是身體特別的長，穿着靴子的時候，總有六呎以上，然而是骨瘦磷磷的。他的體態是像欄杆一樣的纖瘦，他的臉龐是很細長，多骨，而且多鬍子。他的不加修飾的鬍子是發紅的，他的頭髮是褐赤色的，優美

的。他常毫不經意地穿着絨布的服裝。他的手很清潔，保護得很好，但不修指甲。他的不安定的動作，正和他的心神一樣，時起時伏，倏忽萬變。他的一味的拘束，他的犀利的目光，他的稍稍直豎的眉梢，一切的一切，都表出他是一個多能的人，同時表示他對於他自己的才能，以及他的十分公明的，懲懲的，和尖銳的決斷力，富有自信的神氣。而且他還是一個迷人的談話家，女人們對於他的音調，也都不能不倍加稱賞。

一直到目前，還是不改變的，所有的新聞記者，都感到蕭伯訥很不容易被訪問。一經訪見，便喜不自勝。他當然是會說話，而且有所言的，但是記者却似乎不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只要蕭伯訥開口，便覺得了不得，而用不着顧及他說的是甚麼。只管把他的話，一概「記錄」下來。譬如蕭伯訥說一句『天氣好』，記者們便笑着向天空凝視一下，好像真的有什麼故事在那裏的樣子。

蕭伯訥和人坐着談話的時候，他往往繼續不斷地叉他的大腿，這樣叉，那樣叉，橫叉，

豎起，一刻不停；同時他又喜歡把他的手，從口袋內伸出，伸進；然後挺直身子，稍稍向後仰去，靠到椅子背上，在椅上舒展他的全身。——總之，他的模樣，純然是和傳說中的黏液質的哲學家一樣。

蕭伯訥是把吃素奉爲主義的，這個主義就是所謂素食主義（Vegetarianism）。很可怪的，他的素食主義不但沒有損害他的健康，反而像人們吃牛肉精和象肉精一樣的富於補養力。

他的肺，特別具有一種宏大的容量，他能夠咀嚼任何食物，從這一點看，已可見到他雖是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還是像在少壯之年一樣。

關於素食主義，據蕭伯訥的書信中看來，曾有一個極有趣味的笑話。

伶人屈理（Beerbohn Tree）曾開過蕭伯訥素食主義的玩笑，對女伶康普培爾夫人說：

『來讓我們給蕭伯納吃一塊牛排罷，看看到底會有些什麼結局。』

康普培爾夫人立即回答着說：

『算了罷，千萬不可給他吃；他現在已經夠壞了；如果再吃一點牛排，倫敦全城的婦女就要沒有一個不給他揩油去了呢。』

蕭伯納筆健非常，下筆十分神速，文思好像山泉一樣地往筆底流出，簡直有一瀉千里之勢。他在習作時代，按日規定寫二十頁。但這種機械的方式，終於不久就因厭倦而放棄了。以後他用了書記，把他口中說出的話，照樣地記錄下來，再經過他自己看過一遍，就成稿子。所以在他的著作室中，只聽見蕭伯納的踱來踱去的脚步聲，一面踱着一面嚷着的語言聲，以及從打字機上發出的滴搭聲。

他的文思是蔥蘿的，他的話語是絮絮不休的，因此發掘了他的雋永的機智，完成了他的大量的著作。他曾經每天坐在倫敦的一個公園中，在練習簿上寫作過一個劇本，也

曾坐在畫室中當某美術家替他作畫像時構成過一個劇本。

蕭伯訥在充任批評家的職務，向各報紙雜誌過投稿生活時，他的工作情形是非常動人的。無論是健康或是有病，他都是一個最可驚羨的著作家，每天到與他有關係的報館裏去，從不遲到片刻，也從不無端缺席，却老是把他的稿子準時交出。他是非常精細審慎，鄭重地校對他的樣稿，帶着一種罕有的嚴正態度，因此他的工作成績特別美好。

他對於自己早年的作品，真是大有舐犢情深之感，雖歷時數十年之久，亦不忍割愛。

前面已經說過，第一部小說『未成熟』在一八七九年早已寫好，一直擱到一九三一年，他還搜出變色了的舊稿來給它出版。算起來，歲月已經相隔五十二年了。因此，有人批評他，說他出版這一類的舊作，無非爲的是幾塊金子。其他各種舊稿，也都不免貽後人以譏訕的口實，例如他的那部『芳妮的最初的劇本』在二十年前出版過，至今已經被人遺忘了，但是到一九三一年，忽又給以重版，把它從死灰裏抓到書局的架上，變賣了若干洋錢，博得了相當利潤。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的他的同志斯瓦佛爾(Hannen Swaffer)曾以

嘲罵的口調說：

『蕭伯訥現在不是靠大豆過活的，倒是靠宿食度日的哩。』【按：這裏所說大豆是指新的作品，宿食是指像「芳妮的最初的劇本」一類的舊稿而言】

這句話簡直是把蕭伯訥罵倒了。

他現在是成爲了英國戲劇家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了。蕭伯訥式的人們，甚至說他是沙士比亞以來最偉大的作家，他自己對自己的評價，却半像自謙，半像自傲地說：

『我縱然不能保證我自己是最偉大的現存的「笑話商人」；可是我敢斷然地說我是最好的十大作家之一。』

蕭伯訥終究是自命爲站在沙士比亞頭上的一個劇作家；換句話說，他是比沙士比亞更偉大。據說因爲沙士比亞沒有社會的意識。這一點，正像托爾斯泰瞧不起沙士比亞，說他的藝術不會直接推進人類的平等和人間的和平與博愛之福音差不多，但是

蕭伯訥式的供狀，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他謙遜（？）地說：

『如果我的劇本『鱉夫之室』不比沙士比亞的作品好，那麼就立刻把它打下十八層地獄罷！』

他還相信他的其他的兩個劇本，『回到麥安賽拉』和『心碎之屋』，也都比沙士比亞的好。他曾經說過，等他一有功夫，他就要把沙士比亞的傑作『哈姆萊脫』改作，務使它表現出它的真意義。

蕭伯訥說過蘇聯的領袖斯達林是很謙和的，那麼他自己要算是最驕矜的了。他常在他的笑談之中，表現着一種傲慢的態度。

有一次，美國有一位太太，見了蕭伯訥，很正敬地對他說：『你就是蕭伯訥先生嗎？久仰大名！』

蕭伯訥聽到說他在美國已享『大名』，便老實不客氣地問道：

『那一個大名？我是一個哲學家，小說家，社會學家，批評家，政治家，戲劇家，而且還是

神學家呢。因此，我有七個大名哩。』

也就因此，引起了人們的反感。甚至有一個老朋友都說他至多不過是一個常識家，但是決不是偉人。因為俄國十九世紀的大文學家朵斯托也夫斯基早已說過：『一個偉人必須建立一個能夠反常識的立場。』

他生平最服膺的兩個大思想家：一為馬克思，一為白格爾（Buckle）。他曾說：『在全世界成千成萬種的書籍中間，能使讀者留一深痕的，實不多見。如果有人要請我舉出十九世紀的若干人物來，那麼我一定要指出：祇有馬克思和白格爾，才佔第一位。』

蕭伯訥對於現在已經逝世了的列甯，却也是推崇備至的。在一九二一年，列甯正用着全力在抨擊反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時候，蕭伯訥有一次碰見了他。蕭伯訥便送了他一本書，書上題署了許多頌揚列甯的文字。現在這一段文字，已經攝影製版，成為石印。

物了，在蘇聯銷行着。

蕭伯訥知道怎樣造友人，怎樣造敵人。他說：

『對待你的朋友，要把你的朋友當作會有一天成爲敵人一樣；對待你的敵人，也要把你敵人當作會有一天成爲朋友一樣。』

蕭伯訥對於任何事物，都以實際價值爲評量的尺度。王爾德曾因此給他製造了一句警語，叫做：

『蕭伯訥在這世界上固然沒有一個冤家，但同時他的朋友也沒有一個人喜歡他。』
他不願意人家侵略他的私有財產，他瞧不起向他借錢的朋友，甚至不願意看人家穿着襤襯衣之類，不願意給人家引用他任何著作中的文字。

他對於他所歡喜的人是慷慨仁慈的，他對於他所不喜歡的人則取絕對冷酷的態度。他有討好人家的魔法，他有抓住羣衆的魅力，他有打動人家，吸引人家的技術。

他不同人家騎馬，打獵，射箭，搖船，打高爾夫球（golf），也不喜歡和人家拍網球，打板球（cricket）。總之，他不願與任何次於自己的人們相接觸。唯一認識蕭伯訥的方法，是在委員會席上，或者在他的工作時間內。

他的娛樂方法，據他自己說，一般地說來，是『除掉遊藝以外的一切』；特殊地說來，是『顯本領』或『出風頭』。

他厭惡運動。他痛恨獵者，他不許獵者踏上他的居處。

他不與當地的人士來往，他只喜歡他自己的朋友。黃昏時，他常唱起歌，奏起琴，來招待他們。

他故意地逃避與文藝界的接觸或交際。他嚴謹地拒見文人，正彷彿是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拒見兵士一樣。

他不僅拒見文藝界，而且連社會各界他都不與他們交接。你不能看見他在俱樂部裏的足跡，也不能看見他在家裏。外界有給他宴會時，他一律不去。他是不去會客的。總計

他全部生涯中所用的『會客的名片』(visiting card)，恐怕還不滿一百張吧。

當他窮到不得了的日子，他是死也不肯借人家的款子。朋友們要借錢給他，他也是堅拒而不受。如果問他『爲甚麼原因？』他就辯白着說：

『一個朋友總不至只值一張五元錢的鈔票吧。我不願出賣。』

但是到了他有錢在手的時候，他也不肯冒險投資，也不肯隨便使用。他沒有一個小錢，拿出來供任何形式的公衆娛樂，無論是演劇或其他。這看來好像是一个很吝嗇的人。記得有一次，杜爾漢地方的礦工，要造一所賤價的工人住屋，曾向蕭伯訥借了三萬金鎊。

英國新聞記者知道了這個消息，馬上奔去問蕭伯訥爲什麼借錢給他們。他回答說：『貪六厘錢的利息而已。』

這件軼事，至少表現着他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人道主義者。

蕭伯訥是不大理睬他所不喜歡的報館或雜誌裏的人的，但有稿費時却作別論。有

一次，一個記者去找他，請他寫稿子。他回答說：

『我可以給你寫一篇，可是我的價錢是一萬五千金鎊。』

他是不願意人家引用他任何著作中的文字，上面已經說過；這原是因為他需要一筆稿費。有一次，一個編輯家去請求他允許給自己引用蕭伯訥的一段文章，曾經碰了一鼻子的灰，原來蕭伯訥告訴他說：

『我可是非需要二千元不行的。』

哈麗士曾引人家的話以一個友人兼敵人的口吻挖苦他說：『蕭伯訥有一個暗藏著黃金的心。』

關於這『一個暗藏著黃金的心』，且讓他在後面的一章裏再來表白自己罷。

第十六章 在和平與戰爭中

世界大戰是一個試金石。大戰對於蕭伯訥發生了些什麼影響，以及他在戰前，戰後和戰爭中間完成了些什麼工作，是本章所分解着的內容。

當一個嚴重的日子到來的時候，應該是真實的人講真實的話的日子。不僅這樣，而且應該是加緊行動的日子。

歐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自然是再嚴重不過的日子了。蕭伯訥甘冒不謹，正當全國動員，秣馬厲兵的當兒，擅自作獅子吼，提出非戰的論調，不主張參戰。至於英國所有的智識份子，甚至社會主義者，在平日還肯相當地說幾句話，到了這時候都把頭蒙在鼓裏，而且把真實的意見也早已塞在衣袋裏去了的一樣，毫無一點動靜了。真的，大戰簡直是一個試金石，把什麼人都化驗出來了。

他在戰爭中，和在和平時一樣。當然，在和平時，他曾經以戰爭為中心題材，寫過許多論文和劇本，就中以『少校巴拉』(Major Barbara)『安特羅克里與獅』為最著名。他也曾用盡了平生之力，在各方面啓示民衆，尤其在戰爭方面，他使他們知道什麼是戰爭，什麼又是為正義，為真理的戰爭，同時，戰爭的罪惡，愚蠢，無恥，殘酷，他都盡情地把它暴露了出來。一九一五年，他發表了『維多利亞勳章的奧佛拉蒂』，一九一七年，他又繼續寫出了『這也是為着國家』等非戰的著作。

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戰爭常識』(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一文的刊布。他的那篇文章一發表，馬上就銷去了七萬五千份。主要的是痛詆英國當局參戰之失當。因此輿論上一致認為他是奸細，攻擊他說他有意袒護德皇，使他受盡了控訴和非難，甚至幾遭殺身之禍。該文的一部分曾在紐約泰晤士報上發表，沒有登完，並且不曾聲明續刊。因為美國人認為它最初的部分就表現着擁護德國的宣言。

『這應該是三歲的小孩都知道的，就是在討好於協約國的任何新聞報上，『戰爭常識』這篇文章是應該把全篇發表，否則就全不刊布。這篇文章，大部分是給美國人讀而擘劃着的……』

此外，他的那本劇本『老獅的最後之春』(Last Spring of the Old Lion)，也是在戰爭期間寫的。

正當英國捲入世界大戰的漩渦中的時候，蕭伯訥即持着堅決反對的論調。他說：『軍國主義者迫着我們出一千鎊戰債，無非是企圖使小塞爾維亞人割斷我們的喉嚨，或大俄羅斯人斫碎我們的腦袋罷了。在我看來，我倒情願拿出加倍戰債的數目，來保全生命，否則我也情願拿出更多的錢財去買些維也納畫，以便公開到國民美術館裏去。』

他一方面果然是害怕着即將消逝的所謂『文明』，另一方面却也實在痛恨帝國主義將帶來的一切罪惡：毀滅、崩潰、悲慘、貧困及其他悲劇的結果。

關於蕭伯訥在戰前對於即將爆發的歐戰的態度，有人譯過他那封寫給美國的一個社會主義者同志的信。那裏面，他說着如下的話：

『倘若美國建造十六隻戰艦，我甯願它建造三十二隻。倘若美國發一千萬圓的軍費，我甯願它再加上一倍。這數目是你們國家不道德的浪費中的一小部分呢！你知道，在歐洲的軍國主義者却把你們浪費掉的金錢節省下來，作為互相火併的戰費呢。若美國懷有防止戰爭，警衛世界之志，非得有一種強大的組織不可。要是我是一個美國政治家，哼，我就得坦然地告訴美國，要它保有強大的海軍，一方面，可以防止英國的襲擊，一方面，防止日本的爭戰。那些好戰的傢伙，不到他們焦頭爛額的最後一息，是不會覺悟到他們的愚蠢的自殺的政策的。』

在這裏，他是明白地指出了戰爭只是自殺政策的一種表現，而應該加以防止。

同時，他是完全站在合法的和平主義的立場上的，你看他在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可不是提出了這樣的抗議嗎？

『在這時期打消自動投軍和削弱國民倫理的這種危險，是太嚴重了。我自己一直就沒有去參加過，一直到大戰過後。』

這種態度，當然是英政府所容許的。他又告訴我們說：

『我仍然發現到，在當時美國人和在美國的英國人——瓊斯(H. Arthur Jones)就是其中的一人——的印象中，認為我是一個法文中所說的失敗主義者(Defeatist)。英政府更深切地認識了我，倒也是我的僥倖，要不然，我怕早被他們鎗斃了呢。』

這很顯然是蕭伯訥的道德袒護所使然。因此他的著作和訪問記之類，都保持着一些比較地穩健的態度。其他各國的許多急進的社會主義者——例如德國的李卜克訥西(Liebknecht) 和美國的譚白斯(Debs)——都因反對戰爭而遭受了各自政府的陰謀的陷害，但蕭伯訥終於沒有株連在內，亦不是無緣無故的。

在戰爭期間，他認為他的唯一有意義的工作，是與其寫他的劇本，不如寫他的政治論文和小冊子，這樣，要比較地切於實際。在『心碎之屋』的序文的末段，他自己就已說

明過這件工作的必要。他說：

『你決不能以戰爭與戰爭相拚，而同時與你的隣人相拼。戰爭決不能忍受喜劇之可怕的鞭笞——舞台上閃爍着的無情的笑光。當人們正在英勇地爲國捐軀的時候，決不宜使他們的情人，妻子或父母知道，男子們是在怎樣地死於蠢人的舛誤，死於資本家的貪慾，死於戰勝者的野心，死於煽動家的運動選舉，死於愛國志士的僞善主義（Pseudo-idealism），死於好鬥者流的邪念謠話，毒舌和腥血，他們這些好鬥者流，以爲戰端一開，他們的牢門便可打開，使他們一躍而登上勢力有名聲的寶座。因爲除非把這些情形毫不留情地暴露出來，他們定將在舞台上掩飾在空幻的大壁裏面，正像在現實生活中掩飾着一樣。』

再聽一聽他的供白罷。

『不管是一次或兩次的自由革命，我却再不能滿意於買空賣空的道德和買空賣空的善行，也再不能滿意於買空賣空的光榮粉飾在劫掠，餓餓，疾病，罪孽，酗酒，戰爭，暴行，

貪婪和其他一切文明的日常事情上面，徒使人們走進劇院，受些愚弄欺騙，妄稱這些事情就是進化，科學，道德，宗教，愛國的思想，帝國的優越，祖國的偉大，以及凡是新聞紙上所用的其他名義。』

無疑的，蕭伯訥的『心之善良』在最近的大戰中，也可以表現出來。有一個朋友康普培爾夫人的兒子忽然陣亡了，他就禁不住閃爍出他的真實的情感，尤其是對於這種普遍的大屠殺。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他爲了這位康普培爾夫人的兒子的陣亡，曾寄她如下的一封信：

『我一直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到過這一件事，直等到你有了來信，纔確實了。這是全然不中用的：我不能表示同情；這些事情，徒然令我憤慨。我要如此立誓，我也正在如此立誓。爲什麼被殺，正因爲人民是些可咒詛的傻子罷了。一個軍隊牧師，也會對於這一件

事，說些愉快的話。然而他的生意經，自然不是說愉快的話，祇是叫幾聲「貴公子的血語，從地底下訴諸上帝」罷了。不，你這封信是不必寄給我的。可是我倒很喜歡和那個親愛的牧師，那個甜蜜的說教者，那個……暢談一回愉快的話。

斯坦拉，〔康普培爾夫人的小名，這是親暱的稱呼。〕請不用多事悲傷了罷。過一個星期，我就會重新變成十分聰明，十分心寬，而且也就會把關於他的一切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我也就會像牧師那樣地愉快起來。

哦，該死，該死，該死，該死，該死，第九個該死！然而哦，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最親愛的！

G. B. S. 〔蕭伯訥〕

如果他不是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不是抱着反帝國主義的態度，他就決不會對於與這世界大戰的瘋狂共生死的人，下這樣的幽默語吧。

蕭伯訥在一封討論歐戰問題的信尾上，曾經爲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李卜克訥西和譚勃斯的受刑，提出了民權思想的同情的抗議。他說：

『當他們〔指美國人〕開始把一個華盛頓式的團長判處無期徒刑，接着又是一連串的迫害，一直到最高度的表現，把譚勃斯也無理處置了的時候，他們確是羞辱了他們的國民，羞辱了威爾遜總統，反而德國對於像李卜克訥西那樣的一個直認不諱的叛徒，倒容忍了相當的時期，纔把他禁錮起來，而且也祇關了四年，這樣看來，德國倒很有權利可以宣說，即使在德皇之下，德國還是自由些，比之美國在牠的自吹自擂的民主論之下。』

他接着給那收信的朋友說：

『我站在一個共和主義者的立場上，我爲美國的愛國志士們羞，請你爲我向他們轉達此意罷。』

在一九一七年，正當大戰在高度發展之際，他從西部前線歸來，聽到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便眉飛色舞，欣然以喜。給哈麗士的一封寥寥數語的短簡內，說着關於俄羅斯的

事，我們不能不引在下面：

『親愛的佛蘭克·哈麗士足下：

從俄羅斯來了個好消息，可不是嗎？此事殊非參戰國之所願望，猶如俾士麥之不願使法國在一八七〇年造成共和國一樣；然而上帝用了種種方法，却已完成了他自己。這大約是無足驚異的，他早已爲了我們，備有祕密的策劃了。

永遠地你的，蕭伯訥』

一個和平主義者的蕭伯訥，在他的劇本『聖瓊安』(Saint Joan) 裏面說：

『一個完善的和約，勝於十場的爭鬥。』

他用着同樣的氣息，曾經大聲地說過：

『當一羣狼聯合起來殺一個馬的時候，馬的死亡，僅足以使牠們爲了這一口美饌，

引起互鬪。人如果沒有較好的主張，決不會比羣狼爲優；同樣地，我們看到休戰與和約，僅足以使我們趨向於再度的戰爭中的軍備的競爭罷了。』

但是，他終究不曾從本質上認清國際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因此，在他宣佈了『休戰與和約，僅足以使我們趨向於再度的戰爭中的軍備的競爭』之後，他忽然提出組織一種『國際聯盟』的意見來。其後，國際聯盟果然成立了，論者說這未始不是蕭伯訥等人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政治的合作之努力出來的結果。因爲蕭伯訥及其他費邊社同志曾經起草過的一種『國際政府』的草案，可以說是國際聯盟據以形成的一種歷史上的文件。

到了現在，他對於虛有其表的『國際聯盟』也不得不感到幻滅和失望了。他最近曾對某新聞記者說：

『你們也知道國際聯盟的活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國聯祕書處，是處理外交事務的。它只會開會，討論，報告，不會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我自己曾出席過一次大會，可是再

也不敢作第二次的嘗試了。另一方面，就是國際勞工局，這個團體是一個很不合法的組織，它的工作，還算差強人意。

戰後有人問蕭伯訥關於歐戰的影響問題說：

『你以為戰爭整個地說來是否給人類以福利呢？』

蕭伯訥便用了他的特有的方式回答了：

『你想想看，舊金山的大地震，整個地說來，是否賜福利於加州呢？這場戰爭，除了殺死了那些在場的人們而外，一方面表示着鋼架的凌霄摩天的大建築物的穩固，另一方面却震倒了大量的腐爛而不健全的建築物。固然，戰爭也震倒了俄皇的帝國——一個可惡到不可名狀的眼中釘，同時也消滅了新的日爾曼帝國和舊的羅馬教皇陛下的奧大利帝國。然而如果我們只靠這可怕的事變的偶然的結果，就能使我們改善的話，那麼人類還有什麼希望存在呢？戰爭是一種恐怖；人們只會因戰爭而陷於更惡劣的地位，自然，一些懷着這樣狹義的自私觀念，而認為戰爭可以改進他們的人，是不在此例的。』

無論如何，蕭伯訥是一個『無論在戰爭中或在屠夫的後院內，都恨惡屠殺』的人，雖然，他也會這樣地寫着：

『在事實上，如果我沒有一支有力的海陸軍，和一種高級地感染的愛國的民族意識，我自己決不喜歡輕易地駛向社會主義中去。』

同時，他更懷着一種社會信條，它的目的在於消滅一切國家的界限和國民感情，且它的戰鬥的吶喊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戰爭的血的瘋狂，終於驚醒了和平的宣傳家的呼聲，蕭伯訥到歐戰之後，大胆地叫喊着說：

『如果你重去參戰的話，你第一件事就得把你的赤熱的愛國家射死。』

這一句強有力的『非戰』的警語，是反映着帝國主義的陰謀和黑幕。他不頑揚戰爭，不頑揚愛國運動，不頑揚一切的投機家。他却是爲着世界的和平而呼籲，而鬥爭，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和親切認識的。

第十七章 思想與信仰

本章講述蕭伯訥整個的思想系統：他的社會主義，哲學，宗教和藝術等等的觀念，並略加批判和分析。

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就不會有蕭伯訥，更不會有蕭伯訥式的戲劇。因此，要知道他的戲劇，必須首先知道他的社會思想。

他是忠於他的信念（思想信仰）的，他的社會主義的色彩渲染着他的一切作品。最初，他的社會主義的光芒湧現在費邊社的講壇上。後來在二十年後，他纔把他的全部思想，在那一部題名爲『智識婦女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應有的認識』（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裏面作了一個結論。自然，在這以前，他的社會思想，是本來已經散在他的各項著作中間了的。

簡單地說來，蕭伯訥的社會主義，其目的在於生產機關之社會化，及交換機關的應歸市營，或由政府管轄。把一切的土地和大產業都收歸國有，使人民只成爲國家的雇員，取得任何人都平等的工資。

爲什麼要求工資平等呢？在積極方面，他主張一切有用的工作，都是同等地需要的，因此科學家或哲學家不應比泥水匠取較高的代價。他又主張社會問題只是國家收入分配法之一，繼而他說到分配方面的各種可能的計劃都已陷於不得不作謬事的地步，最後，由於解放，他結論到平等收入才是唯一可以擁護的方法。在消極方面，他認爲沒有平等收入，文明便無法維持；收入不平等，便顛覆了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尤其是在優生學上的社會之平衡，結果也就難免淆亂與毀滅之虞。他否認在個人能力或個人道德與金錢之間，有建立任何方程式的可能。他向着那些贊成金鎊，先令和辨士的不平等原則，以及某人應有若干收入之類的人不斷地挑戰。他說，給教授半個克龍，給工人兩個半先令，同樣是可能的。〔按一個克龍約值五先令，故半個克龍實在就只等於兩個先半令〕而且說，祇有在這

條件之下，他們才能發現一種穩定的社會，才能獲得機會均等的權利，也才能剷除舊的制度所造成的種種罪惡。

這種論調，究竟是什麼一種論調呢？是亨利·喬琪的麼？是馬克思的麼？實在可以說是蕭伯訥的『創見』了。自然，這是他的中間階級的立場應有的一種主張，也是蒙蔽欺騙移動無產階級的目光的一種和平的合法思想罷了。

他的膚淺而浮泛的理論，我們是不能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間去發現。他雖曾迫不及待地讀過『資本論』，以『馬克斯主義』自負，但他不能把握真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實在是令人不能想像的一件事。他說：

『資本論』之研究，使我成了一個在世界上做些事業的人。』

這句話的意思，使人非常捉摸不到。這世界大抵是指資本主義的世界吧，事業怕是指中間階級的事業吧。讀者請不要以為我在挖苦他，或誤解他；我且舉出下面的幾句話來讓他自己批判馬克思吧：

『這[指「資本論」]大約是爲着工人階級寫的，可是工人却尊重資產階級，自己也要做資產者。馬克斯從沒有一刻兒把握住工人。』

同時，在批判馬克斯之際，他也連帶到自己說：

『這是資產階級自身的反叛的兒子們——拉薩爾(Lassalle)、馬克斯、李卜克訥、西摩里斯、興特曼、貝克斯(Bax)，一切像我自己一樣，資產者，與地主政治對抗——就把旗幟染紅了。』

在這裏，所謂『反叛兒子的們』，所謂『旗幟染紅』，只是分明標榜着『與地主政治對抗』，這就是說，他是反封建的一個資產者。

他雖然是把馬克斯和他自己湊在一起，實質上是完全不同的。他雖然說他差不多是英國人中懂得馬克斯主義的唯一的人，他又說他是衷心存念着馬克斯，但是不久他就和他分道揚鑣了。他反轉堅持着耶文斯(Jevons)派的『價值說』去攻擊馬克斯主義者。當他一手編輯『費邊社論叢』(Fabian Essays)的時候，裏面絕不提到馬克

斯的名字到頭來，他終於不得向耶文斯開無情的玩笑，而仍稱馬克思爲莫大的巨人。在這裏，我們已可斷言，蕭伯訥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關於他的意識問題，不妨再舉一個典型的實例如次：

有一次，意大利首相法西斯蒂領袖墨索里尼，說了「自由只是一個腐屍」的一句話，蕭伯訥聽見了，竟對他大加贊美，並且應和着說，使人們受着奴役的，便是他們對於每天有二十四小時的自由之希望心。此種自由的希望心一日不去，便沒有一日不受奴役。他又說，政府僅僅是必要奴役的組織；牠的最初的職責便是督察人民，使任何人都逃避自由之正當享受。自由僅僅開始於一日的工作完了的時候。自由是休閒；自由愈縮到最低限度，政府便愈良好而有力。

關於這種政見，蕭伯訥與墨索里尼簡直是一鼻孔出氣的。他對於強大的獨裁者當局，是非常懲懃有禮的吧。在他的心目中，以爲不論是怎樣的性質，凡是統治者，都是獨裁者。他因而認爲英國國會計劃，在使一方面此黨做事，另方面彼黨就做阻止這事的事，簡

直是『不做事，只清談』的遁辭，這樣法西斯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便不得不『所向無敵』了。他又認為成人選舉權是破壞責任的，因為人人做事便是無人做事。民主問題，便只是怎樣把全權交給統治者，除了統治者不做事時有權罷免他們以外。他又昭告着說，社會主義政府是要有權的，高級地中央化的，而且是高過一切的。它能夠把我們弄好。

蕭伯訥論法律的要點，大抵是這樣的：在法律出於寄生者之手，而且爲着寄生者而訂定的今日之下，寄生制度是有特權的。這發生於資本主義的道德觀念之下，它把勞動視爲一種卑賤的必然，視爲人生中的敗蹟，所謂成功，當然只指那些有自由可以避免工作義務的一種人物。這也就是說，如果九個人都勤於工作時，那麼他們就能供給十分之一的人去過他的闊綽生活，如果他們維持於更悲苦的生活時，那麼，這第十個人當更加富足。一切的奴隸制度都建築在這樣的相互關係上面，在上的第十個人生活的維持，全

從在下的九個人那裏榨取得來的。

他承認着平等收入，却也否認着罷工的法權。他慇懃工黨，應勒令一切身體健全的公民，無論工資多少，一律從事勞働。

他有時悲憫着窮漢和貧民，有時却也厭棄着他們像敝屣一樣。他說：

『我不介意於私有財產，因為它只能令人難於成功而已；我却憤恨貧窮，因為它會令人無望於成功。』這還是對於貧窮本身的恨惡。

矛盾的，他甚至於說：

『貧窮腐壞了所有的都市，傳播了可怕的疾病，只要誰去見到，聽到，嗅到時，誰的靈魂就會被它殺死。說貧窮是罪，已無疑問的了。倫敦之大，真正的常犯罪的人倒也不過五十左右，而營養不足而且衣衫襏襠的骯髒的窮人，却不知有幾百萬人；他們陷害了我們的肉體和精神，破壞了社會的福利。』

關於哲學和宗教方面，雖與他的文學有極大的關係，但究有許多幻影似的解釋，我們用不着作詳細的介紹。不過據他自己說，他有七個『大名』，其中的兩個便是哲學家和神學家——尤其是哲學家乃是他的最初的一個大名，而神學家又是他的最後的一個。這定有什麼奧妙吧？

他把哲學和科學，宗教和藝術，常連在一起。有一個時期，在他的傑作『人與超人』裏，他描寫自己為一個『藝術家的哲學家』(artist-philosopher)。在另一個時期裏，在他的『麥安賽拉』的序文之後，他又描寫自己為一個『藝術家的生物學家』(artist-biologist)。還有一次，在飲祝愛因斯坦(Einstein)健康的席上，他說到詩人與藝術家往往站在科學化驗工人之前並稱頌愛因斯坦為『藝術家的數學家』(artist-mathematician)，原因是愛因斯坦善奏四絃提琴。

什麼叫做『藝術家的哲學家』之類呢？綜合起來，他的哲學，就是忘却私人的小目

的，而追求宇宙的大目的。在他的宗教觀上，他又認為他的神是生命力 (Life-Force) 因爲宇宙的本體便是生命力。人類現正在運用盲目的，突進的，不可抗，不休止的『生命力』，像過去和現在創造了人類一樣，將來還會創造比人類更新更高的存在出來，這就是蕭伯訥最後理想中的『超人』。

這個錯綜參雜的思想，一般的批評家都說，主要的是從『權力意志說』(Will of Power) 的創始者叔本華，『超人說』的創始者尼采，和『創化論』Creative Evolution 的創始者柏格森 (Bergson) 和白特勒 (Butler) 以及斯特林堡 (Strindberg)，摩里斯，托爾斯泰，易卜生，瓦格訥，以及馬克斯等各派中間汲取原料後，由這位『藝術家的哲學家』自行釀造出來的。但是他自己並不承認，却說他的『一切老祖宗都可在英文學史上發現的。』

然而從他的文學上和劇場上的焰火中的的確確地射出了『超人說』和『創化論』的點點飄渺的火星！

可惜的，他的祖宗是否爲英國人倒不要緊，而是他的『超人』不能實現，恐終只在蕭伯訥的幻想中吧。他自己也感覺到他是失敗了。你看他的悲哀的自我批判：

『我不會發生什麼真實的影響，因爲我從來沒有殺過人，而且也不想殺人。然而到我死了升天的時候，我將感覺到充分的理智的尊榮，向上帝說：「老人，丟了這些人吧。你人類的試驗是失敗了。作爲政治動物的「人類」，差不多是不可能解決那些因人口增多而產生的問題了。把他們抹殺了吧，同時再造好一些的東西吧。』

第十八章 作風與技巧

本章講蕭伯訥的信念與作風，生活與藝術，編劇，演劇方面的技巧，及其成功祕訣。

蕭伯訥的信念，便是他的作風。在他看來，著作上的全部藝術，祇靠着著作者的主張。同時那種作風力量的性質和程度，又全靠著作者的信念之堅強如何而決定。總之，蕭伯訥除了信念之外，就別無作風可言。

『一切的藝術，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都是宣傳。』蕭伯訥在他的作品中，尤其在他

的戲劇中，他以思想家似的清明的頭腦，宗教家似的熱烈的心情，和批評家似的辛辣的機智，宣傳他的一切信念。

他的作品，無論是創作的，或批評的，都含有宣傳家的氣息。與其說它是藝術作品，倒

不如說它是生活作品。他的辯才，他的幽默，他的一切，都使他自信是一個工作者，而不僅是一個藝術家。因此，他曾說：

『我是千種藝術的批評家，半打藝術的熟手。』

在幼年時代，他也會反對以死讀書來代替活經驗。

從早年時代，熱中於社會主義的工作的時代起，他就以他的大部分的時間，分配在社會活動方面，而把文藝作為他的副業或餘技。他反對以文學生活佔領整個生活。他說：

『我從來不曾過度過文學的生活，或參加過任何文學團體；我雖曾不屑以全力從事美術批評的工作，但是我從來不曾周旋於他們的環境中。除了寫評論或觀劇的時間外，我的時間完全用在公衆工作上，在這種工作中，結交了幾個有特殊才具的人。』

為什麼呢？實在的，他喜歡在實際生活中發現藝術，而不喜歡在藝術中發現實際生活。在他看來，所謂藝術，只有生活的藝術，只有為人生的藝術，只有為人道的藝術。興趣所在，他甯願不寫文學的東西，却不肯放棄生活和工作。換句話說，在他當年作為批評家的

時代，他的醉翁之意不在紙上的藝術批評，而在於口頭的講壇生活。

很明顯的，作為一個『爲人生的藝術』論者的蕭伯納，是與『爲藝術的藝術』勢不相立的。他曾說：

『要是僅僅爲藝術的話，即使寫一言半語的一種努力，我也不肯的。』

他對於戲劇的意見，也不外於他對於藝術的整個意見，因爲戲劇只是他的整個工作的一個分野。

他的較有系統的見解，在『易卜生主義的真髓』(Quintessence of Ibsenism)和『演劇管見』裏面，富有反對傳統思想的一種新鮮的鬥爭理論。這裏爲材料的限制，只能從他的演劇和作劇的技巧上，略說幾句。

關於戲劇，他是一個天才論者。這一點，是人們所不能同意的。

在蕭伯納看來，如果一個人沒有得着他的天性方面的稟賦，總不能訓練爲一個劇

作家或戲劇家的，而且天性要佔百分之九十九，分別的僅佔一分罷了。他還有這樣的一句話，也可引來作一佐證：

『如今，我知道了許多的舞台技巧，知道了在我當初寫我的第一篇劇本的時候所不會懂得的舞台技巧，然而我的第一篇劇本，却也和我的末篇的劇本同樣有效地抓住了觀眾。』

他說明戲劇家——包括作劇者，演劇者，和導演者——的職分如下：

『一個戲劇家的職分，便是應該使讀者忘掉舞台，同時應該使演員忘掉觀眾，在每一幕，都不要使他們聯想到它們。』

他的關於演員的技巧問題，曾經用一篇二千字的小論文說述過。題名爲『預演的藝術』(The Art of Rehearsal)，這本來是寄給他的老同學麥克訥爾蒂的一封信，後來才公開發表的。

他不主張演員一天到晚的演劇，更不贊成演員演到夜深後三點鐘的那樣的苦工，

而且認為如果有一種工廠法來限止演員以每天三小時工作為度，戲劇的上演必較現在的情形要好得多。

他主張印刷出來的劇本，不僅必須是可閱讀，而且必須是可上演的，使演員馬上在舞台上如法泡製。然而在預演時，當他自己直接導演的時候，却並不是沒有例外的。演員中有人對他說：『可是，蕭先生，那書上是說——』他的答覆，每說：『哦，糟糕的書本子！它是要把人弄糟的。』

在他的早年的戲劇工作中，蕭伯訥就發現了一種編劇的公式。每逢有劇作家詢問他作劇的初步方法的時候，他總是告訴他們以這個公式。『這便是戲劇境遇的觀念。如果在作劇者的想像中，把這境遇化為一樁精美的，獨創的觀念時，雖在實際上它祇是像山一樣古老，也是好的。』

有了這一結構，他說，學習作劇的人，只要他有對於他的工作的任何巧妙，便可以保

證其成功。

他又相信喜劇的製作，難於悲劇的製作，原因是喜劇需要一些幽默的意味；不過兩者之間，在創作過程中，同樣地有賴於「葛藤」的產生。關於這點，也可以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把葛藤產生了後，你就得把它的「頂點」放在最後一幕的末段，只要一個頂點，這也就是戲劇的產生開始的一點。其次，你還得經心地解釋這種葛藤是怎樣造成的，這種解釋，大部分由僕人、律師、及其他低級身分者指示給觀眾，主要人物當然都是些公爵、陸軍上校和富翁，在解釋之後，你也得使你把人物方面的必要的介紹在第一幕中提出。你的最後一幕當然要包括着葛藤的解決，而且要盡你至善的努力，在大體上一直送觀衆出劇院。』

但以通常的情形來看的時候，他並不是像他所說的話死做的。他告訴我們說：

『我逃避結構，正像逃避瘟疫一樣。我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勸告一些青年作劇者，說

一種結構，無非是像把東西鋸成曲線形的一種鋸子一樣，徒然地束縛了作者，而且大大地遲鈍了讀者和觀眾。

這意思是說，作劇先要逃避結構，作劇之前不可受結構之迷惑和束縛。因為結構這種謎也似的東西，對於作者和觀眾，徒然令人苦思，是不值得的。

因此，在他的劇本裏面，我們不易見到機械的結構，或熟知的結構。

劇本中的『舞台指示』(stage direction) 是在說白和動作以外的一種字幕，有人認為蕭伯訥是徒勞的多事，可是蕭伯訥說：

『我曾經注意到那些作劇者，他們全無演劇藝術上的實際經驗——正像我把作劇為職業一樣地全無經驗一樣——他們喜歡指出我的舞台指示純然只是文學的閃爍，却全然不是什麼舞台指示。這純然是他們的愚見。試問一個演員，他在純粹的技術指示——這是各劇相同而用不着寫出的——以上或以外，到底真需要些什麼，對於他祇有實際經驗才能教育，此外就不能有什麼了。一篇舞台指示，不必對演員說出「怎樣」表

演；它應該告訴他所表現的是「什麼」。那裏祇需要表現一個效力；然而或許正可以有十五種不同的表現方法。」

作為一個戲劇家，蕭伯納的成功，有些地方是順應着社會心理的。哈麗士曾經指出他的成功祕訣，約如下述：

首先，是由於浪漫題材的利用。蕭伯納最初的三個劇本，是以倫敦的和當代的背景爲限，都沒有獲得怎樣的勝利。他的初期的成功，却全靠遠方的自然背景和古老的時代背景。試看，《武器與人》寫的是巴爾幹，《英雄與美人》寫的是二千年前的故事，《魔鬼的信徒》寫的是《美國革命》，勃拉斯蓬的轉變寫的是浪漫諦克的摩洛哥，甚至他《回到麥妥賽拉》，回到亞當與夏娃——這些歷史資料和浪漫題材，至少對於英國紳士社會，是與之相應的一種文學和趣味。固然，這是通過他的新異的思想而閃耀起來了的。這些死灰之所以能成爲活火，是因爲自己的精神灌注在歷史的人物身上的緣故。他

曾在『健全藝術』(Sanity Art) 中說過：

『我是一個新聞記者，而且以此自誇。我要拋棄一切非新聞記者的作品，因為那種作品根本沒有存在的或流傳的可能。我固然是講述到各個時代，其實是我對任何時代——除現代外——都沒有下過認真的研究。況且作為戲劇者的我，對於任何歷史背景中的人物——如果那個人不是我的一部分——也都並沒有什麼共鳴。……』總之，他認為『人在他自己的時代，寫出他自己來，就已經寫出各時代的人。』

其次，是由於他放下了當前的社會學的問題而委身在其他的時代與風土。因為他在本性上不是一個旅行家，而且他的早年的貧困使他一向不曾出門跋涉過，也就使他的旅行一下子便出了名。從杜白林到倫敦，可以說是他的旅行生活的紀元，而且是他自動的唯一行程。後來，魏白曾把他帶到比利時和荷蘭，這算是他的最初的海外旅行。也曾為了擔任批評家的職務，到過培留斯(Bayreuth)和巴黎。也曾隨着藝術勞動者會(Art Workers' Guild)的朋友們所組織的旅行團到過意大利。等到他娶了他的遊牧式的

妻子後，也曾趁她家事之暇，常過些『有女同車』的閒遊生活，遊踪偏及大陸和法屬北非洲，西至西印度牙買加島（Jamaica），南至馬得拉羣島（Madeira），東至莫斯科和法國斯坦部爾（Stamboul），北至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這些遊程，使他的劇本多少增添了些真切的氣氛。

還有一層，是由於他善於把伶人們所認為不可能的甚至劇本上的那種誘惑的部分分配着各女伶的本身，他在寫給亞倫特萊的信中說：『我是一個製女服的優等裁縫。』正是一個忠實的自白。他這種裁縫本領，比他那幽默的味兒，諷刺的口氣，以及熱辯的語勢還有力些吧。這樣，他就設法拉攏着茂萊（A. Murray），洛爾克（K. Rorke），麥卡賽（L. Mc Carthy），亞倫特萊，康普培爾，桑狄克（S. Thorndike），白洛夫（F. Brough），喬琪（G. George），伊里奧特，金斯頓，萊尼漢（W. Lenihan），尼爾生特萊（P. Neilson-Terry），福培斯羅伯生，曼斯菲爾特，達萊（A. Daly），卡爾凡特（L. Calvert），屈里，羅蘭（R. Loraine），哈特維克（C. Eardwicke），差不多一切的男女伶人都列入他的人物。

表上，擔任表演他的劇本中的角色。

本章開端的幾句話，可以移來作個結語：

蕭伯訥的作風，便是蕭伯訥的信念；除了信念以外，就別無作風可言。

第十九章 金 錢

本章講蕭伯訥的二百萬財產問題，和他對於金錢的認識及其對於慈善事業與諾貝爾獎金的態度。

一個人的生活，如果是可以據俗流的意見拿金錢來作衡量的尺度時，那麼，蕭伯訥的確算得是達到了最高度的成功了。財富像源遠流長的江水一樣湧到他的身邊來，因此，他是奇蹟中的一個奇蹟，他是不僅有鉅款而且存銀行的一個作家。

蕭伯訥已經告訴過我們，當他最初到倫敦的九年之間，靠他的筆桿兒賺來的錢，只有五鎊，九先令，六辨士。後來，當他充任報紙批評家的第一年，年薪也只一百十二鎊，就是他在哈麗士所辦的『星期六評論』上擔任『報紙小說家』(Feuilletonist)的工作時期中，也只每年三百十二鎊的酬報而已。然而在當時，這種稿費已經算是出版界的較

高的價格了。

直到他的劇本『惡魔的信徒』在美國上演後，他的進益便上了千數，於是又有錢存銀行了，再也不愁沒有隔宿之糧了。

此後，他娶了妻，她原也是有些獨立的進益的，不須用他的錢來度日，因之財富日積月累，頓成小康。至於最近的二十年來，他是可以列入富有的作家之羣了。

他膝下並無子息，他們夫婦兩人生活頗富裕。如果拿他的同時代的英國的大著作家來和他相比，蕭的財產似乎是多得多了。譬如說，舉羅蘭斯 (D. H. Lawrence) 和班尼德 (A. Bennett) 為例罷。前者所餘的款子，僅一千鎊，後者亦不過四萬之譜。

蕭伯訥也並不諱言他的富有。他曾在一千九百二十三年說到他的財富的總額如下：

『我是一個有二百萬以上的富豪。在維也納，我的銀行差額（自大戰以來我從不曾支過分文）是3009000 克羅尼 (krone) [奧國銀幣名]。在柏林，我有許多馬克，計所

所付所得稅是 240 馬克。在今日，其匯兌價值是 10000！在莫斯科，我有二百萬盧布，暫時還未能以匯票和掛號信寄給我。在倫敦，我的戲劇，夢想不到的對於戰前的特殊作品支了錢，甚至很非凡的，對於普通作品，也支了錢；但是劇場的開支却加了一倍，竟使我除了在倫敦的戲目公司弄錢以外，根本無法籌款。結果是自從大戰以來，每個正月一日和七月一日，這兩天付稅的日期，緊縮得無以復加，藉免出賣。我曾經有不止一次，仍藉助於赫斯特報上的投稿工作，總之，我總算是幸運者之一；我是個人地安安舒舒的，有二輛汽車；可是我連一個辨士都節省不出。』

這裏他是指出了他『連一個辨士都節省不出』的原因。其實，這就是等於說，他是不願意惠施於人，即使有一個辨士。

同時，在他給一個正在向他要求做些慈善事業的通信者的覆書裏，他的態度與方法，更其顯而易見了。請看吧：

『「盡力設法把你所能節省得出的每個辨士，都施捨給那些最有急需的窮人罷。』

你如果肯慨然解囊，就請送錢到倫敦西南郵區第一局，達摩斯街十一號費邊社的會計處，你可以信賴，這是應其需要，而且是用得不落空的。如果你喜歡親自去救濟窮人，那麼我也可以開列出幾戶窮人的姓名和地址，無論你的財源多到如何地步，他們也能把你一切零餘的錢吸收得盡的。』

因此，他不得不結論到人們在社會上最可嫌厭的是貧窮，最應攻擊的也是貧窮。然而要救濟貧窮，在整個不合理的社會條件之下，即使與以救濟，也不是根本辦法，因為這樣一來，窮人會把富人的一切零餘的錢都吸收得盡，使一個向所認為富人的人終於也一貧如洗，這豈不是徒然地在社會上增加了一個窮人嗎？試看他怎樣地說明這回事吧：

『爲了他們「窮人」，你會使你也成爲窮人，你也將滿意於在這存在着貧窮的大衆之中，增加一份貧窮的住戶，而在這現存的社會制度之下永續不斷的救贖，還得用你的全力來捐輸……死屍所在之地，即鷹隼所聚之地。你固然不是一個盜賊，你却只是一個該死的笨賊。一個月後，經驗一定會來醫治你了。』

這位通信員，不懂得他反對救濟窮人的高深的理論，於是憤憤地又給蕭伯訥來了一封信說：『某甲有錢，某乙無錢。如果某甲不救濟某乙，那麼，我便稱他是一個賊骨頭。』

蕭伯訥對於這種見解，又給它寫了一封信告訴他說：

『真的，你是一個笨驃子；不等到你自己醫好那種病，什麼都不能救治你。』

『「某甲有錢，某乙無錢。如果某甲不救濟某乙，那麼，我便稱他是一個賊骨頭。」這正是一個笨驃子所做的事。請問你，如果某乙接受了某甲的施捨，你又稱某乙是什麼呢？我堅強地勸你還是去做一個捐客商人罷。你以為做好事便是施捨錢；而你就以為你是有一「樂善公」(Lord Bountiful) 的性格，而且兼具聖芳濟上人(St. Francis)的情調。真的，你是一個無法可想的笨驃子。沒有關係，你儘管擁抱你的運命，儘管做一個慈善家罷。這種生活，對於一些本來是那樣生相的人，總不是壞的生活。』

他反對人家要他資助慈善事業，可以再從下面的一封信的語氣中去體會。他說：

『在事實上，照我目前的錢的去路看來，我不是一個富家翁。我的職業上的進款，無

論在美國或英國，都被他們抽稅，而且抽附加稅。譬如說，當我時時賺來了二萬鎊的時候，一經投資，而且從本利雙方面抽了稅和附加稅，還贖得些什麼呢？在我妻子的不動產和我的財產之間，我們是屬於每年五千至一萬鎊的一份子，同時不把它全部化光。我是忙得來不及享受金錢之樂：我的所有，多於我之所需，同時我也是全無所有；在幸福上的相差，是無足介意的。我是這一類的人——金錢對於我的唯一意義，就是安全和免除苛政的暴斂罷了。如果說，社會只要能供給我這兩樣：安全和免除苛徵，我就當把我的金錢摔出窗外去，因為金錢的經營是一件令人心煩的事情，而且是擅於誘起寄生和恨惡之心。我對於樂善好施眷顧等等的事，一律咒詛。我再三地說，當我必須在經濟上救濟窮人的時候，我是極端地恨他們的，正像他們極端地恨我一樣。』

有一次，蕭伯納曾接到他友人哈麗士的一封信，信中說有某甲，在某一個星期日，急需五百鎊，否則即遭到死亡。

他的覆信，有幾句話是這樣的：

『可憐的窮人，正和哭泣的孩子一樣，他們傾吐着一切，拚命地抗議於他們的處境之殘暴，而我們這些『僅以身免』的人，不得不硬着我們的心腸，讓他們死亡就死亡罷，因為即使盡我們的一切所有，在他們的需要方面看來，無異於滄海中之一粟而已……我固然可以開一張五百鎊的支票；然而這裏，我的表兄弟的女孩子，也有一封信寄來說是貧苦不堪；這裏還有一封信，是從一個愛爾蘭紳士那裏寄來的，他和我的交誼，遠在七十年代便已開始，他現在要我設法賣一賣他的畫件。這裏還有一位名叫南生（Nansen）的人，他只有五塊麵包和兩條魚，但是想要藉此養活許多人。我的旅館【指京城旅館，因蕭氏寫此信時，是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於松茂賽特（Somerset）的該旅館內】費，每天約四個基阿那，尚浮在英國海峽的泥沙上面呢。我唯一的機會，祇得不施分文。於是某甲要死了，表兄弟的女孩兒也得死，我的那位老朋友紳士，也得吃他自己的畫件來充饑；當我飽食過度，悲於他人的可憐狀態的時候，衆人就非死不可吧。』

蕭氏反慈善事業的立場，在下述的一封給瑪利奧德（A. J. Marriot）的信中最

顯明而且徹底地說着：

『親愛的瑪利奧德：

這位薛某是一個大闊老，是某公爵的兒子兼嗣子，娶了一個某伯爵的女兒爲妻。他是一個強有力的男子。在廿年前他還是一個大游泳家和大駛船家，現在則更是各種公司和公共團體的企業者。可是最主要的一點而你須記牢的，就是說他乃是倫敦醫院，普伯拉偶發病院，和蒂爾白萊草舍醫院，這三大醫院的主席董事。你想想看，這究竟包含着一些什麼意義。在埠頭工人忙碌期內，偶發的不測之病常在每二十分鐘左右之間發生，於是送到倫敦醫院中去求治，而且無疑的，在普伯拉醫院也有同樣的事。每個患者不測之病的工人，應該獲得公司方面的相當待遇。如果這樣說來，輪埠公司更應該加意預防，使他們避免這類不測之病。可是他們呢，只顧送到醫院裏去，而這些醫院却全靠衆人的捐款來維持，他們簡直是當真利用了那些捐款，來付他們自己的手術費。因此，凡是捐錢

給這些醫院的人，無非是捐錢去增加輪埠公司的紅利罷了。現在，你或許要問我，為什麼這位薛某是一個不辭勞苦的醫院捐款的經手人？——為什麼他給泰晤士報上寫作此等動人憐憫的文章？——以及為什麼他只做三個河濱的醫院的而不做其他醫院的主席董事吧？這解釋是很簡單的。因為他是倫敦輪埠公司和印度輪埠公司的代理主席。

他曾經有一次，給我寫來了一封私函，告訴我說他注意到我不會捐錢給醫院，又說這種捐輸是我的義務。於是寄去了我的覆信，說明了這種情形，正像我現在前面給你的解釋一樣。他對於那封信，取了最大可能的高興的態度；兩人間的通信終於在一種很友誼的情形之中結束了。

如果他說你們是歇斯底利亞的白癡，那麼，我想你很可以回答他說，無論如何，他自己是一點都不是歇斯底利亞的，不是白癡的，而且很可以說，他是倫敦善於經商的能手，因為再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那樣爲了他的輪埠公司的利益，獲得那麼多的錢，即使一半的數目也不是旁人所能辦得到的。不要表示對它的憤慨罷。不要發你的脾氣罷，恭維

他的巧妙手段罷，然後你請他飽吃一頓老拳罷。

『你的忠實的，蕭伯訥』

蕭伯訥的聲譽，也像稿費或版稅匯流在他的身邊一樣，從世界的四隅，擁集在他的肩頭了。蕭伯訥之獲得諾貝爾獎，自然是名聞文壇的事，但是他拒絕接受獎金的事，却更把他的名聲傳遍了全世界。當瑞典學院 (Swedish Academy) 決定把一九二五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金贈他的時候，他覺得他的聲譽是決不止值八千鎊的，他當然不會接受，正如他不會把八千鎊施捨人家一樣。

當時蕭伯訥就很奇怪，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提議獎給他，於是 he 說：

『這一定是獎勵我這時期沒有寫任何東西。』

關於他諷刺並批評諾貝爾獎金事，還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諾貝爾的生意經，是一種闖籬，公開給一切成就了最低限度的名望的人。』

他終於把那筆獎金掃數轉贈給瑞典的許多窮苦的著作家了。這對於諾貝爾獎金機關，不啻是一番無言的訓斥！

第二十章 幽默

本章論幽默的意義，並從蕭伯訥的時代生活、民族風土、哲學思想、血統遺傳、文藝素養諸方面講述他怎樣地成為幽默家。

幽默，可以認為蕭伯訥作風上的一個顯著的特色之一。蕭伯訥的幽默，是他所以成名的一個最大的因子。沒有幽默，便沒有蕭伯訥，這句話也不能算是太過分吧？

所謂幽默，是什麼一回事呢？這是我們先要明白的。

幽默，在英國叫做 *humour*，在法國叫做 *humour*，是一個不容易譯而且也不容易解釋的新名詞。把幽默譯為滑稽的也有，譯為諧謔的也有，譯為玩笑的也有。其他如譯作輕飄奇僻的，似乎也有。其實呢，譯得都不很精確，譬如說罷：滑稽不如幽默那樣高級；諧謔不如幽默那樣廣義；玩笑則更不如幽默那樣的淳厚，所以都不能用來表現出幽默的真

意義。

最好的譯法和解釋法，還是讓幽默仍爲幽默罷。

對於幽默，有人以爲是可重視的，也有人以爲是可以輕蔑的。有人是生性愛好幽默的，有人是根本缺乏幽默的。同時又有人是理解幽默的，有人是完全不知幽默爲何物的。但是無論如何，一味地輕蔑幽默是無理由的，而且在人生中不懂幽默也是怪可憐的。

最近，同一個朋友閒談，偶然談及『蕭伯訥真幽默，可是魯迅更幽默』的一番議論，那朋友便說不見得罷。我就舉一個例告訴他關於蕭伯訥和魯迅在孫夫人宅內會見時的一段談話，尤其是引了這兩句對話：

——蕭氏，他們稱你爲中國的高爾基，但是你比高爾基漂亮！

——魯迅：我更老時，將來還會更漂亮！

至此，那朋友突然笑了，便沉思地說：『魯迅的答覆真是有意思的笑話。』

啊啊，『有意思的笑容』就是幽默兩字的另一解說了；同樣的，因爲蕭伯訥的那句

話是沒有多大意思，也就只好說是玩笑或諧謔罷了。本來，我們知道魯迅和蕭伯訥一樣，都是懂得幽默，愛好幽默的，所以他們的說話，往往會引起懂得幽默和人生的人發笑。

有人自以爲並不是不懂得幽默，却說幽默家如蕭伯訥其人者，是人間的一個玩世者，因爲他只知幽默而不知人生。人生在他們看來，是應該嚴肅，認真得連說笑話的餘裕都沒有。這種見解，似乎是而實在不是的。我們要知道幽默和一切的文學一樣，是有階級的意義的，我們祇能說立場的錯誤，不能遽以爲幽默的錯誤。德國的馬克思、恩格斯；等等大思想家，是革命的；然而在他們的嚴肅和認真之中，也把幽默發放出來的，尤其是恩格斯。蕭伯訥說：『他的筆比馬克思的輕妙，有些地方好像是一個幽默家。』蘇聯的列甯和斯達林等是實行家，革命家，然而他們也不否認幽默的效力。記得當各帝國主義的報紙繼續不斷地造些說他已經死掉等謠言的時候，斯達林曾很幽默地說：『我抱歉我還沒有死，而且我更抱歉我還要繼續使他們失望。』像這樣幽默的辯白，豈不是斯達林在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讒謠的有力的答覆嗎？

蕭伯訥是懂得人生，懂得幽默的，他不願故意裝作僞君子，不甘流於強者之羣，於是暴露了社會的黑暗，勇敢地宣判了時代的罪惡。

一種幽默的意味，對於像蕭伯訥這樣的一個諷刺家，顯然是很值得重視的。聽過蕭伯訥的演說的人，便可以信服。他以一個偶像破壞者的身分，常發表他的一種特有的幽默的莊嚴。在講壇上，他是持有一本正經的嚴肅。他愛用一些類乎放肆的話（至少在紳士階級的心目中是這樣），但是聽衆能夠接受而信服。就是讀他的文章，也復如此，使你不能不敬慕他的精敏的內心，和他投射在虛偽和空幻上面的諷刺的鋒鎚。

對於蕭伯訥的幽默，有許多人是不同意的。或則說他的幽默只是滑稽；或則說他的喜劇不會含有悲劇的意味。

他的友人兼敵人喬琪·摩亞（George Moore）甚至輕視蕭伯訥為『饋堂裏的滑稽家』，亨訥格（Huneker）說蕭伯訥只是『帶着老處女的氣質似的一個沒有翅膀的安琪兒』。德卡賽爾（De Cassires）把他分析為『伏爾泰的碳素紙下的第五份，因

爲他的幽默不是悲劇的，決不能成爲偉大。』

其實，蕭伯訥的幽默，才是真正幽默，他的喜劇，實質上是悲劇的反面。

如果說幽默不是單純的滑稽，而是有情的滑稽吧。那麼，蕭伯訥正是這樣的一個幽默家。

蕭伯訥的幽默，主要的有兩種成分：一是滑稽；二是同情。

如果說幽默不是冷嘲的笑，而是諷刺的笑吧。那麼，蕭也正是這樣的一個幽默家。

蕭伯訥的幽默，一方面是出於理智，同時也是訴於理智的。

至於他的幽默的態度，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說話來解釋。他說：

『我的方法，你們要注意，就是費最大的心血去找出應該說話的事，然後用最放浪的方式去把它說出來。總之，無論什麼時候，真正的笑話，就是我認真地說的笑話。』

在這裏，我們可以體會到，在他的幽默裏，第一義的態度是『認真』說笑話。唯其如此，他所說的笑話之最基本的方法，第一，在內容上是一些『應說話的事』；第二，在形式

上是『最放浪的』一種。

蕭伯訥是一個笑的人，是一個善於笑人的人，他的笑，是苦痛的笑，悲哀的笑，真實的笑，同情的笑，理智的笑。總之，是無法可想的笑。

成爲幽默家的蕭伯訥，究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這也是值得我們研究一番的一件事。

首先，我們不能不指出他的時代生活的影響。這個世界，尤其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是充滿着矛盾，衝突，舛誤，倒錯。社會上，人生上的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他強烈地感受到了，他銳敏地觀察到了，覺得實在好笑。於是他就以笑代淚，長歌當哭。這『以笑代淚，長歌當哭』似的觀照態度，用多少誇張的方式表現在文章上，便成爲幽默和機智。所以他的幽默，是對於現代生活，表示不能滿意的一種反抗的熱情。他的幽默，機智，諷刺，玩笑，是推動自己，刺激羣衆，使人類進化，社會發展的一種有效的武器。

試看蕭伯訥的幽默的姿態，表現在他的談話及動作方面罷。他能夠連續地談上幾個鐘頭，帶着一陣短促的笑聲很迅疾地打斷他的語句，隨後重新用他那幽微的方言繼續地談下去。他看這個世界，有他獨特的看法。從他的日常的樂趣上推斷起來，這世界可以算是一個比較地有趣得多的地方，但是當他坐下來責罵世界，尤其是世界上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一切舛錯的時候，却從沒有這樣地有趣了。

其次，他的幽默，起因於他的民族性與地方性的，也是很顯著的。在這個觀點上，與其說是幽默，毋甯說是機智（Wit）。幽默的蕭伯訥可以說是幽默的愛爾蘭的一部份。他發揮了愛爾蘭民族的特性。愛爾蘭人，本來非常是放肆，天真，輕快，而且敏感。牠是只顧信念，不問環境的。牠是在和平中帶着一些戰爭，在戰爭中也帶着一些和平的意味。總之，這是愛爾蘭人所流露着的溫情。在這裏，蕭伯訥與他的鄉前輩王爾德是同樣的，所不同的，就是後者是一個改良的個人主義者，前者却是改良的社會主義者而已。

再次，蕭伯訥的哲學是屬於樂觀的思想的一種。他認為由於智力的自覺，可以推進

他的生之意志到積極的道路到光明的道路上去。在途中，無論是不斷的錯誤，不斷的失敗，也終究是應該不斷地創造，或不斷地改進。因此，他的幽默，在一些地方是『天路歷程』的作者彭揚（Bunyan）式的熱情的笑話。

蕭伯訥的幽默，一方面是得之於遺傳的主要的是從他那『兩性中的弱者』的父親的遺傳。據說，他的母親是從不開玩笑的，從不說笑話的。她唱她的歌，也從不屈伏於最溫和的會客室中的談話。他的母親當然是不尊崇他的父親的，他的父親善於說雙關語（pun）而且每逢有反遞進語（anti-climax）的時候，也不忍不說。蕭伯訥說，他的父親是屬於蘭勃的一型，而蘭勃就是個富於幽默情調的人。

最後，他的幽默，是從文學的素養上發展出來的。蕭伯訥在魏華英版（Waverley Edition）的『艱苦時代』（Hard Times）【按這是狄更斯的一部長篇小說，富於幽默的氣息】上面做了一篇序文，很敏慧地想說明一切戲語，是一種偉大的英國文學傳統上面的一部分。因此，他自信是正統派之一。

他又認為一切的文學上的偉大的東西，都是以說笑話的姿態開始的。他佩服狄更斯和馬克·吐溫的文學的才藝，因為他們富於社會良心，而且偏於幽默。在這一點，他可以說是這些幽默文學家的繼續。

好像在他的一封信中，曾說：

『你對於狄更斯的無知，簡直是在你的文學教養上的一個可怕的缺憾。在那個流派上，他可以說是在英國沙士比亞以來所會產生的最偉大的人物。請你讀一讀他的作品『小杜立德』(Little Dorrit)，『我們的共同友人』(Our Mutual Friend)與『大期待』(Great Expectations)罷。你讀了，你一定不會再漠視狄更斯的名字了。』

他接着又說：

『狄更斯本是沒有達到成年的，直到羅斯金(Ruskin)和嘉拉衣爾(Carlyle)把他的社會良心深入深處的時候，他纔以他的『艱苦時代』一書劃出了一個大時代的開始。此書出現的時候，就是成為偉大的時候。』

因此，他也會告訴我們說：

『我的思想，是祖述英國人的，只是本來是別人無足驚異的一切，到了我的手裏，也就使人們震驚起來罷了。』

蕭伯訥的幽默是怎麼一回事呢？不妨舉幾個例來看看。

在他全部成年期內，英國存在着舞台監察官職。在蕭伯訥看來，這種制度是很可笑的。原來，那些監察官，在本質上，只知道盡其力之所能，把他們認為罪惡所在的東西努力與以禁止。但是其實呢，他們是保護了罪惡。

因此，蕭伯訥定然要這樣地說他的笑話了：

『他們不禁止那些真正誨淫的戲劇。他們却正在禁止那些力求剷除誨淫的戲劇罷了。』

有時，他把自己的個人的事，極露骨，極誇張地表現，可以舉出像下面這樣的一個軼

事來：

在蕭伯訥的朋友中，有人說他好吹法螺，大放厥詞，有些人因此而問他，為什麼他的名字，常在新聞報上大出風頭，他就會這樣地反問道：

『那麼，為什麼太陽在天空上面永遠惹人注目呢？』

這句話不是屬於一種幽默味的嗎？

實在的，蕭伯訥的幽默，便是蕭伯訥的真實。在幽默中，我們可以看出真正的蕭伯訥。試舉一例：

他的朋友，詩人，裝飾家摩里斯突然逝世的時候，他預備為他做一篇文章，論摩里斯這個社會主義者，散文作家兼演說家。同時，另一友人西門斯（Arthur Symons）正在準備寫一篇文章，論摩里斯的詩，同志克甯漢格拉漢（Cunninghame-Graham）也正在準備寫一篇文章，記述摩里斯的殯儀。不消說，這三篇紀念文章是很有意思的。後來，三個人都把稿子交給『星期六雜誌』編輯了。西門斯的一篇，和蕭伯訥的一篇，都寫得很出色。

其中克甯漢格拉漢的一篇，是一篇短短的傑作，又緊張，又熱烈，有如實的描寫，有深刻的詩情。蕭伯訥也承認那是一篇可驚可喜的故事。

其時『星期六雜誌』的主筆便讚美着說：

『好一個天才的愛美者！可惜他不再仗他的筆來過度他的生活了。』

蕭伯訥却幽默地喊着說：

『好一件我們的差使！他如果常照那樣寫下去，他一定會和我們一起掃地板呢。』最嚴肅的幽默，最真實的笑話，是他唯一的批評和諷刺的神聖的武器，真好像片語殺人，又好像佛頭着糞，終於使菩薩不靈驗，使偶像不打自倒，說得具體一些，便是使羣衆不相信紳士社會的菩薩和偶像。

這樣，便形成了文學式樣上的一種諷刺文學的一個主要的支流——所謂幽默文學。

蕭伯訥正是善把佛頭着糞的一個幽默家。

第二十一章 偉大的精神

本章先說明蕭伯納自信的偉大，和我們所下的偉大的定義，次說到他的精神四端，最後歸結到他的整個精神所表示的意義。

蕭伯納曾經這樣地自己承認着他的偉大：

『我縱然不能保證我自己是最偉大的現存的「笑話商人」；可是我敢斷然地說我是最好的十大作家之一。』

他也會對同時代戲劇界的他的前輩威廉·亞丘說過：

『我將成為此後三百年內的文學上的巨子（Panjandrum）。』

丟開他的自吹自捧的什麼『十大作家之一』或『文學上的巨子』，不管，如果客觀地說來，他的偉大，與其說是在文學上發展，毋甯說是精神上的偉大。

所謂『偉大』應該劃出界限來。偉大是渺小之對，也與平庸相反。偉人不是常人，而是非常人，他的思想是不同於一般人的思想——尤其是他的行動不同於一般人的行動。但這不是說，有了與衆不同之處，便能使他成為偉大；相反的，這是由於他的偉大，纔有了與衆不同之處，而且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與衆不同之處。這也不是說，站在羣衆頂上，就可算是偉大；他必須是站在羣衆頭陣，站在羣衆裏面，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繫，而成為領導羣衆的一個前衛。

我們這兒的這位『英雄』，是不是這樣呢？我想可以這樣回答：他有時候是這樣的，有時候却不是這樣的。一般地說來，他能成為偉大，同時嚴正地說來，他不一定能成為偉大。

蕭伯訥的精神，比之他的生活和行動方面，是更接近於偉大的一面。而且，蕭伯訥個人的偉大，是只在獲得羣衆的擁護之下，纔能更顯明其偉大。以下所要述及的他的根本精神，將會是永遠的，偉大的精神，——導向人類社會的勝利的前途。

那麼，蕭伯訥的精神是什麼呢？這裏僅列舉其犖犖大者四端。這四端，其實是整個的，是一貫的，並不是對立的，現在的割裂，是沒有多大用意的。

第一，蕭伯訥是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紳士社會的。

他看清了資本主義的矛盾，錯誤，黑暗，卑劣，陰險，欺騙，壓迫，無恥，他看清階級與階級間的關係。總之，表面上的真實，實際上却是虛偽，於是，他毫不留情地替這制度剝去了皮和殼，替維護這制度的各式人等撕下了皇冠和錦袍，讓他們赤裸裸地擺在人們前面。試看一看他剝英國人的皮，是怎樣剝法吧。他在『運命的人』(The Man of Destiny)一劇中，曾用了他那有名的『在原則上』的呼聲，把英國的紳士社會竭力地痛詆了一場。『你對於一般英國人辦事，不過是找出了沒有一件怎樣好，或怎樣壞的事；可是你總不曾找出一個英國人做錯了些什麼事。他辦無論什麼事，總是在原則上的。他打你時候，是根據愛國的原則；他搶你是根據營業的原則；他叫你做奴隸，是根據帝國的原則；他欺侮你是根據勇士的原則；他擁護他的國王，是根據忠君的原則；他斫下他的國王的

頭，是根據共和的原則。他的標語總是責任；然而他居然還是永遠不忘掉當國家把它的責任與它的利益發生衝突時，那國家就要糟糕的。」

不懂得『幽默』的人，一定要以為他的幽默，太浮游其詞，模稜其意，他在放冷箭，說尖刻語，或者是在對英國人謾罵。其實，他確是針對着英國的紳士社會的黑暗面，盡量據實暴露出來罷了。這種真話，戳穿了紳士社會的西洋鏡，這不是我的武斷。試問，如果這裏面所指的英國人，不是屬於紳士社會，那麼，這些『愛國』『忠君』『帝國』『共和』『責任』『利益』等等虛妄的漂亮名詞，如何會說得出口來呢？

第二、蕭伯訥是反對軍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

這裏，他看清國內階級中間的矛盾，同時必然地看清國際各帝國主義中間的矛盾。他知道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為商品市場原料，生產區域，投資區域等問題，必然要引起激劇的經濟的同時是政治的競爭，不可避免的要引起軍備上的競爭。他相信以後各國的軍備只有擴充的危機，決沒有縮減的可能。於是，他用了他的特殊的口氣，告訴

香港新聞記者們說：

『將來如果能只拿十吋口徑的炮彈，代替十六吋口徑的砲彈來屠殺人民，已經好算是大幸了。』

言外之意，實在是耐人尋思的。

軍備擴充的準備，自然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的最尖銳的表現。在這種彼此準備戰爭的時期內，『裁減軍備』『和平會議』等等都是用來作為準備戰爭的一種蒙蔽手段的。蕭伯訥曾經在歐戰的前夜，以為戰爭可以藉和平的談判來緩和，避免戰禍，然而終於爆發出來了。過去的經驗，一定會成為目前的教訓吧。他必然的會更堅決更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反對人類的大屠殺。

第三，蕭伯訥是反對進攻社會主義國家和革命民衆的。

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對峙形勢是一天一天的明顯。帝國主義國家，彼此正在建立聯合戰線，以與社會主義國家作殊死的決戰。這一次的日本侵略中國，向蘇

聯挑釁，顯然是站在反社會主義的前線而也得有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諒解的。在這個鬥爭中，英法等國早已成爲強有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了，這是不容諱言的。尤其是五年計劃可驚的成功，資本主義國家的民衆對統治者的反抗的熱烈，殖民地革命運動的蓬勃，都是使帝國主義不得不向社會主義國家進攻的根據。蕭伯訥却投袂而起，拚命抵抗這個狂流。雖然自己只是個費邊主義者，却大聲疾呼地說，社會主義是怎樣的成功，蘇聯的經濟建設是怎樣地發展，甚至於希望歐美各國都應該有這種現象發生，力說其他各國都應該把來作爲『借鏡』。同時，蕭伯訥在世界反對『左傾』，甚至反對研究革命書籍的今日，居然『宣傳赤化』，鼓吹共產。這種工作的努力，這種說話的勇氣，會如把一片石子，不斷地丟在水上一樣——波浪散發開去，增添起來，直到攪動到整個的大海吧。歷史上，不少這類有勇氣的人，站在暴風雨之下，狂流的中間，堅決抵抗到底的。在歐戰時期，李卜克訥西，盧森堡等人，已爲正義與真理揭竿而起，而今還活着在後來的青年的記憶裏。在目前的法國，巴比塞，顯然便是一例。在這裏，蕭伯訥也可以算是另外一個了。

第四、蕭伯訥是反對壓迫弱小民族和殖民地國家的。

大戰以來，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切生產物，都已沒有市場，但爲了維持其固有的經濟地位打算，它就拼命剝削和劫奪弱小民族和殖民地國家，對於殖民地的民衆，對於民族的獨立問題，其手段都無所不用其極。單聽一聽他對印度記者們說的話，就可以看出他對於英國壓迫印度的激越的憤慨了。他是直裁爽快地這樣說：

『印度不是英國領土中住人頂多的地方嗎？所以現在英國應該讓印度獨立。』
他的意見，就是這樣。

於是，印度總督給了他一個警告：『你還是研究你的文學，不要亂談你的政治罷！』但在蕭伯訥看來，這位總督，只是英國統治者的在印度的代表人物罷了。他相信，文學與政治，是同義的，只有在文學與政治發生聯繫的時候，才有文學的生命。除了政治，文學是根本沒有意義的。所以他還是到處發表談話——尤其是政治的談話。

印度有許多的民族改良主義者，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不惜出賣了民族的利益，於

是採取了投降英帝國主義的政策，宣佈願與英政府開誠合作。按諸事實，印度即使得以自治，也絕對絕不會有自由的。蕭伯訥也知道在英國資本，政權，軍權的種種統治之下，所謂『自治』與印度自身的實際解放上，完全是兩樣不同的東西。因此，他對於民族英雄似的甘地，毫不客氣地像判定一個囚人的死刑一樣批判而且揭開了他的真面目：

『甘地君也是殺了他的同黨，六百萬的印度大眾，這是好的，這樣一來，甘地君也被宣傳得像一個頂顯赫的人物了。』

蕭伯訥的這種精神，不但是睥視了帝國主義的榮光和尊嚴，削弱了紳士社會的精神性威，實在也教育了一切渴求民族解放的青年，領導了人們走向勝利的前途！

西方的一句古話：『一切的路，引向羅馬；』現在是應該下一轉語了：『一切的偉大精神，引向光明的路！』

第二十二章 途 上

本章結論蕭伯訥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對於他的過去，特別指出他的矛盾，舛錯，無系統，與無定見，對於他的前途，特別說明他的偉大的進步和努力。

世界是永遠在轉動着，蕭伯訥怎麼能夠站在那上面不動呢？從他以往的數十年的歷史上，證明他是一向在跟着時間邁進着，而且是正在更進一步的發展下去。

在任何的時代，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的急先鋒，走在潮流的前面，潮流的中間，幹着些所謂『領導羣倫』的工作。蕭伯訥是老了，然而一個真正的思想家，總是有『老當益壯』之感，或是有如魯迅所說『更老會更漂亮』的意義。因為他年紀一大，經驗一多，對於革命的阻礙物，傳統方法的整個的破壞，都會看得更明晰。

全世界都歡迎笑話家，但是現在都不敢歡迎他了，因為他是更明晰地說真正的笑

話了。向來歡迎他像歡迎當日的耶穌上耶路撒冷一樣的人，現在則投之以石了。不久，笑話家的蕭伯訥，將一躍而爲預言家的蕭伯訥了罷。我們不妨拭目以待之。

這裏我們要把蕭伯訥的生活和思想作一回的總檢閱。

以他的哲學而論，那麼在他的思想系統上，他是最複雜紊亂的。作一個哲學家的第一要件，當然是要形成一個思想系統，建立一個思想流派。或者是從柏拉圖到詹姆士，或者是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再或者從黑智爾的唯心辯證法到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其次，當然還要有他的信徒，他的羣衆。但是蕭氏沒有一定的流派，所以也就不能有一定的信徒，其所以有他的羣衆，是完全有時間性的『蕭伯訥熱』(Shaw-fever)。雖說他自己在『少校巴巴拉』序文上面說過他的一切思想的祖先都可以在英文學裏找得出來，但是一經澈讀他的一切作品和談話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的思想是喜劇一般地混雜的，是菜和肉合養出來的羹湯。在他的各式各樣的思想流派中間，主要的是從叔本華、斯特林堡、白特勒、柏格森、摩里斯、尼采、馬克思、托爾斯泰、易卜生和瓦格訥等這樣，作爲一個

哲學家，是純然地不存在的。這是必然的批評。

以他的行動而論，他是失敗多於成功。這是基於他的一貫的思想出發的。自從他在一八八四年參加費邊社以來，他的主要的觀念，主要的工作，是一貫的合法的行動。除了定義，思想的傳播，教育的宣傳，進化，改良以外，便沒有其他了。譬如，他平生對於英國戲場監察權，曾努力要求政府撤廢，但終因過於和平，非但未獲成功，政府反變本加厲。在這一方面，他是不會面向人生，針對事實的，他是閉着眼睛在構造他的社會理論，在虛度他的空想生活。他只知道改良，却不知道革命，只知道進化，不知道突變。換句話說，他根本不曾去瞭解辯證法發展的鐵則。

他的思想和行動，充滿着矛盾的現象，一面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一面却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面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一面却又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不僅這樣，他還扭曲了許多的人和許多的事實。他一方面擁護共產主義的理論，一方面却又反對共產主義的革命方法。他一方面反對資產階級文明，一方面却又擁護資產階級文明。他一方面擁護

戰爭，一方面却又反對戰爭。他一方面擁護進化論，一方面却又反對達爾文。他的一生，只是口頭上的擁護和反對，反對和擁護，因此他繞了一個大圈子，苦於摸不着出路。

他是非常矛盾，無定見的，然而這正是他的本色：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費邊主義者，一個和平主義者，一個進化論者等等。他又是一個『反對』的戰士：他是反資本主義者，反人食人主義者（Anti-cannibalism），反對吸煙，反對喝酒，反皇黨，反民主黨，反活物解剖論者（Anti-vivisectionist），反種痘者（Anti-inoculationist）及其他。尤其矛盾的是他在許多事件上同時堅持着兩種觀念，一方面擁護，一方面反對。他責罵着宗教，却又信仰着宗教。他傾向着強大的軍隊，却又自命爲愛好和平的費邊主義者。他主張工資平等，却又不主張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他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却又不主張對所謂維持秩序的軍警取直接行動。他要說話，却又畏畏縮縮地不敢聲張。像這樣的兩部分，合成了一個人——矛盾的蕭伯訥。

然而他的矛盾，他的舛錯，他的無系統，他的無定見，是無傷於蕭伯訥的偉大性。他雖

然是矛盾那樣深，舛錯那樣多，那樣的定系統而無定見，但是在他的四十多卷的作品裏，七十餘年的生涯中，即使是無系統而無定見，一般地還得認取他的進步——偉大的進步。

『蕭氏遊俄以後，能言人所不敢言，尤足喚起同情。』〔這是摩元培讚美蕭伯訥語〕是的，他不願輕信『黃色報紙』上所捏造的謠言，他不願抹殺他自己所親見了的蘇聯革命的成功，他不願掩飾這一切，却反轉用明快的口調和筆觸，把應該告訴人家的，都告訴了人家。總之，他是希望着整個世界，都像蘇聯那樣的進步。

退一萬步說，他的敢言的態度，也可以說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非常的進步。我們很明白地記得他在少年時代，甚至在他成為少年社會主義者的時代，他是一向羞人答答地不敢說話的。

後來，他在充任新聞記者批評家工作的時代，他自己也曾承認他懷有最溫和的態度，被人家指責為說話不痛快。於是不得不提出唯一的辯護自己的武器，只是說：

『如果人們能知道我所不會說出的話，那就得了。』

就是到了他在做戲劇家的時代，他的社會思想是非常急進的，但是在他的作品裏頭，却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色彩，這說明着不是因為他不能把邏輯的結論寫在文章上，而據他自己說來，原來僅僅是因為『警察不許讓他這樣做』罷了。

有一次，蕭伯訥說：

『可是當我把關於賣淫制度的真相，寫在『華倫夫人的職業』一劇中的時候，那戲劇便遭禁止了。』

也就因此，他老是不敢把許多的真相全部暴露，甚至一半都不敢暴露，也只是因為怕警察來逮捕他，怕監察官來干涉他。自此以後，他總是以『安全第一』為前提，在和平而且合法的範圍內表示他的思想和行動。

現在呢，他終於是把他自己從前所不敢說的，甚至人家所不敢說的，都說了，都說給人們聽了。對於他的這種新的聲音，世界是在傾聽着，羣衆是在憧憬着。

在這裏，雪萊贊揚基茨（Keats）的詩，可為蕭氏頌之了：

『他的運命，他的聲望，
定將是垂諸不朽——

垂諸不朽的一個回響，一片光芒，

直要待到未來敢把過去遺忘的時候。』

自然，蕭伯訥為他的立場所限制，或者不能有如許大的發展希望。盡他一切的所有，他只睜着一雙銳利的眼睛，洞察了這個世界的正在誕生着的新事物，同時窺探到了正在崩潰中的舊的世界。他已經老了，他已經無能為力了，他是不能加強新的勢力，他不能不跟隨着他所詛咒和諷刺着的社會同時沒落。原來，蕭伯訥至多祇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份子，祇是向資產階級說笑的人。他不會殺死什麼，他也不會被殺死。他只會說笑，只會做戲罷了。

既不能與革命者俱進，不能走向新的陣營，又不想投靠什麼，諂媚什麼，這一個蕭伯訥還在希望著什麼呢？

蕭伯訥畢竟是無望於現社會了，但他並不絕望著未來。同時他是有自知之明的，雖說是諾貝爾贈他以文學獎金，英國政治家送他以爵位，但是他却懷着苦痛。

他對新時代的青年常嘆息一聲說：

『我現在是老了……我是一具活屍……也應該死了……至少半死了。』

他對於自己，常是這樣吐露出一種幻滅和憂鬱的氣息。有人問他預備怎樣死，他就爽然地說：

『我願死在星光底下的枯溝裏面。』

哦！『死在枯溝裏面！』哦！『死在星光底下！』確是比一些死在床上，死在屋內，而不見星光的人，正不知要偉大得多少，榮耀得多少！

現在，蕭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尚活在這個正在崩潰的社會上，或許將延長下去，讓他

的銳明的眼光，看到全世界將產生新的理想的社會罷。好了，我的書該停筆在這裏了，否則將永無限制地展開下去。因為一個活着的人的傳記，是不能完竣的。

『人在活着的時候，一切的人都在一條水平線上，在死的時候，崇高的人纔露出頭角來。』

蕭伯訥的這句話，誰也會覺得他是應該這樣地努力完成他自己的。

告中國人民

時事新報特派記者，往見蕭伯訥氏，請其發表對於中國人民之意見，俾印入特刊中，於是此愛爾蘭之戲曲與散文家，在未離香港之前，以簡淨之筆，寫成下列數語：〔原文附後〕

承垂詢對於中國人民之意見，是以現代孔子視我也，予何敢當。

中國人民不能恃他人之意見以爲生，且意見過多，即不成爲新聞，而常爲讀者所厭棄矣。況予此來，正欲反叩中國人民，對余及西方人之意見若何？中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以至將來完成之時，其間經過，足爲研究政治學家之教訓者實多。逆料其成功之日，足以根本療治近世「文明」之病，改善之可也；棄若敝屣，亦可也。余唯有旁觀而坐視其變化耳。予今來自顛倒錯亂之國家，危牆之下，事變正殷，何能對茲古國人民，努力改建之際，妄思有所忠告乎？

歐洲對於亞洲，實不能有任何建議，否則必貽反唇之譏，謂「醫人者當先自醫」也。中國今在危急存亡之秋，予不敢貢獻何種意見，但謂中國人當自救耳。
中國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問世界孰能與之抗衡乎？——蕭伯訥（宋春舫譯）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 am flattered by this request for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for it implies that I am a modern Confucius. I, however, cannot see myself in that magnitude.

The Chinese people cannot live on messages, and too many messages are not news for the press, and usually provide the dullest reading. Besides, I am at present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message China has for me and for the West. Her history since the year 1911, when it is completed, will be the fullest instruction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n she will have achieved a complete cure for that disease called civilization, either by changing it to her own benefit or rejecting it altogether. In the meantime I can only look on and wonder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t is not for me, belonging as I do to a quarter of the globe which is mismanaging its affairs in a ruinous fashion to pretend to advise an ancient people desperately striving to set its house in order.

Europe can give no counsel to Asia except at the risk of the old rebuff "Physician, heal thyself." I am afraid I have likewise nothing to say in the present emergency except "China, help thyself."

With China's people united who could resist her?

第一 Ben Venuto! 歡迎！歡迎！

蕭伯訥來游中國

英國文壇老將蕭伯訥近在環游世界的途中，不久就要到上海。

中國智識界大概還沒忘記這位蕭老先生在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時代曾被熱烈地介紹過罷？一提起易卜生，大概會聯想到蕭伯訥罷？大概就會想到『華倫夫人之職業』一劇中所提出的問題——資本主義文明下所包孕的矛盾，在五四當時曾經引起青年們如何熱烈的注意罷？

蕭老先生的全部著作是批判資本主義文明的。他的風格兼含幽默和冷諷。我們看了『武器與人』中間那個把朱古律糖裝在子彈盒裏的『少爺兵』的行逕，或者一定

要笑的，可是我們在笑中一定也要感到一縷的酸冷罷！在這偉大的劇本裏，蕭老先生暴露了帝國主義代言人對於近代戰爭的一切阿諛粉飾！一切騙人的大謊——什麼爲世界文明而戰，爲公理而戰，蕭老先生輕輕地笑着，就一古腦兒戳穿！

他和新近去世的同在英國劇壇負盛名而且得了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高司華綏是不同的。高司華綏的作品雖然表面上似乎亦是抉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腐敗，可是根底裏他還肯定着現制度並且替現制度辯護的。

自歐戰以來，許多曾以人生戰士自居的歐洲老文豪都開了倒車了；不開倒車而更向光明猛進的，在法有羅曼羅蘭，在英有蕭伯訥。兩位都指斥帝國主義的暴行。在這太平洋上風雲險惡，帝國主義加緊準備瓜分中國和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時，我們對於蕭伯訥來游中國表示歡迎，並且希望他能夠參加不久亦將到中國的世界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所組織的調查團！——（玄申報）

歡迎蕭伯訥

在去年的美國『新羣衆』(New Masses)雜誌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張漫畫，從蘇聯回國後的蕭伯訥，一手扭住了歐美資本家的紅鼻子，一手遙遙的指着在成功行程中的蘇聯五年計劃的建設。當新聞記者們圍住了蕭伯訥問蘇聯有什麼缺點的時候，蕭說：『蘇聯當然還殘留着一些缺點，但是我跑到人家國裏去，不是去找缺點，是找優點去的；如果我要找缺點，在我們這兒，跨出大門，就滿眼都是，何必遠遠的跑到蘇聯去呢！』

是這樣的一位蕭伯訥，現在却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忽然動了壯遊的老興，搭船到遠東來了。據最近的電訊，說在本月的十七號，他就可以到上海了。

歡喜『幽默』的中國人，對於這位幽默大家的到來，當然會有一番熱鬧的歡迎。聽說南京方面，已經由朱家驥羅家倫等領銜打電報去歡迎他了。定然還有不少的幽默家，想戲外國招牌賣道地國貨的，像過去歡迎杜威，歡迎泰戈爾那樣的作一下大廣告。但是

把蕭伯訥硬拉做百家姓上的同宗的這些高等華人，真會懂得蕭伯訥，或是使蕭伯訥懂得一些真正的中國麼？這委實是一個疑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狂熱了歐美一切高等人物的時候，蕭伯訥很不客氣的在那些戰爭英雄的鼻子上，塗上了白粉，敢然地反對強盜分贓的大戰。最近蘇聯向世界學者名流質問下一次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中將抱什麼態度，蕭伯訥回答得很有趣，他說：

『等他們把蘇聯打的時候，我早就被吊起來了。』

這是多嚴肅的一個『幽默』的回答。現在，正是這個大戰迫在眉睫的瞬間，日帝國主義的『英雄』們，正在很勇敢的向中國大眾揭開了大戰的血幕，太平洋的風雲一天緊似一天，不知在今朝還是明天，這個強盜們的分贓大戰，立刻就會爆發。在這時候的蕭伯訥的遠東之游，尤其是在他這次的漫游之前，親口對印度的民衆說：

『英國是應該放棄印度的！』

可見他的確是看見了些什麼，準備被人家『吊起來』的。可是我們歡迎他將使他

看見些怎樣的中國呢？

自然，舊的中國是崩潰得太怕人了，但是新的未來的中國，也在這許多災難當中誕生了。我們希望蕭伯訥能夠健在，再一次扭住帝國主義的大鼻，叫他們看看這新的成長着的孩子！

而且我們敢這樣的相信，蕭伯訥的確是這樣帶着希望的心情來的！

哈囉，伯訥！蕭咱們是這樣歡迎你的！——林一（藝術新聞）

介紹蕭伯訥

蕭伯訥的名字叫作 George Bernard Shaw，簡作 G. B. S. 和司替文孫 R. L. S. 三個頭字一樣的為大家所知道。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生於南愛爾蘭之杜柏林（Dublin）市，一八七六年隨母至倫敦。是一位很漂亮的雜文記者，不守舊例不循規矩的批評家。後為費邊協會會員，成了非正統的社會主義者。先寫小說，最著名的為『開舍爾・貝

倫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及『藝術家間之愛』與『非社會的社會主義者』等。初受美國亨利·喬奇的學說影響，後轉入於馬克斯主義。以戲劇為他的宣傳武器，作成劇本至數十種之多。最著名的有『武器與人』『人及超人』『華倫夫人的職業』『聖傑安』等等。散文集之有名的，為戲劇論集，伊宰生主義，樂聖華格臬等的宣述，以及為有產階級男女說社會主義的著作等等。

平生愛聽音樂，愛看戲劇，愛說死話。連對他自己的父親的批評，都喜歡以死話出之。他說：『我的父親是一個無能的，不成功的人，在主義上他是一位熱烈的禁酒主義者，但在實際上却是常在偷偷喝酒的醉漢。』又最愛和人抬槓子打叉，譬如當一位德國猶太人馬克斯·諾爾道 (Max Nordau) 在擺起新人的面孔，大說近代藝術的墮落的時候，他老就會一反素來的習慣，出來說最守舊的妙語。到了他古稀的誕辰，英國各報，當然都登他的照相，爭呈頌譽，他老人家却忿忿地說：『我早晨起來，一見了這許多報上的我自己的照相，倒以為我是死了。』

在英文裏有一個新字，叫作Shavian，後面加上一個ism或ist上去，就是屬於這的主義及主義者。字典上去翻翻，或者會翻不到，怕要譯作剃頭主義或整容主義者，但其實却是指蕭老的崇拜及模仿者而言，猶左拉之於Zolaism也。關於蕭的評傳之類，英美出得很多，似以Frank Harris和Archibald Henderson的兩本爲最好。

我們對於蕭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國說出我們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來侵後的幽默，與國聯對於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沒有什麼。——達夫（申報）

歡迎蕭伯訥來聽砲聲

蕭伯訥到中國來了。這世界的大諷刺家到中國來了。我們應該怎樣歡迎他呢？

開一個歡迎的宴會罷？讀一篇冠冕堂皇的祝辭罷？再不然，叫盛妝的少女捧送給他一束美麗的鮮花罷？那自有『高等華人』去辦，用不着我們再白費心。

我們應該用民衆的熱情和威力去歡迎他。讓他感受到在蘇聯或者在印度所感受

過的一樣。

在蘇聯，他感受到五年計劃的偉大；在印度，他感受到獨立運動的狂熱；在我們這國度裏，他將感受到些什麼？

我們不能用奪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那時代的那種熱情來歡迎他，真是一件遺憾的事！不然，他也許可以像對印度獨立運動一樣，很爽快地給我們預約一個可喜的前途。

『長期抵抗』的呼聲，『民族主義文學』的運動，怕不見得會合他的脾胃罷。那麼，我們應該用什麼去歡迎這個和平的社會主義者呢？

我想，還是很本色地拿出我們的本地風光來，爲遠方來的珍客，這應該是很奇妙的東西。

瞧，我們這兒有的是流血，恐怖，飢餓，失業，戰禍，水旱災，而最新鮮最重要的，還有日本的大規模的侵略。這是世界大戰的導火線，這是世界革命的前奏曲。

這已經夠了。伴着這前奏曲，現在全國都燃起了烽火，遍地都鳴動了砲聲，這是一幅

偉大的時代畫圖，值得獻給這理想家的。

東北抗日的民衆義軍，華北抗日的士兵和民衆，全國反帝的先鋒，在熱河，在吉林，在南滿沿線，在長江上游，和在中部地方，砲聲都在不斷地震響。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也是西歐所沒有的現象。因之也就不是蕭伯訥所容易看到的現象。

假使，他用他的銳利的頭腦，把這些砲聲分析得清清楚楚，和分析他的戲曲中人物的關係一樣，他也許可以給世界的民衆作一個很好的報告。

這裏又是一個試金石，爲這個老社會主義者。

好！就歡迎蕭伯訥來聽砲聲罷。——鄭伯奇（申報）

迎蕭灰鼻記

蕭是英國戲劇作者蕭伯訥，迎是歡迎，鼻是我
的鼻子。灰是灰。灰鼻者，碰了一鼻子的灰也。

蕭先生是當代的一個重要作家。從他幼年時站在十字街頭當衆演說，直到現在不斷的寫小冊子，寫戲劇，批評攻擊現社會的種種不善，無時無刻不在爲『社會主義』作宣傳，用他的生花妙筆爲武器。雖然在他寫『每一個婦人應知的社會主義』那部書的時候，還有些偏于空想，見解不大正確，但是自從他到了俄國一次，長進得很多，居然科學化了，在種種意義上都有一歡迎的價值，所以我很高興的做了中國戲劇及電影文化團體的代表，去請他吃飯演說，同時又答應替時事新報做一次臨時訪員，寫一篇談話，十六這一晚是整晚的沒有睡覺。

『英國皇后』是不進黃浦來的。我特別努力，想搭了小火輪到大船上去。十六的下午向昌興輪船公司打聽了四次，小火輪幾時開出；四次所得到的答復都不相同：兩點鐘，四點鐘，四點半鐘，六點鐘。我一聽此事有些神祕，我只得笨做，同了幾位報館朋友，兩點鐘就到新關碼頭笨等，兩點而三點，在四點半鐘，公安局查驗護照的人來了，我跟定了他們，跟到了昌興公司。

昌興公司的主持人說今天至少拒絕了二百個新聞記者。因為蕭老先生怕麻煩，所以一切閑雜人等，船長命令不許登舟。我想蠻幹一下，我說：『我上了小火輪，你未必能把我推下水去。』外國人說：『我至少可以把你推上岸去。』推上岸是容易做到的，我想不必嘗試了，祇得將幾個團體託我請客的事，寫了一個小簡，託公司中人帶了去。這封信我相信他一定會看到的，我總算是幸不辱命了。

先前兩點至四點之間在新關碼頭散步觀潮的時候，發見一只海關小輪升火，準備啓行，這又有點神祕。果然，不久楊杏佛先生來了。不久孫夫人和她的祕書也來了。我再三和楊先生商量，請他替我設個法，帶我去，費了多少唇舌，結果船開往吳淞去了，我沒有去。

據說蕭老先生不是怕別的，是怕人家把他當做新鮮物事看如五腿馬三腳蛇之類。我想世界各處的人，這樣一覩豐采爲快的確是不過一覩豐采爲快而已，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拒絕做小市民的欣賞物，蕭先生當然是應該的，所以我們不能怪他和輪船公司立下了約。公司應當保護他，不讓一切想看熱鬧的人麻煩他。他那裏會曉得，在中國的

民衆中，也有一部分人，想領受他一點指導，想聽他幾句公平的誠實的批評與證言，或者還能和他共鳴呢！——洪深（時事新報）

水乎水乎洋洋盈耳

我向不善歡迎要人，站碼頭，踱月台一類的事，這回却爲事勢所迫，被人擠到歡迎蕭伯訥的前線，而且前線就是埋葬多少情郎痴女的黃浦江畔。在不得已竚立江畔二小時的當兒，我覺得世上的水實在很多，到現在想起蕭翁就有水乎水乎之感。我知道上海電政司長，外交部駐滬交際科員，甚至上海市長，南京部長等，都要笑我少見多怪……

時爲正午，在孫夫人客廳。蕭翁坐在靠爐在椅上，眼光時看爐上的火，態度極舒閒，精神也矍鑠。大凡英國人坐在爐邊時，就會如在家居的閒適，這就是蕭翁此時的神態。他一對淺藍的目光，反映着那高額中所隱藏怪誕神奇的思想。蔡先生與孫夫人都在座，但是還有幾位客人未到，所以我們隨便閒談。

我們談起蕭翁的二位作傳者。我說赫理斯比亨德生文章好。

『文章好，是的。』蕭氏回答。『但是赫理斯這個人真沒辦法。他窮極了，所以要寫一本耶穌的傳。書店老板不要，教他寫一本蕭伯訥的傳。這是他作傳的原因。但是他不知我的生平。他把事實都記錯了。剛要脫稿時，他不幸逝世，將手稿託我出版。我足足費了三個月光陰編訂糾正及增補書中所述的事實，但是赫氏的意見，我只好讓他存在。』

『赫理斯說他原要寫耶穌的傳，但是據說下筆時情感太衝動了，所以寫不下去。』
我勉強湊上說。

『是的，赫理斯遇見與狂浪的人在座，他便大談起耶穌人格之高尚，但是與安立干教牧師同席時，他又大放厥詞——一如同巴黎最淫蕩的神女交談一般……他死時，只有留給他的妻兩袖的清風。』

『我希望他的妻現在可以拿到這本書的版稅吧？』自己想不出什麼妙論可發揮。
『自然的。可笑的是，有我的朋友寫信給我，對書中許多奚落我的話提出抗議，說赫

理斯不應該說這些話，而我不應該依他發表。其實這幾段話是我自己寫的。』

蕭氏講話之時，淺藍的眼睛時時閃爍，宛如怕陽光一樣，使人覺得他是神經銳敏的人，有時或有怕羞的可能。最特別的就是他如有所思時，額頭一皺，雙眉倒豎起來，有一種特別超逸的神氣。這就是蕭伯訥的諷刺畫中常看見的有名的眉梢。

我看這位魁梧纖瘦的哀爾蘭文豪，想到他縱橫古今語出驚人的議論，使讀其書的人，必生畏心，以爲此老不可輕犯，然而一見其爲人，又是樸質無華的文人本色，也是很近人情守禮法的先生。因此我想起他素來以真話爲笑話的名言。常人每以爲蕭氏的幽默，出於怪誕炫奇，却不知這滑稽只是不肯放誕，不肯盲從，而在於揭穿空想，接近人情，撇開俗套，說老實話而已。不過要近人情說老實話就非有極大的勇氣不可。誰敢奉行耶教十誡中勿撒謊的誡條，老實說婚姻是怎麼一回事，戀愛是怎麼一回事，中國政府，長期抵抗，高等教育，讀書涵養等等是怎麼一回事，便非被社會認爲狂悖不可。這是蕭伯訥被人認爲怪誕的緣由。

在席上，蕭氏談到素食，中國家庭制度，大戰，英國大學的教授戲劇，中國茶，及博士登茶等問題。他只是在他學用筷子夾物之時，隨便扯談的，當自在，談諧併謔，然而在我們聽來，真如看天女散花，目不暇顧。

蕭氏說英國大學的教授戲劇，只教人莎士比亞劇文的箋註出處，某語出於某典，某人生於何時。學生預備功課時，也盡力強記這瑣碎的箋註，以應課堂上的考問，却未曾把本文一氣讀完，而得其神趣。結果這些學生一聽見莎士比亞的名字就頭痛，終身不敢翻開莎士比亞的劇本。

他又說在大戰時，英國士兵與德國士兵倒沒有惡感。「英國人與德國人從來不吵嘴，他們相見於疆場，只有拿起刺刀，你不殺死我，我便殺死你完事。但是英國人却痛恨法國人，法國人又痛恨美國人。到了歐戰將終的時候，這聯軍的惡感已達到極點。」

『我們以前常講戰士的英勇。但是歐戰以來，英勇已成歷史上過去的事實。大戰中沒有人說他自己的勇氣，只有說他的恐懼。現代戰爭的殘酷兇狠，已到極點，凡頭腦清楚

而稍自愛的人都非屁滾尿流不可。

『我曾經聽見一般尚戰論者，大談戰爭有益於人類的品性，鼓勵犧牲，英勇，大無畏精神，就對這些人提出一種消滅戰爭的方法。我提議我們在每年秋操時候，廢除閱操典禮，因為這閱兵是不殺人的，所以不會提高人類的品性，應該叫那些尚戰論者自己到野外去，真鎗真彈去互相廝殺。如此可以滿足他們食人的野性。』

餐後大家到花園中。那時清亮的陽光正射在蕭翁的白髮蒼鬚，蕭氏人又高偉，有一種莊嚴的美麗。這幾天是連日微雨，所以我們想蕭氏對於上海的印象未免太好，上海的雲天太便宜了。

『蕭先生，你福氣真大，可以在上海看見太陽。』有一人說。

『不，這是太陽的福氣，可以在上海看見蕭伯訥。』這位機智的哀爾蘭人回答。

我想到穆罕默德的名言：

『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讓山來就穆罕默德。』——林語堂（論語）

我們對蕭伯訥的希望

蕭，在這帝國主義搶劫我們的時候，你遠道而來，

我們歡迎着你，可是決不是把你當神像來抬！

我們尊敬你，因為你是帝國主義社會的敵人，

你知道牠底黑暗，知道牠快要末日來臨……

我們正在受着這末日以前的強盜底鎗砲，

你來，總會把我們曝露我們身邊的強盜……

你遠道而來，我們不能不抱着這個最低限度的希望，

我們像尊敬十八世紀啟蒙哲學家一樣的尊敬着你，——可是決不把你當作神像！

——王獨清（時事新報）

致蕭伯訥書

蕭伯訥先生鑒：欣承先生來華，並視察一二八淞滬戰役之遺址，照垣以事離滬，不能陪駕，殊抱歉仄！茲謹贈拙著英文『淞滬血戰回憶錄』一冊，爲先生來華之紀念，且使先生親見強暴者砲火餘燼之後，更披閱是冊，可知當時被壓迫民族浴血苦戰，可泣可歌之情。更仰先生爲當世文豪，平日嘔出心血，寫盡人類喜生惡死之哲學，領導羣倫，踏進和平大道，庸詎知際此泰西競尚文明之世，我遠東尚有此狺狺者，日施其猙獰面貌，殘酷手腕，而視人類和平於弁髦耶？然則先生旣臨此境，復悉此情，對此人類，又不識灑幾許慈愛淚也！伏希珍重，翁照垣謹上——（申報）

『最高尚的歡迎』

胡適之於蕭氏抵平之前夕發表一文，其言曰：

余以爲對於特客如蕭伯訥者之最高尚的歡迎，無過於任其獨來獨往，聽渠晤其所欲晤者，見其所欲見者。——（路透電）

這種『最高尚的歡迎』，可以說是『幽默』之至，有人感到那字裏行間，文言氣太重，殊有礙於宣傳，且有負於胡氏提倡白話的苦心，於是替他翻成語體，當然也還很『幽默』，不忍割愛，特轉載如次：

『我以爲對於像蕭伯訥這樣一個特殊客人的最高尚的歡迎方法，最好是讓他自已獨來獨往，聽憑他要見什麼人，就見什麼人；要看什麼東西，就看什麼東西！』——（小小報）

第二 感想和批評

蕭伯訥頗有老當益壯的思想

蕭伯訥年已七七，鬚髮皓然，而言語爽利，舉動輕便，毫無老態；但在前日閒談中自言：『初入老境時，大家覺得蕭老了，不必再看他的作品了；到了現在，又覺得蕭老而益壯，又要看他的作品了。』

他雖然不大喜歡作莊語，然而這兩句話，似乎出於真的感想。

我們的文學家，常有『才盡』或『老手頹唐』等評語，老年作品的減色，容或有之；但蕭氏的近作，却還沒有聽到『遜色』的評判。我想他的兩句話，是讀者心理的狀態。美學的試驗，知道吾人對於最新的美的接觸，有兩種態度：好學，驚其新奇而詫爲盡美，或嫌

其格格不相入而斥爲非美。但此斥爲非美的對象，若屢屢接觸，則漸與相習，而認識其美點，此爲第一轉變。若久與之習，則又不覺其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此爲第二轉變。蕭氏所說『不必看他作品』的話，當是讀者心理上第二轉變時期的狀況。然後來看他倔強猶昔，不覺又引起好奇之心，加以蕭氏游俄以後，能言人所不敢言，尤足喚起同情，故又轉而歡迎他的作品了。——蔡元培（論語）

我對於蕭氏的意見

與其說蕭先生是一位戲曲家，不如說他是一位諷刺家，說他是諷刺家，不如說他是一位思想家，因爲他的思想常在潮流的前面。蕭氏是二十世紀的莫利哀，但他不僅諷刺人類，而能糾正人類思想之錯誤。——宋春舫（時事新報）

蕭伯訥頌

蕭伯納未到中國之前，『大晚報』希望日本的軍事行動會因而暫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後，各報由路透電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題之曰『宣傳共產』。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君甚不像華人，』蕭並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為異，問曰：『彼等其幼稚至於未識余乎？』（十一日路透電）

我們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讐，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但對於蕭，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僅只有三四種。

所以我們不能認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後的思想，也不能深識他游歷蘇聯以後的思想。但只就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殭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但我所謂偉大的，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爲赤色革命家，因爲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爲革命家，明天汝就失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並不離開了現在。

——閥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華民國，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況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呢？這問題極平常，然而是偉大的。

此之所以爲蕭伯訥！——何家幹（申報）

誰的矛盾

蕭並不在周游世界，是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的口試——然而下了第。

他不願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却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後，却又都多少講些俏

皮話。

他躲來躲去，却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後，大做一通文章，却偏要說他自己善於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却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爲聰明。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聽了回答，又鳴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幾句，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

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一同關在牢監裏，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願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游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於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鬚髮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爲『矛盾』的蕭。

然而我想，還是熬一下子，姑且將這樣的蕭，當作現在的世界的文豪罷，嘮嘮叨叨，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爲給大家可以嘮叨起見，也還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爲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那可是玩意兒也。——魯迅（論語）

關於蕭伯訥

蕭伯訥在『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一文論易卜生道：人們盲目地堅持着一些不正確的觀念，（關於宗教的，政治的，兩性關係的）並且讓這些觀念左右他們的行動，雖則他們心裏不願；而易卜生的諷刺就是針對了此種矛盾狀態。

我們以爲蕭伯訥也就和易卜生相像。蕭的重要著作都是揭發人們傳統觀念的錯誤，（而這些錯誤的觀念又是統治者用種種手段來維持的）可是蕭比易卜生更深刻。

例如對於傳統的錯誤的『義務』觀念，蕭說道：文明人常用義務這一名詞來掩飾他的行為的真正面目。在『The Man of Destiny』一劇中，蕭借了拿破崙的嘴說：『英國人做事總要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他心裏要什麼東西了，嘴裏決不肯說他要……當他要替曼卻斯脫的工業製造品找一個新市場的時候，他先派些牧師出去宣揚和平的福音。然而土人們傷害了牧師了，於是英國人立刻跳起來拿槍保護基督教為基督教而戰爭，而征略，而且謝謝天賜佔領了那新市場。在『Candida』和『Widower's Houses』等劇中，蕭嘲笑那些嘴上掛着『盡義務』的招牌，而無往不想自私自利的偽善者，真是一字一鞭。

在以拿破崙為主角的『The Man of Destiny』一劇，以羅馬大將凱撒為主角的『Caesar and Cleopatra』一劇中，蕭嘲笑著世人的『英雄崇拜』。在蕭的筆下，『英雄』這東西是非常愚蠢的自私自利者。

同時這兩篇歷史劇又是『非戰的』，可是蕭的『非戰』劇本還當以『Arms and

the Man”及“Major Barbara”爲最主要。前者揭發帝國主義國家的兵士對於戰爭的心理：『這是怕死，所以斬殺！』後者揭發不但大砲機關槍魚雷等等是殺人的利器，而『愛國』『宗教』『公道』『義務』等等好聽的名詞也是殺人的利器。

許多人認爲“Man and Superman”一劇中間有蕭的『哲學』故其價值，乃在其他諸劇之上。誠然，『人及超人』除嘲笑世人的戀愛觀而外，又提出了『哲學』——我們人不過是一種實驗品，是介於獸和超人之間的一個環，而戀愛呢，則爲大自然達到目的（到超人）的一種手段罷了。戀愛是一種偉大的『宇宙力Cosmic Force』。蕭在『人及超人』的前面寫了數萬言的長序，以說明他這哲學。喜歡拿戀愛來當作『哲學』研究的人們很可以讀那劇本和那長序。但是也不要太高興。因爲你若把『人及超人』讀了兩遍，你又要覺到蕭老先生或者在那裏嘲笑那些『戀愛哲學家』。

從『五四』以來，我們文壇上常常提到蕭的大名。蕭的著作，也很有幾本譯成中文了。然而對於蕭的研究，還是很少。趁現在這當兒，如果認真把蕭來研究，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事罷。——玄(申報)

蕭伯訥與高爾斯華綏

我們正在預備着熱烈歡迎那位長臉預言家的蕭老的當中，却不幸又接到了去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高爾斯華綏的訃告。蕭今年七十六歲。高爾斯華綏今年六十五歲了。照理說來，六十五歲，也並不算是夭壽，但這位由法學家出身的英國上流社會的精密記錄者，若是不死的話，以後說不定總還有幾冊巨著出來，來報告我們以英國上流社會的動搖與變遷。高爾斯華綏在文學上的功績，不單是『福些以脫家的史傳』與『銀盒』、『鬪爭』、『正義』、『羣衆』諸劇本，可垂不朽，就以他當一八九三年在南海旅行的途中，發見了海軍作家康拉特的一事業來說，也該在英文學史上占一席地位了。雖然是比較上流出身，但他那始終爲人道而立言，對社會下針砭的態度，就是在時代不同，潮流激轉的現在，我們也不得不加以十二分的尊敬。

反過來說蕭，他老先生對社會的態度就不同了。初聽聽似乎只在說玩而不當正經的死話，但閉目一想，或笑後心靈一轉，則立刻就可以發見這位長臉老人的嬉笑怒罵，那一句不是準對着社會癥結的強心針？善哉，麥克開勃（Joseph McCabe）之言，他批評蕭說：『他並不說警句奇語，但他本身却是一句警句。他是最有道德的不道德家，最不利己的為我主義的說教者，最潔己的十誠否定人，最嚴肅的幽默利世德。』（The gravest Humorist）這不是很適當蕭的評語麼？

有一次有一位以美貌馳名歐美的女優曾對他說：『蕭先生，你若和我結了婚，生下一個小孩，相貌像我而頭腦像你，那這孩子豈不是世上最美麗最有思想的人了麼？』蕭說：『萬一相貌像了我，頭腦像了你，那還了得！』

諸如此類的妙語，在蕭的七十六年中間，不知發放了多少。曾記得他到俄國去參觀的時候，史太林也不得不認作馬克斯主義的後生小子，因為他說，我研究馬克斯，是遠在列甯之先。當時歐洲各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宣傳蘇俄強制作工的違反人道，而蕭却對

俄國人說：『我願意歐美都有這種非人道的現像發生，否則那些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那裏會有出路呢？』

在我們中國，幸喜還有一位魯迅先生——可以和蕭伯訥對對。片語殺人，人家都在罵他是紹興師爺的故技，但蕭伯訥總不至於是蕭山人罷——郁達夫（申報）

說真話

人家都知蕭伯訥是丑角，說他善於說笑話。蕭伯訥說，『我說的是真話，世間最大的笑話，便是說真話。』

說真話——這便是蕭老先生五十年來大聲疾呼的口號。他的論文，他的小說，他的劇作，都是以這個使命為中心。幾十年來，他不憚煩地把那些說假話來遮蓋自己的行動的英雄，說假話的中產階級，說假話的普羅列達里亞，說假話的女人，說假話的政府等等指給我們看，把他們言行不一致的滑稽暴露出來，叫我們看看這便是近代文明。

愈是自私自利的人，愈是說得出正大堂皇的理由。愈是貪贓枉法的官吏，愈是會說保障人權；愈是會享樂的摩登男女，愈是說得出跳舞救國等等，等等。於是我們就常在報章上看見許多言論，勸這些人照着所說的話去做。蕭伯訥說，這便是理想主義者——不敢直面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言行不一致的人，是因為他不敢直面他所行的真實理由，所以想了一個假的，正大堂皇的理由來代替。同樣，這些勸他們照着所說去做的人，也是在遮掩現實，理想地以為人類果能如所說的那樣高尚地去行動。現實主義者，就知道全不是這回事。人們還在進化的過程中，還不能完全，這些嘴上所說的高尚道德，還談不到。所以人類的自私自利，貪婪享樂，當然是意中事。可是我們若果能直面這個現實，還可以想出改善的辦法，人還是不斷地向前進化的。所以蕭伯訥的主張，便是人怎樣行動都行，照着你的本能去做，可是不要做的一樣，想的又是一樣——說真話，他要求我們的，不是要我們行如我們的言，是要我們言如我們的行。這一點，蕭伯訥又把我們的因襲思想，給顛倒過來了。他常常玩這個把戲。

那麼，照蕭伯訥的主張，豈不是善惡都不分了嗎？蕭老先生，就在 Major Barbara 中答應這個理想主義者的問題，『善惡！你以為你活了多歲，起碼可以辨到善惡嗎？哼！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自孔子蘇格拉底以來，幾千年中，絞了無數上智者的腦血，還在爭論不出一個結果呢。你以為你就懂了嗎？』

所以人們只有照着本能所命地做去。直面你為什麼這樣做的動機到了你本能地覺到這種行為不對的時候，你就會想法子改了。假若你只會用口實來遮蓋着這現實的話，你一世也改不了，便是你一世也進化不成再高等的動物。那末，就有比你更高等的動物（蕭老先生所謂超人）出現了來，拿你對待猴子的手段，來對待你了。

蕭伯訥說，人類不錯，是現在最高等的動物。可是生物的進化，並不是到人類即止，因而人類非保存不可，並沒有理由。你對待其他下等動物的手段，為什麼比你更高的動物，不能拿來對待你呢？

據說一兩年前曾有一位大雜誌的編輯先生，不遠千里，跑來問蕭老先生一個問題，

在他以爲這個問題的蕭伯訥式的回答，一定使世人感覺很大的趣味。他的問題是在蕭伯訥的意中，現代誰是最寶貴的，是文化，進步最不可缺的人。他說：『假若人類突然遭了全滅的運命，而你老先生，就如『創世紀』中所載的 *Nob* 一樣，可以有力，留一點人種，那末你留那一個人呢？』

蕭老先生帶着謎似的微笑答道：

『我一個也不留。』

蕭伯訥對於現代人類，非常悲觀，可是對於生物進化，抱有極大的希望。

現在他到中國來了，不幸而正當帝國主義的日本侵略我們的時候，這個使我們想起他在歐戰時的態度來，在那個時候，英國有人說他，『協約國一面和德國打仗，一面和蕭伯訥打仗。』全英國人民都在痛詆德人的時候，他却出人意外，大罵起英國政府來。若是在中國的話，早被槍決了。

當時他的態度，可以在戲曲『傷心之室』中看出。戰爭是近代文明的結果，受近代

文明影響的，不只是這一國，而沒有那一國，不只是這一階級，而沒有那一階級，近代文明所墮落的，是全人類。所以德國人固然該罵，英國人更該罵。全英國人民在罵別人的時候就忘記了自己，因此，蕭老先生只好出來說真話了。

第二次大戰又要展開了。也許蕭老先生還要說一次真話！——張夢麟（申報）

紳士階級的蜜蜂

蕭伯訥是英國紳士社會的一隻蜜蜂，他有刺，他也會釀蜜；不過，他所釀的蜜，却是甜中帶酸的。

英國的紳士是不只一個的；因此，當這個蜜蜂無情的去叮這一個紳士時，另外的紳士們，以為這並沒有叮到他們，於是乎，他們笑了；同時，被他人笑為被蜜蜂叮了的紳士，也發現那幾位笑他的紳士被這討厭的蜜蜂叮了一口了，於是他也笑了。

但英國的社會，除了一大批的紳士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們，是沒有被列入紳士

之林的資格的。在他們的眼中看來，這一批紳士們，好像都患有潔癖一樣，禮服穿得筆挺的，領口，袖口，胸口，都是燙得筆挺的，白色的硬領，白色的袖口，白色的襯衫。有一點骯髒的東西，他們連豎起兩個指頭去撮一撮都不高興的。這是何等看不過去的事！現在，他們却親眼看見，這一個蜜蜂，嗡嗡的鑽入紳士們的領口，袖口，以及胸口裏去放刺，使得這一批紳士們沒有辦法，使得他們演了許多引人發笑的怪劇；於是乎，這一批非紳士階級的人們，也看得笑了。

這大概便是蕭伯訥之所以爲蕭伯訥吧。——許傑（申報）

蕭伯訥與青年

中國文學家多善於哭，西洋文學家多善於罵。在此一哭一罵之中，文學家始得延長其生活，而人類痛苦亦始得其微微之流露。蕭伯訥本爲善罵之人，其來中國，吾人亦希望其大罵一番，以爲氣無可出之中國人一吐其悶氣。可惜竟不願多所流露，到滬一日，匆匆

他去。特是至香港，因中國記者無人前去歡迎，便罵出一聲幼稚，而謂於彼之來，竟不嘗聞知。其實蕭伯訥既未曾作主席，當司令，中國記者為何而有代作起居註之義務乎？蕭伯訥在香港大學又有所奚落於現今之大學，而謂大學祇是教人讀死書，不會教人組織思想。其實彼尙未曾一至中國內地之大學。中國大學，儼成庸才製成所，根本上便不見有思想之存在。中國大學之領導人物，可遠望而不可近觀。遠望之，頗似老練深沉，恰如學者身分。近觀之，則一肚皮膿包而已。外面之格式盡是從官僚學習而來。在此輩領導下之學生，根本上便不容許有思想之存在，因為思想確為危險物也。蕭伯訥一到上海，即不願受多人瞎捧，并中央大學之請，亦一律謝絕，吾人於此，祇得高叫一聲痛快而已！

西方人生長於自由空氣之中，故文學家能罵；而中國人則時時有喫衛生丸之疑懼，故中國文學家祇得哭。西洋民衆有力量，文學家之一罵，果能深入人心，便可發為民衆運動而轉移朝政，罵之功用大矣哉！中國人民服威畏勢，遇事敢怒而不敢言，文學家倘若善哭，能動天地而泣鬼神，則戾氣所鍾，亦能使天下有情同聲一哭。罵與哭，皆是不滿現狀之

所表現。滿意於現狀者，豬而已矣，豬之表示其不滿意，祇在其食不得飽之時。除豬而外，對於現狀未有能感滿足者。文學家天才之流露，即在於其活潑的心靈，能了解大眾的心情，其精巧的技術，能寫出大眾的苦悶。中國人的心，殆已爲造物所收回，其不能產生代表大衆心情之文學家，自爲必然之勢。況且吃飯有路，窮愁無緣，更無所用其罵乎？吾人雖亦曾微微有所聞於哭聲，但望其所哭有過於衣食以上者耳。

大抵人有四種疇型：宗教家、文學家、科學家、事業家是也。逕鳴其內心的情愫，而不問客觀之條件，此宗教家與文學家之所同也。惟宗教家之解決法側重於主觀方面，而文學家之解決法，則亦往往能兼重客觀而已。純粹的科學家，有理智而無情意，講工具而無目的，充其量不過有機械之功能而已，能用於人而不能用人者也。事業家脚踏實地，講求實益，有實事可見，有實惠及人；然而病在目光短淺，遷就現狀。故四種人者，各有其用，亦各有其短。宗教信仰，爲各人内心上事，非他人所能干與，可無論矣。吾人於事業家，可學其切實，勿學其淺薄。於科學家，可學其謹嚴，勿學其無主腦。於文學家，可學其高遠，勿學其空疏。然

而其長其短，似又其同一性格之兩重表現，失其一似又不足以成其另一者。於是吾人深感於造化之不仁，其楷桎竟爲人類所不能擺脫。特是造化終不能禁吾人之痛哭，終不能禁吾人之漫罵。蕭伯訥之來，於中國青年，必留一深刻之印象。吾人但願青年善學蕭伯訥之罵。中國今日之事與人，固無一而不應罵者也。能罵而又輔之以哭，中國之事，庶有望乎！

——未署名（申江報）

幽默——矛盾——蕭伯訥

這樣一個體格魁梧精神矍鑠的老頭子，而是個不肉食者；這樣一個威儀棣棣的英國紳士，而是一個充滿了革命情緒的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革命理論者，而他的理論大半不正確，缺乏科學的根據，甚而至於有時候聽上去覺得是非常反動。這就是蕭伯訥！

他說，大學教育不是教育，因爲把個人的自由意志都摧殘淨盡了；這個使人想起他從前是『天才崇揚者』。他又說，代議政治不是政治，因爲當初英國人創造議會的目的，

原是爲要和既成的權威如帝王教堂等搗蛋的。這個使人想起他稱讚過墨沙利尼的治績。他又說，我勸學生革命，不勸學生暴力抗鬪，因爲在馬路上與警察對峙，一定要被打破頭的；這個使人想起他是一個 Fabian。他這樣的說法，未嘗沒有相當的理由，但正和他的鄉前輩王爾德一樣，說的話雖然新鮮可喜，但是『似是而非』的是 part truth 而不是 whole truth。

他的論戲劇，也是崇揚天才的。他說：『編劇要從人生中去學習的。我自己編劇的時候，我先認清幾個人，把他們的行動言語記錄下來，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發展着，像一朵花的開放一樣。』當然，等到一個編劇者認清了幾個人而能將他們的行動言語記錄下來的時候，一齣戲已經成功了。困難是在怎樣能認清，怎樣會記錄，就是怎樣從人生中選擇一部分有意義的記錄連綴起來，成爲一本有意義的戲劇。這純粹是一個技術問題，最好由自己閱歷出來，如蕭伯訥所主張。但有許多時候，我們可利用別人的閱歷，從別人的閱歷中學習。這就是從課堂裏，從書本裏所能學習的。

祇有他說蘇俄的地處，是坦直而誠懇的。

末了，還有幾句他沒有說而別人代他說的話，也不可不記錄。關於目前的幾個實際問題，蕭翁都不大願意回答。有人問他，東方弱小被壓迫民族的出路如何。蕭翁未答。而上海某英字報的記者代他回答了：『這些關於窮苦而被壓迫人民的廢話！誰壓迫他們？無非是一羣殘暴的軍閥，自稱爲××黨，惟一目的，爲奪取自己人民所有的一切而已。』這種歪曲，在那張外國報無怪其然，據說那張報是代表東方某一個被壓迫民族，海陸空軍強得不得了，國內有很多殘暴的軍閥的。

又有一個記者問蕭翁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思想。蕭翁不肯回答。但是申報用一個Defeatist的口吻，替他回答了：『二次大戰，吾人俟其到臨可也。』申報記者的想像力，也和某西報的某西記者一樣豐富的。——洪深（論語）

小丑乎？朋友乎？

昨天說到那笑『萬里長城』爲一版『矮牆』的蕭伯訥氏，當他乘着『不列顛皇後號』經過上海的時候，我們是曾懷着很熱烈的情懷去迎接過他的，雖說他被一些高等華人和Dr. Mei Lan Fang包圍去了，我們祇好和幾百個學生羣衆捲起旗子失望的回來，始終沒有能『一覩丰采』。

但是儘夠了，我們胡適之博士不說嗎，『歡迎蕭伯訥氏這樣的貴客的最好方法，是讓他自由自在地見他所要見的人。』蕭要見那些高等華人和梅博士，而『與反帝青年以失望』（字林西報標題）也許正是蕭之爲蕭，我們無所用其憤慨。

蕭氏是對於英國的社會投着痛烈的譏刺的，他常說德國人比英國人更懂得他的作品。然而在數年前德國左翼批評家却曾稱他做『資產階級的小丑』那是說他那種幽默的諷刺，聽去似乎很革命的，但因爲不站在正確的科學的觀點，事實上對於資產階級並沒有重大的打擊，反而供給他們某程度的開心。這個批評直到一九三一年終稍稍改變，那是因爲他游歷蘇聯以後所發表的言論大有老當益壯之概，他和『法國的羅蘭

也都成爲蘇聯的朋友了。」（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語）他這一次到東方的旅途，在印度攻擊了英國的統治，在香港指示殖民地青年的出路。這自然會引起中國反帝青年對於他的熱情，特別在這帝國主義者積極向中國進攻的時候，他們不覺望着每一條從吳淞進口的船，叫着：『啊，蕭伯訥翁，我們的朋友！』

蕭伯訥氏究竟是布爾喬亞的『小丑』呢還是我們的『朋友』呢？由他到中國來的一鱗一爪的言論，我們可以這樣說，當他勸告反帝青年『見了巡捕的警棍趕快逃，免得頭破血流』的時候，當他以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反對 Strike 的時候，他是一個小丑。當他答覆時事新報說『他不能給中國什麼 message，而願意從中國得到 message……中國不能從西方文明得到什麼，應當起來自救』的時候，當他罵白俄新聞記者『蓄意誣譖不能理解蘇聯進步之速』的時候，當他和洪深氏談『作劇不能從書本子學得什麼，應從實人生中去學習』的時候，當他說『中國人對外國人很客氣，對自己人却不客氣』的時候，他是我們的朋友。

這不是很矛盾的嗎？但據洪深先生說在他的談話中矛盾的地方還很多。這原因很簡單，蕭伯訥氏雖同情革命，却並非科學地理解革命，以社會進展的動力為 life-force 的尼采哲學者，能這樣老當益壯，已經是難能可貴，但青年的中國人却和對於許多老年人一樣不必十分想去從他求得什麼教訓，在這樣急激發展的革命鬥爭中，我們可以獲得的教訓太多了。——田漢（晨報）

蕭伯訥是丑角

英國劇作家同論說家的蕭伯訥，並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賓協會（Fabian Society）的創設者，並且也是這個協會的一個永久的會員。這個協會的名稱，是借用一個羅馬貴族的姓，這個貴族不是用他自己的力量，是用他的先見得到成功的。到了近來，蕭伯訥反了共產主義的革命手段，因為他覺得共產主義的戰術是錯誤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與實際運動，在蕭伯訥看來，都是沒有用處。青年時代，他曾是馬克思

司主義的信徒，不過這是很早的事了。現在因為他對於馬克司理論的混亂的思想，使得他亂口攻擊了。

正如其他一切的社會改革家一樣，蕭伯訥也叫他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是那一類的社會主義者呢？在他的長篇戲曲“*Back to Methuselah*”裏面，這位作家所介紹出來的社會主義者，是擁護着所謂社會主義者的信條。但是，這位人物，他是墨守着有產社會的舊式的美風和因襲的。據他的意見，有產社會，或許是有一種勢利的格調，缺少愉快。但是，至少比完全沒有格調的好。有產社會的體面，或許是虛偽的。但是這種體面，總還是存在的。這就是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正直的社會主義。

不用說，這只是英國作家的政治藝術的人格的一面。在他另外的許多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另一方面。蕭伯訥畢竟是一個有產階級的最後者。他承認資本家社會的崩潰，同時並是促進這種崩潰的。正如是文藝的意味一樣，這也是政治的意味。

俄國的列寧，很知道蕭伯訥他們的華賓協會的傾向。他描畫出來這位英國人——

不如說是英國的愛爾蘭人——是一個旁面包圍了許多僞君子的正直者，是一個比起周圍的人們來，要左傾得多的改革家。其實沒有一個社會改革家能夠像蕭伯訥那樣的知道有產社會的缺點，能夠像他那樣暴露這種缺點的。現代資本家的世界，同外面結合着種種的關係，蕭伯訥已經看出了那種革命的傾向，並且他認為資產階級的文化與理想，是毫無意義的。資產社會的唯一的真實，就是『虛偽』。資產社會的觀念形態，以前是很強的，現在是衰弱，是搖動了。這種觀念形態，必然的要被廢棄，這種空虛，也是一定要暴露的了。蕭伯訥是我們這個時代資產社會的理想的最堅強的破壞者。在他的社會主義的許多喜劇裏，他從各方面，打毀了資產社會理想家的結構了。

在『人與超人』裏，那位年青的理想家，看見他自己的汽車夫一面流着汗一面在修理車子的時候，他對汽車夫說：『我是極端相信勞動者的尊嚴的。』他這句話，對於那位汽車夫，是一點印象也沒有。他只冷然地回答：

『那只是因為你自己不勞動的原故，魯兵生先生：我的事業，只想做得同勞動離開

就好了。」

被資本主義表彰的勞動的尊嚴，蕭伯訥是不尊重的，同時他也不尊重資產社會的尊嚴。他覺得資產社會，只是一個被保護的盜賊。在『人與超人』裏，那個西班牙的強盜的頭目，名叫蒙多沙的，對那個英國的富豪達勒這麼說：

『讓我來介紹我自己。我是蒙多沙，西爾拿聯盟的首領。我是一個山賊。我是依賴劫掠富人的銀錢而生活的。』

達勒聽了他的話，立即回答說：

『我是一個紳士，我是剝削窮人爲生的。握手罷。』

所謂資產社會的本質，真是亮光光地照出了。但是那個紳士不僅是一個強盜，並且還是一個僞善者，是一個懷疑的動物。在『加奢林女王』那本劇裏，愛特司達頓說：『我有紳士的懷疑性。』他那位同伴的俄國紳士，並不懂得他這句話的意義，他說：

『在俄國，一個紳士是沒有懷疑的。我們都是正面地察看事實。』

愛特司達頓聽了，便回答說：

『先生，在我們英國，如果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實，我們是從不正面觀察的。』

依照這種理論，蕭伯訥自己並不是一個紳士。他時常被人批評，說他對於資產社會的不愉快的事實，是很依戀的。這個社會，是將一切的事物，都弄成商品化，於是事物的真實的意義，也都變成歪曲了。就拿醫生作例罷。在資本主義之下，他們用最高的可能的價錢，賣去他們的最大價值的技術了。對於這個問題，蕭伯訥這麼說：

『我敲斷了腳，我必得想到那裏有一個外科醫生的難問題。比起你利用你的腳來，我不得更利用那一袋子洋錢嗎？一隻腳的人，就不能同兩隻腳的人一樣著作嗎？（或許一隻腳的比兩隻腳的還要好些。）但是在這個年頭兒，錢對於我是大不相同了。我的太太，我的孩子……腳可以生毒，用手術老是安全的，兩個禮拜就沒有事了。現在橡皮腳，真要比天生的腳好得多。進化是向汽車和沒有腳的方面進行的。』

這種資本家社會的根底的分裂，正如蕭伯訥所指示的，到了這種醫業的社會化。到

那個時候，所謂醫業，一定要變到牠的本意的正反面，成爲一種『以人間的信任與人間的苦惱作爲根底的陰謀』。

只要他有勇氣，任何一個貧乏的人，可以負起這種資產文化的虛飾。關於這一點，蕭伯訥在他的『配克馬利昂』五幕劇及其他的作品裏，已經向我們表示了。這一切都是我們在他的作品裏可以讀到，在舞臺上可以看到的。蕭伯訥接觸到政治的意味，只有兩點。那便是宗教社會的任務，和權力的問題。這兩點，在他的戲曲『救世軍巴巴拿少校』裏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那本劇裏，作者將他的問題，達到一種革命的解決的途徑了。我們試看那劇裏的一段對話：

『安特霞甫——你要知道，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是將他們自己賣給富人而生存的。
康循司——救世軍不是如此的。救世軍是貧窮人的教會。』

安特霞甫——更可以買收。

康循司——我覺得你還不大知道，救世軍對於窮人有什麼用處。

安特霞甫——哦，我知道。救世軍只是拔去窮人們的牙齒，如實業家的我，只要知道這件事，也就夠了。

康循司——胡說。救世軍是勸人戒酒的。

安特霞甫——那是更好了。他們會忍耐地做下去，不想改變他們的職業了。

康循司——要使他們安心。

安特霞甫——這對於革命，是最好的保護。

康循司——要使他們不自私。

安特霞甫——能夠使他們不顧到自己的利益，那就好極了。

康循司——要使他們的思想，離開這個塵世。

安特霞甫——我最歡喜不飲酒的勞動者。那是利益更大了。

康循司——還教他們正直。

安特霞甫——正直的勞動者，最經濟。

康循司——使他們對於自己的家庭要忠愛。

安特霞甫(站了起來)——你不教他們想想勞動聯盟和社會主義真是妙極了。」

在這個劇的末尾，曾論到權力的問題。他覺得精神的力量是不夠的，同時必得需要物質的力量。關於這一點，康循司教授又這麼說：

『康循司——做着希臘語的教師，我會給過知識階級一種武器，去對抗民衆。現在，我要給民衆一種武器，去對抗知識階級了。我愛民衆，我要給他們武裝，好去對抗律師醫生牧師文學家大學教授美術家和政治家。這些人一旦得了勢，就是在蠢人惡漢和騙子之中，他們是最危險最險惡最專橫的徒輩了。我的希望，是要有堅強的民衆，強迫着民衆，強迫着少數的獨裁的知識階級，將那種天賦的才能，用於全社會的利益，否則，就鬧得全部崩潰。』

巴巴拿——再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力量了。(指着那個砲彈)

康循司——是的。但是，這種力正如一隻猛虎可以咬死一個人一樣，牠是能破壞高等的力量的。因此，人間第一要控制這種力量。關於這個，當希臘同土耳其打仗的時候，我就承認了我的頂好的學生，因為希臘而挺身到戰場去了。我送他的禮物，並不是一冊柏拉圖著的『共和國』而是一支手鎗，一百顆安特霞甫公司的子彈。被他擊斃的土耳其的每一個人的血——如果他能擊中的話——正如擊在安特霞甫的頭上一樣，也擊在我的頭上。』

*

一切的社會主義平和論者，對於蕭伯訥說的這些話，是要注意的。請那些相信用精神的力量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的人們，把這種教訓，寫在他們的信仰的書本裏罷。有許多人老是這麼問，這位先生為什麼那麼溺愛着有產社會，為什麼對資產階級的劇場，寫了那麼多的劇本，那麼爽直地陳述着真理呢？我可以回答，蕭伯訥是一個喜劇的作家。因此他能夠說出許多輕視因襲的滑稽話。他很像沙士比亞舞臺上的丑角。這與

卓別麟的社會諷刺，是同樣的。在卓別麟和蕭伯訥的傑作中那種破壞的反資產社會的效果，並沒有人注意到。

現在要做一個結論了。蕭伯訥在資產社會的文化的最後階級，是一個沙士比亞的丑角。但是，正如列寧所說，資產社會與蕭伯訥的關係，比起革命與蕭氏的關係，完全是兩樣的。我們可以把列寧這句話，更具體化地說出來：『蕭伯訥是資產社會的一部，但是他是資產社會的可怕的敵人。他的對於資產社會的觀念形態的破壞，衰弱了支配階級的精神權威。』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是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此文為德國馬克思學者尉特甫格(Karl August Wittfogel)

原作，登於柏林出版的“Die Rote Fahne”的報紙上；後被英人譯出，刊登於“The Living Age”雜誌。我現在是從英文轉譯的。譯者附記。——劉大鳴譯(海潮)

第三 幽默的談座

蕭伯訥的幽默

英國的當代文豪蕭伯訥氏 George Bernard Shaw 最近環遊世界，聽說可於這幾天到上海，大概記者這篇短文和讀者諸友見面的時候，這位白髮皓鬚精神矍鑠的蕭老先生已到了中國。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有聲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抉發暴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矛盾腐敗黑暗，在我國所謂『有力量的人』尙彷徨於歧途中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到中國來走走，我們當然尤其表示歡迎。他今年七十七歲了，不但思想和他的年齡成反比例，就是他的精神的『老當益壯』，也足以振作振作我國人裏面年未老而先現出一副老腔老樣的『待亡人』，這也是我們對於他可以表示歡迎的一點。（蕭

氏的許多戲劇的名著都是在四十歲以後作的，其中有一半是在五十歲以後作的，他的尤其偉大的三種劇本“Heartbreak House”，“Back to Methuselah”，“Saint Joan”都是在六十歲以後作的。除了這兩點外，他的爲人，他的演講，他的著作，最令人不忘的，就是在他那縱橫的機智和辛辣的譏諷中，尤富於令人失笑令人絕倒的幽默意味。但是他並非一味替『笑林廣記』增加材料，所以他有一次聽見人說『這個有趣的脚色不過說說笑話罷了』他欣然的回答道：『不錯，我是說說笑話。不過我說笑話的方法是要說出真實來。這纔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話。』（見Henderson 所著 “Contemporary Immortals”）他最近途經香港，對路透社訪員就說了一大篇『笑話』，訪員問他要不要飛遊長城，他說：『我以為沒有趣味的事情莫甚於此，長城於中國有什麼用呢？』他並用冷諷的態度盛讚日本不向中國宣戰一點最得體，因爲說宣戰確未宣戰，一面仍得積極侵略！這些話在我國人聽了當然痛心，但却都是『真實』。

講到蕭氏青年時的奮鬥生涯，却不甚幽默。他的老子一貧如洗，蕭氏早孤，全恃寡母

撫養成人，十五歲就棄學就商，廿歲到倫敦，最初三年，常在商店裏替人記記帳簿，鈔鈔貨單，所以他後來說笑話，說他的『較早的作品』是在帳簿和貨單裏面。但他同時却無時不在那裏夢想要作一種小說。於是在一八七九年，他鼓着勇氣大膽的寫他的第一種小說。他作完之後，即名為『未成熟』，但是賣不出，從來沒有出版過。他不為膽怯，又在紙的反面作第二種小說，名『無理性的結』，但是他當時的著作，各出版家連看都不要看。可是他絲毫不為膽怯，又繼續作了三種小說。蕭氏自己後來說起這五種最初作品的時候，他說：『我總記得最初的五種作品是幾包很重的黃包紙，常常由出版家陸續寄還我；我總記得當時要想把寄回來的稿子再寄與其他的出版家去試試看，六辨士的寄費就很費一番籌措的工夫。』這種情形，在事後追想，在我們旁人聽來，固然是頗饒『幽默』，可在當時的蕭氏未必覺得有什麼十分的幽默吧。但他不至氣死，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克服困難，却仍靠他的幽默的精神。

——鄧韜奮（生活週刊）

蕭伯訥的法螺

赫傳態度之長處，可由以下數段證明。赫理斯挖苦蕭伯訥，說蕭一面表示痛恨美國，一面却全盤抄襲美國的廣告宣傳法。

『蕭伯訥最初的宣傳也不過是通常的方法。從頭他就喊着：「給我大車與喇叭，現在大車與喇叭不通行了，他又喊着：「給我無線電與銀幕。』在他少時與人辯論時，他懂得附庸風雅，使大家心目中將他與某名人之名聯絡起來。我記得一次在他與海恩門辯論時，他站起來說：「馬克思主義已經死的像羊肉了。殺死他的是我蕭伯訥。」

於是赫理斯便有以下一段挖苦的妙文：『他（蕭）最先認識有聲電影的宣傳用途……在這一點，他一生演講的訓練，使他極佔便宜。他模擬莫梭利尼（譯者按：這電影我親眼看過），甚至模擬蕭伯訥自身，從此可證明他是極偉大的表演家，就是假冒的極端；然而似乎在他中年作戲劇時所搖旗呐喊反抗的就是假冒。他甚至能批評他扮演手段

的高下，而從有聲電影看見他年已將老了，嘴勢也已漸不像樣了。從此便改用無線電，這無線電可將他的聲音遠播全球而不引起他個人曲綫美的問題。』

讀過『英雄與美人』(Caesar and Cleopatra)一劇的序言的人，都記得蕭伯訥曾提出一個問題：Better than Shakespeare? (蕭伯訥是否比莎士比亞好?) 在一八九六年，蕭氏寫一篇莎士比亞的劇評（那時倫敦 Lyceum 戲院正在扮演 Cymbeline），他說：『除了荷馬以外，古來沒有一個有名的作家，連司各脫在內，像莎士比亞被我這樣看不起，當我以自己的頭腦與他的頭腦比較一下之時，我對於他不耐煩的程度，有時使我覺得不如爽心挖起他的屍身對他投石，因為我明白知道莎士比亞及崇拜他的一班人所能懂得的，只有這一類的看得見的侮辱。』

但是記得蕭伯訥又在那裏說過『他是世界上最沒有得充分登廣告的人，』這便是蕭氏法螺之一斑。——林語堂（申報）

蕭伯訥論金錢

蕭伯訥之幽默，在於認清現實，一班人的信仰，總是受俗見所囿，傳統所蔽，很少人肯用腦力去認清事實的，所以有人肯『用最大的苦心，去尋求應當說的話，然後用最放肆的語氣說出來』，自然如撇開煙霧，重見青天，令人讀來心曠神怡，而成其所謂幽默。

這一種的幽默，是很據一種見解的，與荒唐語不同，由以下論金錢一段，可以證明。蕭在“Major Barbara”的序言，有一段話說：

『世人普遍的愛錢，是我們文化唯一的吉兆，是我們社會良心唯一健全的地方。金錢是世上最重要的東西，財富代表健康，體力，信義，慷慨，美麗，猶如貧乏代表疾病，懦弱，恥辱，卑鄙，醜陋，這是如日月經天無可諱言的事實。還有最大的長處，就是金錢能使卑下的人身敗名裂，而使高尚的人胆壯心雄。只有一部分的人求之不得，一部分的人任意揮霍之時，金錢才是一種禍害。換言之，只有在不合理的社會情形中，人生就是一種禍害之時，

金錢才是一種禍害，因為金錢就是生活，猶如鈔票就是金錢。這兩樣是不能分離的。金錢是在社會上分配生活的貨幣。公民第一義務就是要求可以容易拿得到錢。但是在給四個人每人三先令做十時或十二時勞工的酬勞，而給一個不工作的，人一千金鎊時，這種要求是不能達到的。國民最需要者，不是改良風俗，較便宜的麵包，儉約，自由，學術文化，救濟妓女，勉勵青年，也不是三位一體的恩惠，慈愛與結連。國民所最需要者是金錢。我們所應攻擊者，不是罪惡，痛苦，貪污，神父，君主，民主，壟斷，愚昧，美酒，戰爭，災疫，也不是那些社會改良家犧牲的東西；我們所應攻擊的是貧乏。——林語堂（時事新報）

蕭伯訥與美國

蕭伯訥向來不到美國，雖然美國是他劇戲表現初次成功的地方，同時也是他版稅拿得最多的國。這回『大不列顛皇后』雖然要繞行美國，由西岸經過巴拿馬運河而再到東岸，蕭伯訥却早已聲明不要借此機會遊美。最多像他看上海一樣，岸上走走罷了。有

一次紐約五百名人，包括作家，詩家，戲劇家，及表演蕭極有功而且與蕭極有好感的演員如 Mrs. Patrick Campbell 等，飛電邀請蕭翁到紐約，蕭氏仍舊不肯答應。他的理由很簡單：『所有好的美國人都跑來英國找我，我為什麼還要到美國去？』（蕭對電影明星 Adolphe Menjou 說的話。）蕭氏一向是罵美國人的。『我向來最留心不肯對美國說一句客氣話。我譏笑過美國，是一個鄉下老的國家。美國人常自譽為百分之百美國人，我曾下一個界說：百分之百的美國人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白癡。於是他們崇拜我，而永遠繼續我的崇拜我。』

蕭伯訥常譏笑美國沒有自由。有一次他說他不要到美國的理由：『我不願意看（紐約口岸）自由之神的銅像，我是俳諧大家，但是好俳諧還沒有到這種程度。』

他說這回美國人都要轟動全國跑來看他。但是都可不必。『也許美國大陸要從此翻沉了，但到底有什麼用處？』這有像點耶穌罵好奇跑來看他的羣衆。蕭伯訥說過假定世界的人懂得偉人心裏所想提倡的東西，就會都把偉人縊死。——林語堂《論語》

蕭伯訥與宗教

托爾斯泰作『藝術論』，否定了一切藝術，而他自己就是一個大藝術家，他又反抗了當日俄國的宗教，因此受了驅逐出教——宗教裏最嚴酷的刑罰——的處罰，可是誰不知道他自身就是一個大宗教家呢？偉大的思想家們，便常是這麼地自己衝突，自己矛盾，不斷地自己奮鬥，因而不斷地向前進展。他們的一生，便是思想的衝突，體驗的爭鬥。他們的精神，正如辯證法似地不斷向前開展。托爾斯泰是過去了。現在的蕭伯訥，也就是一個好例。

據傳記所載，蕭伯訥在十歲的時候，就已拿懷疑的眼光，來看當日的基督教。從那個時候起，他已不到教堂去做禮拜去了。到了盛年，反抗愈甚，以下是他自述的兩段反對宗教的故事。

一八七八年，那時蕭伯訥才二十多歲。有一天晚上，他應親友之約，到一個醫生家裏

去玩。同坐的都是些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的談話，漸漸談到宗教上面去。其中就有一個人，敍述了一段故事。大約是有一個人偶然嘲弄了一個傳道會，過後這人便因毀罵上帝，而受了雷擊，被人用板子抬回家去。當時在座的人，有一小部分，很是懷疑，不過他們也不願意將板子抬回家去，所以也不敢公然反抗。但是面子上總表示不信的神氣來，於是辯論便開始了。最後，有人就說當日主張無神論最激烈的人，勃勞特拉夫（Charles Brad. Laugh）氏，曾在公眾面前，拿出錶來，叫上帝若認為無神論不對的時候，就在五分鐘內，把他擊死。在座的反對論者，便極力辯駁沒有這回事。又說勃氏自身都曾否認過的。據蕭氏所述，他看見兩方這種無味的辯論，很挑起他的滑稽感，於是他就進而替他們解圍。他說勃氏的這個方法，正就是最科學的實驗法，實驗是否唱無神論的人，真要受身體上的危險。勃氏會這樣做過，與沒有做過，不成問題。若果他沒有做過，他就應該做的。而且他就沒有做，也不要緊。蕭氏說：『我的意見剛好也和勃氏的無神論相近。所以他既沒有實驗過，我來替他實驗吧！』於是蕭伯訥先生便取錶出來了。

這麼一來，全座都震嚇了。辯論者的兩方面，誰也不敢來看蕭氏玩這套把戲。據蕭伯訥說，他還勸了好半天，終歸沒有人答應。過後，主人家看見這個光景，若認真幹起來，客都要跑完，只剩下他和這位沒有神道的人，一同受罰，有點不上算，便勸他們不要說這個問題，改說別的。蕭伯訥自然也承認了。但是他還說：『我的這個毀謗上帝的話，雖然沒有正式說出，但是我心中總是已起了這個念頭的，所以神要降罰的話，不應該因我實際沒有說出，而有增減。』但是其餘的人，好像都以為你既沒有實際實驗，神當然不來管你心中的想的一場論爭，始告平息。勝利自然歸了蕭伯訥氏。

其次的故事，也是在一千八七十年代發生的。一位天主教的牧師，因為徒衆的鼓勵，就來勸蕭伯訥信天主教。他對蕭伯訥道：『既然有一個宇宙，當然有一個造宇宙的人。』蕭氏就答道：『既然有一個造宇宙的人，就有一個造這個造宇宙者的人。』牧師說：『不錯，我承認。而且我承認還可照此推起去，以致於無窮。不過無窮數的創造者，是不可思考的，那麼為什麼就固定一個創造者，不再往前進呢？這不比較容易，而且解決了你的論理。

上的困難嗎？」蕭伯訥說：『若果要容易的話，我相信宇宙是自己造的好了。因為宇宙總有這麼一個東西存在，叫我容易相信。至於你的神，我總沒有見過啊！』據蕭氏說，牧師奮然而起，大約是認為孺子不可教了。

但是現在的蕭伯訥，已大改從前的態度了。現在，他是一個極虔敬的宗教信者。從以前他那種錯誤，已爭鬥了一個宗教出來。因此他相信的是他自己的宗教，對於一般所謂的神，他仍然反對。記得前兩年他在某處講演宗教問題的時候，當着成千的聽衆，他大聲說道：

『諸位，我這話並不是有意要來開罪你們。但是請你們互相環視一下，想一想。假若上帝有能力把你們造好一點的話，他能夠讓你們是這個樣子嗎？』

這樣的論調，可謂極鋒利刻薄之能事，但是也有所本的。前兩三百年宗教和科學相爭的時候，有一位叫巴萊（Paley）的先生，他的鐘在論爭上極其有名，他曾拿一隻鐘來打比，他說一個鐘的機械這麼複雜，這麼精巧，我們能說它是偶然的東西，能說它沒有一

個目的嗎？那麼比錶還得複雜萬倍，還要精巧萬倍的人類，我們能說他是無因的嗎？因而我們能說宇宙沒有神嗎？對於他的論調，有位叫海姆霍次（Helmholtz）的，就答道：『你以為人類的構造很精巧嗎？就拿我們的眼睛來說吧，叫光學專家來看，他一定告訴你眼有無數的缺點，決不能說是精巧，更不能說是完全。假若錶匠造這麼一個錶給我，我只有退還他。所以假若有上帝的話，他能造出這樣不完全的東西來，我們能答應他嗎？』

蕭伯訥的演說詞，便是脫胎於此。但是他的話，已較海氏更有意義了。海氏的話，顯然只否定了製造者的手藝，並沒有否定製造者的本身。以前神是萬能的。既不能，便不是神，便沒有神。但是蕭氏的宗教，便沒有萬能的神，他的神只是盲目衝動的一種力量，不斷地走錯路，可是不斷地向前走。並不是最初就完全的，乃是向着完全的路上進行，所以他說：『神常常錯誤，』這句話被全世界的人認為是一句蕭伯訥先生的『傑作笑話』。可是從蕭伯訥的宗教看來，一點也不是笑話，因為他的宗教是『創造進化』呢！——張伯符（新中華）

有口皆碑

這裏剪貼着一些膾炙人口的軼事，在我看來至少看見過二三次，東也轉載，西也轉載，就像第二則，記得曾一度刊於世界月刊，是近又見於申報自由談，弄得分不清誰是該文的介紹者，特闢為「有口皆碑」的一欄——剪貼者記。

(一) 蕭與印度總督

蕭伯訥旅行印度時，見印度民族運動的高潮實已無法遏止，而民族自決又是一個合理的事情，於是蕭伯訥對人發言說：『英國已無法把印度再收為屬地。我們快把印度放棄，讓印度自治了罷。』那知此言傳出之後，嚇慌了一位印度總督的英人，他趕緊寫了一信給蕭伯訥說：『你還是研究你的文學吧。請你不要再干豫印度的政治胡亂瞎說。』

(二) 蕭與蘇聯少女

蕭伯訥前年在蘇聯時，有一天同着一個叫做×××的小姑娘玩了很久，分別的時

候，蕭對她說：『你回去告訴你媽媽，今天同你玩的就是世界有名的蕭伯訥。』可是這位小姑娘畢竟是太幼稚了，她竟不識蕭爲何許人，立刻毫不遲疑的仿照蕭的口氣對蕭說：『你也回去告訴你媽媽，說今天同你玩的就是×××姑娘！』

(三) 蕭與瓊恩黛格

有一個年青的女伶問蕭伯訥對於她的演劇能力的意見，及至她預演完畢後，蕭氏笑着對她說：『你得回去結婚，生兩個孩子，學習一些人生的經驗，然後你或者就有演劇的能力了。』她照着他的話實行了，過了五年，重登舞台，她便是被稱爲英國舞台上最偉大的女伶瓊恩黛格。

(四) 蕭與一個日本留學生

一個研究英國文學的日本留學生，在倫敦訪見蕭伯訥。蕭氏劈頭就問：『怎麼樣你覺得對於英國有趣味嗎？』那日本學生答說：『也有有趣味的地方，也有沒趣味的地方。』於是蕭氏這樣說：『是的，要使這個英國從頭到腳全部都中了意，那日子可真是了不得。』

了！

蕭氏問這位學生是用如「了」的方法在研究英國文學，接着又還發表他自己的意見。『從日本或別國到英國來的人，有些是即刻就進了大學，在大學裏住到回國的日子為止的，這些人很蠢笨，要曉得學校也許能指示出文藝的進路，但並非是創造文藝的地方啊。』

(五) 蕭與一個青年記者

一個年青的新聞記者被打發去會蕭伯訥，若是他的問語合乎理性，蕭氏答應回答他的問語。及至蕭氏聽了問語，認為那些問題合格了，於是預備了一千字回覆他。以後他要知道他能得到酬金多少，這很使那年青的記者受驚，因為他什麼都不能允許他。蕭氏對於這人厚顏白白地要去了他的一千寶貴的字很是惱怒，於是快快地向他道：『他們給你多少薪金？』那記者道：『五鎊一禮拜。』蕭氏答道：『只有五鎊一禮拜嗎？好笑！回去告訴你的編輯說，倘若他要這篇訪問記，他能將你的薪金加到七鎊。』於是那記者鼠竄。

而去。第二天，他回來了，他說他的編輯只允一禮拜加他一鎊，『這比不加總好，不是嗎？』蕭氏笑着說，於是將那文字交給了他。

(六) 蕭與一個失業記者

蕭伯訥所認識的一個新聞記者，有天因病失了業，蕭氏聽到了這個消息，便給了他一個異樣的訪問，他對他談着各種辯論的問題，從政治到兩性，從食物到上帝，蕭氏沒有取一文錢，那位記者却藉此收入，支持了他的一年的生活。

第四 談笑聲打成一片

從英國出發以前

一九三二年×月×日

蕭對路透社訪員說：

——如果航空家肯免費請我搭飛機，我或許就可以到中國去飛遊長城。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蕭對於問他『在這次旅行世界以前爲什麼不返故鄉一次』的人說：

——我提議把愛爾蘭送給美國，作爲賠償戰債之用。

——明年二月到了中國的北平以後，我要偕同我的夫人搭飛機去遊萬里長城。

蕭於離開英國以前，曾有兩項聲明：

——第一，我決不親筆簽名。

——第二，我不拿我的劇本賣給人家去攝製影片。

在印度

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在「英后輪」甲板上

蕭對印度記者們說：

——甘地君最近倍受印度人的愛戴，自己宣言着決死而實行絕食，這種心境我完全不懂，我若是能夠碰見甘地君，我一定要向他說：『這是不合於你的身份的，請你快停止罷！』一般被世間所敬愛的人物，決不殺自己的，相反的，殺許多的衆人，甘地君也是殺了他的同黨，六百萬的印度大眾，這是好的，這樣一來甘地君也被宣傳得像一個頂顯赫的人物了。他的主張也宣佈了。所謂非武裝，無抵抗主義都是不行的，不論拿了多少武器，

人類這種東西是反抗的時候就反抗的，因為有拳頭可以打呀……但是，他總是一個顯赫的，五六百年間難得出世一個那一類的大人物。

——對於印度問題……我的意見是簡單明瞭的，印度不是英國領土中住人頂多的地方嗎？所以現在英國應該讓印度獨立，就是這樣。

在新嘉坡

二月五日在輪次

蕭對各報記者說：

——這問題——指航行中是否在繼續著作？——並非緊要問題，我是要靠着文字爲活的人，當然不能離此；你可去問船長是否在船上工作。

——你們問我能否看透不景氣之末日嗎？倒還不如問我能否看透世界之末日爲妙吧。

——樹膠的跌價雖不利於此間，但却有利於他處；你們稱之爲不景氣，而我須買汽車輪，故對於我是有着無限愉快的。

——你們問我有無辦法可以解決中日之糾紛？……中國已有許多軍政機關，又有許多司令。

——等到我這隻輪船到秦皇島，中日的交戰自會停止。

——我將勇往直前，向着世界的前頭挺進。

——我已是飽嘗了七十七載風霜的人，對於一切都不覺得舒服，最適意者就是墳墓了吧。

在 香 港

二月十一日

蕭對各報記者說：

——中日糾紛問題，內容怎樣，我絕不知道，日本如果能力可及得到，一定吞沒滿洲。國聯祕書處已經被日本一脚踢倒，無能爲力了。

——對於減縮軍備問題，我以爲將來如果能只拿十吋口徑的砲彈代替十六吋口徑的砲彈來屠殺人民，已經可以算是大幸了。

對路透社訪員說：

——你很不像中國人。

——中國報界中人，竟沒有一個人來訪我。他們難道幼稚得連我都不知道嗎？

——我以爲無味之事，再沒有比飛遊長城這件事更厲害的了。長城對於中國，有什麼用呢？哈特里亞城倒比較得有趣些。

——中日現在的局勢，我不知真相，但是日本不向中國宣戰，這一點真是『行得其宜。』

——國際聯盟，在實際上正在趨於沒落的路上去了。日本曾對國聯虛張聲勢，中國

應該知道國聯的外交部分，就是該機關的不重要的部分，國際勞工局纔是國聯目下唯一的一實體。國聯祕書處已經被日本打倒，而國聯却沒辦法。

——高爾斯華綏是我的朋友，他竟先我而死，真是奇事。現在我也應該死了。

——柯威德那個人，差不是在我所知的新時代的唯一的人物；至於我自己，却是屬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人物。

——這種說我永遠不到美國去的傳說，不近人情，正是等於說美國不來訪問我一樣。

——雖說「一切戰爭都自然爲『英國皇后號』輪船而停止，我却總希望一遊華北，不顧華北的戰事，阻止我這次的旅行。」

——現在各文明國，應該研究蘇聯的憲法，在蘇聯憲法之中，有許多點都被其他各國漠視了。

——中國的政府，我倒以爲頗有興趣。

——中國的軍閥制度，很可以和英倫的封建時代的貴爵相比。

三月十三日

蕭在香港大學演講中說：

——世界文化，一半爲半受教育者摧殘，一半爲飽受教育者摧殘。大學教育往往養成矯揉的心思，不知培養本然的心思，以發展學生的創造力，所以我們不可以只讀教科書，應選讀有真正教育價值的書。

——大學好比百科全書，隨時可應檢查。求學之道須選擇適於自己者去研究，其間或者會有錯誤，然而二十年後，你就會知道你的錯誤就是成功。現在我不想多費諸位光陰，也不願諸位多費我光陰。

——如果你們在二十歲時不做赤色革命家，那麼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堪的殭石。你們要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那麼，你們纔得在四十歲時，不致有落伍的機會。

對香港記者們說：

——到香港無印象。香港是一可憎之地。

在 上 海

二月十七日在世界學會

蕭對筆會同人等演講：

此刻演說實在是不必要的，因在座諸君都是著作家，我真是班門弄斧了。普通人都把作家目爲神祕偉大的人物，而現在諸位都是盡知內容的人，多言又有何益？況作家實亦勞工，不過其工資較之勞工更少耳。

——我在此地正如一個動物院中的陳列品，諸君已經看過，我也不必多說了。

——我所需要的並無原因的。我不喜吃肉，即不吃肉。且素食本是聖人與英雄的食物，諸位不得不承認我是有聲望的人。

蕭伯訥鑑賞了筆會所贈北平東安市場泥製的戲裝鬼臉，（連同古繡衣一件）說：

——戲中有戰士，老生，小生，花旦，惡魔的不同，都在面貌上鑑別得出來，可是我們人類的面目，雖則大都相同，然而內性却未必相似。

蕭在孫宅園內對中外各報記者說：

——我對中國印象的問題之答復，實非一二短語所能說得盡的，猶如一著作家寫作二十卷多帙的巨著，不是一時所能忽忽作完一樣……我今年已七十七歲，當我到過世界各地，凡遇新聞記者的時候，他們總拿這句話來問我。無論在寒地熱帶，其實世界的現象總是如此。同時我來中國，爲期尚暫，故目下沒有整個印象可以說出來。況且問我對中國的意見，於諸君有何益處？到處人家問我對於中國的印象，對於寺塔的印象。老實說——我有什麼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你們不會聽我的指揮。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過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

——中國與東方，並無文化可言。文化這字的意義，如果照科學解釋起來，即爲凡人類一切行爲之可以增進人類幸福者，尤其對於大自然的控制。在中國除田鄉間尚可尋

求少許文化外，此外再也沒有什麼文化可說的了。……東方和西方都沒有文化，所謂文都是假冒的……中國今日竟向西歐搬取許多已經失却效用，遺害大眾的所謂『文化』，譬如說，議會之興起：人民不要當時的政府，英國人民便利用議會，首先推倒帝王的統治，次又推翻教堂的威權，但最後却不曾推倒資本的勢力，因為議會本是資本所操縱的。今日英國實在是無政府主義的英國。又如英國的大學，幾乎把個人的自由意志，摧殘淨盡，而取陳腐無用的老古董，注入學生的頭腦，使他們成為有一種定型的人物，在什麼時候作什麼事情，到什麼環境有什麼反應，都可以預料得出的，像這種所謂西方文化，中國搬了來又有何益？

——東方被壓迫民族，如何始能謀得出路的問題，殊難作覆，不如等我離開上海後，再作答覆，因為在此地說話，似乎不很安全。

——我過香港時，曾囑學生革命，但請勿誤會，我並非勸令學生到街上毆打警察，當警察持棍到場鎮壓時，學生最妥善的方法，就是奔逃，而且須儘速奔逃，以免頭破血流，不

必與警察對抗，因爲警察好似強盜手中的手槍，我們遇到強盜時，決不願與手槍對抗，但是要打倒那個拿槍的人，須有組織有計劃，而不可蠻挺與警察毆打，這是無政府主義並非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却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建設新的經濟生活。即使工人爲要求待遇而罷工，結果亦必凍餓，我以社會主義的立場，反對罷工，惟在今日的環境中，此項手段，有時也是不得不採取的。

——蘇聯年來內部的現象，無論精神上與物質上，都有良好與充分的表現，然而這種有規模的進步，不僅是蘇聯自身能得極好的利益，能獲取美滿的成功，在其他各國，也可以作爲借鏡，取它的長處而摹仿，而實行。

——我相信社會主義，遲早必得普遍實行於世界各國，雖革命的手段和步驟，在各個國家所採取的方式上，或有不同，但是殊途同歸，至最後的終點，必定仍舊一道走在一條路上去，而達於同一的水平線。

——至於蘇聯革命的成功，可以說是由於俄國帝制時代對於政治犯的待遇太苛

所養成，把有異樣的政治思想的人都流放到西比利亞，這正是給一般革命情緒堅決的人以讀書深思研究組織的機會。【在旁的俄報記者，突然責問蕭氏說，他離俄境的時候，所見俄國境內的情狀，但見紛亂不堪，並未像蕭氏所譽的那麼好，於是蕭氏又斷然地告訴他說：】——你所說的，實在是你離俄時一九二二年所見到的，非最近蘇聯的情況。倘使你在此時回國去一觀察——假如你今日返國之後而仍能逃走的話——你就一定會知道今日情形的佳妙了；僅僅憑着過去的觀察，來評衡現在的蘇聯，當然是不能知道最近蘇聯進步的迅速了。

——英國人士可以說是沒有一人認識中國，所以根本談不到政策。

——李頓報告書可稱公平，然而篇幅過長，恐怕無人能夠全部把它熟讀吧。

——今日英國本身問題，急待解決的極多，決沒有餘暇再過問中國的事。

蕭伯訥對洪深說：

——聽說你在某大學裏學習編劇的，這就奇怪極了。在課堂裏，從書本裏，你學到什

麼沒有編劇要從人生中去學習的。我自己編劇的時候，我先認清幾個人，把他們的行動言語，記錄下來，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發展着，像一朵花的開放一樣。那是真正可以學得會的編劇。祇有那除了『編』之外就沒有什麼的劇本，那便像一種用鐵絲做的九連環，組織與解開的時候，誠然是複雜得有趣，但是一點沒有意義的。想要學習作劇的人，最應當避免的是先定了一個格局，一個程式，再要陸續把原科填進去，到後來，你會注全力於格局與方式，而把你所以要寫這部戲的原故忘掉了。

蕭伯訥對泰晤士報記者說：

——美國要的是赳赳武夫，但除了愛爾蘭人以外，世界上的赳赳武夫就很少，既如此，何不做一個人情把愛爾蘭送給美國呢？沒有愛爾蘭人像他一樣，世界上就沒有天才；不過，我認為愛爾蘭人的天才有百分之五十實在是瘋狂的表現。無論如何，英國的島地是太多而金錢是太少了。所以與其讓美國逐漸地佔領英國的屬島如Jamaica與Baradoes等等，不如把愛爾蘭送給他們，倒還爽快些！

——關於中日問題及滿洲事件，我要等到離開中國以後，才便表示意見。

——中國人太講究『教育』，太不注重常識。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太多。這一般『可憐蟲』却不知道進了大學以後就是好人也要變成癩子。

——馬克斯不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但是他仍不失其爲能人及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的房子不生火，他會到不列顛博物院圖書館裏去取暖。

——用不着說，共產主義在蘇聯已經得到很大的成功。他們已經做出不少建設的事業，但是英國人還是主張俄皇復辟，豈非無聊之極。俄皇復辟，就等於恢復從前俄帝國的腐敗狀況——那還行麼！

——被壓迫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幹。中國的民衆應該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者封建王公。

——上海極其惡劣。

在北平

二月二十日在東車站

蕭伯訥對歡迎者說：

——日本暴行應該加以制裁，中國人的抵抗是你們的本分。

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飯店

蕭對各報記者說：

——中國過於酷愛和平，反受和平之累。日本過於好戰，亦必吃戰爭之虧。將來中日兩國，最後結果，一定無異於大戰後的德法，經濟等的衰落，定將不堪設想。

——中國人的一種奇異的特性，是他們對一切外國人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客氣和親善，而在他們自己却老是那麼不客氣，老是打仗。不知是什麼道理？或者大約是因為中國人和一切具有高尚智識的人士相同，天生是超人類的，因而恨惡人類嗎？

——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的同情心，屬於日本；富情感者的同情心，則屬於中國。普通英國人，僅知中國離英國海程很遠，故中國一切問題，亦漠然視之。他們自顧不暇，即使聽到中國有一百萬人民槁死，亦必不遑顧及，猶如地圖上一旦無英國存在，中國人亦儘可健啖其晨餐也。

——本人在中國嚴重局勢期內來華，並遊歷各地，似與平時來華的歐洲人感想不同。北平為堂皇富麗的舊都，各國人不忘中國，即應不忘北平。日僑紛紛準備回國，似大難將臨頭；中國富人亦南遷，好似北平可以放棄一樣。富人的財產不可受絲毫損失，我不懂是什麼道理，是否富人的財產較北平全市的價格為高嗎？

——故宮古物南運，於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一頁，好似古物較數百萬北平人民的生命為更重要的樣子。我們如赴意大利遊歷，則羅馬時代種種古物猶存，未聞意大利因外患內爭，而把古物遷東移西的。

——中國人酷愛和平，日本人亦自稱酷愛和平。但日人口中的和平，是戰爭結果後

之和平；中國人之和平，却是和平中之和平。現在日人向國際聯盟聲稱對於滿洲國的保護為應盡之責，對於侵犯熱河為保護滿洲國的屏藩，以保護之名，作侵略之實，自認為「自衛」。中國本採用無抵抗主義，現已覺得無抵抗主義之不適用，遂變為抵抗主義，亦認為抵抗即「自衛」。吾不知中日兩國之自衛運動要到什麼時候休息。

——滿洲三千萬中國人，必須成為愛爾蘭式的國民黨，這就是說要使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由一個拿着來福槍的日本兵來監視，這樣的事當然是不可能的。

——欲制服國民黨，猶之高踞在馬頭上，雖竭力擰持都來不及，又怎敢再作他想。愛爾蘭人如此，遂使英國國會除討論愛爾蘭問題外，不暇兼顧者，凡三十年。雖然，在國會方面，亦當然樂得的了。

——英國今後，或有向愛爾蘭要求獨立之一日。英國所有領土的廣大，實在已超過他本身。在起先，是狗搖尾巴，但尾巴長得太大時，將搖狗，而狗也將求去之不得了。如日本併吞華北，並再併吞華南，將來華人將為日人利益計，而管理日本，則日人將拚命掙扎，嗷

懼求免了。

——所謂裁軍運動者，全是癡人說夢。各國都有軍備，惟覺其代價太貴，所以他們要獲得一種協定，使軍備大減價罷了。他們豈願裁軍？如果他們說，『吾們開會了，』那麼，他們所要給你我唯一的利益，即是下次大戰將以十吋口徑的砲彈轟擊你，而不以十六吋口徑的砲彈罷了。你我豈不是就可以謳歌他們的仁慈了嗎？

——一切戰爭都是自衛。日軍將侵略熱河以自衛。中國抵抗日軍爲自衛。德國以前打仗，也是自衛。大家戰爭，無往而非自衛。

——現時共產制度，在蘇聯已經成立。全世界應祝帝國主義，勿再重返蘇聯，如白俄所希望的。以蘇聯現有的工業力量，如重返帝國主義的途徑，全世界將爲其征服。

——中國青年頗注意共產學說，當然是應該給他們研究的，且中國當政者，亦應如此，因爲其中有若干特色，是一切文明國家所應取法，藉以避免破產的。

——如中國允許外人在境內築鐵道，則將受制於外人。

——廉價勞工於中國不利，應抬高其代價。可注意者，並非每日爲一辨士而掙扎，却應按照世界標準，要求較高的工值，採用每日四小時工作制度，使有餘暇，以領略我蕭伯訥作品的妙趣。

——我並未習得華語，我一字不知，但我對洋涇浜語，頗感興趣。因大半文字，太受文法拘束。洋涇浜語却無此弊。我相信此語或將成爲未來的世界語。【至此，某記者告以華文在實際上即不講文法】——然則，華文將來或可成爲世界語吧。

——這固然是休假旅行，但我正要趁此休假期中，從事工作。我相信這是工作成功的祕訣。此行非爲遊覽，而是爲工作。在輪上無記者訪問，我就可以工作。

蕭對日本記者說：

——你們這兩個日本記者何必來訪我。我來北平，是屬於遊歷的性質，並無任務。

蕭對某俄文報記者說：

——你已經遲到了。學生遲到，扣分；記者遲到，則無新聞。（於是俄記者說，『請你原

諒！」我不是教師，並不是不要同你談話，實在因為時間短促，我倒要『請你原諒』了！

書 後

輯完了這本書，我們當可以明白：這不單是蕭翁的生活的紀錄，而在這上面是貫串

着他的一條思想的紅線；這不是關於蕭翁的一個辯護，而是一個明允的解釋；這不是一個無批判的喝采，而是一個忠誠的介紹。

我不會站在傳記者、辯護士、或捧場者的地位，來歪曲這位曳有世界的名聲的蕭翁。這裏大部分是輯譯的，探討了蕭翁是從那裏來的，是什麼人，而且是在到何處去；換言之，就是研究了他的過去是怎樣，現在是怎樣，未來又是怎樣。附輯的一小部分，是編選了一些關於蕭翁來華的重要文件，但這並不是為蕭翁個人留什麼紀念，却是為許多歡迎他或議論他的人們攝一張小影，或者可以題上這幾個字：『我親愛的幾個中國人民』

——一九三三年二月蕭伯訥攝於中國。

在這一張小影中，誠然有許多人（胡適博士即其一例）是不但不表示『親愛』，却是十分冷酷的；然而這不但不能傷及蕭翁的毫末，反轉是顯現了他們自己的魅影。當這時候，讀者們對這『我親愛的』一詞，倒也不妨帶着一些兒『幽默』的調子去讀罷。

二

關於蕭翁，研究的價值正多着，現略舉數種參考要籍如下：

——評傳方面——

- 1 Frank Harris : "Bernard Shaw"
 - 2 A. Henderson : " " "
 - 3 G. Chesterton : " "
 - 4 Frank Harris : "Shaw's Self-portrait" in "Contemporary Portrait"
- 小說方面〔包含自傳的成分特別多〕——

- 1 "Immaturity" (未成熟)
- 2 "The Irrational Knot" (不合理的結子)
- 3

III 戲劇方面——

- 1 “Candida” (康提達) 2 “The Man of Destiny” (運命的人) 3 “Major Barbara”(少校巴巴拉) 4 “John Bull's Other Island”(約翰·白爾的他島)
- 5 “Heartbreak House” (心碎之屋) 6 “The Devil's Disciple” (惡魔的信徒) 7 “Back to Methuselah” (回到麥妥賽拉) 8 “Saint Joan” (聖女貞安)
- 9 “Three Plays for Puritans” (給清教徒的三劇本) 10 “Caesar and Cleopatra” (該撒與克里奧巴特拉)以下數劇，均有中譯本：11『人與超人』12『不快意的戲劇』【包含『華倫夫人的職業』『好逑者』『驕夫之室』三篇】13『武器與人』14『賣花女』

四 論文方面——

- 1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易卜生主義的精髓) 2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智識婦女對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應有的認識) 3 "First Aid to Critics" (給批評家的急救) 4 "The Art of Rehearsal" (預演的藝術)